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15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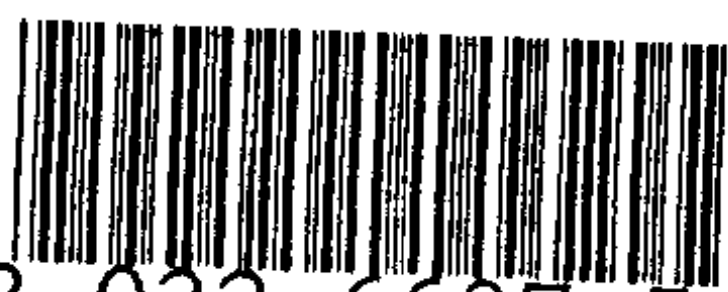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五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北京



2 022 6697 5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马少展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五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63000字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5,000册

书号11310·22 定价1.25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历史文献

迎接一九四一年.....邓小平 (1)

回忆录

回忆陕北公学.....李维汉 (18)

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李运昌 (57)

解放军打到那里 火车就开到那里

——回忆辽沈战役中的铁路运输.....吕正操 (81)

东北抗联党史资料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和党的领导

.....罗占元 李秉刚 (96)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李鸿义 王 景 (128)

“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

.....张一波 袁鲁毅 (173)

党在各地活动史料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巩固

和发展.....丁晓春 (189)

太岳革命根据地领导机构和行政区划的

沿革.....阎文彬 宋荐戈 卢海明 (223)

迎接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

邓 小 平

一九四〇年过去了。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经历了许多重大的事变，我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我们进行了一些严重的但是胜利的斗争。

这是世界巨大变化的一年。我们看到：两大帝国主义的战争，由片面转入全面，正向世界范围扩大着。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苏联，由于他有无比强大的力量，特别是有正确的政策，没有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漩涡，得以超脱于战争之外，而加紧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乐园，并准备积聚最大的革命力量，为着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与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斗争。以苏联为领导的和平阵线，和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战争的革命运动，也正在蓬蓬勃勃的发展着。所有这些，证明资本主义世界大大的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和世界革命的力量，大大的发展了，革命的胜利大大

* 本文根据《一二九师暨晋冀鲁豫军区抗日战争史附件之二——资料选编》第二卷排印，原载1940年12月《党的生活》第二十六、七期。

的接近一步了。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到处碰壁的一年。在外交上，既亲德意，又怕过于得罪英美；急于南进，又怕引起日美战争；讨好苏联，反为苏联冷眼相待；国际地位始终是孤立的。在对华战争上，表现非常焦急的状况，要想乘机南进，非迅速解决中日战争不可，为了结束中日战争，日寇曾采用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副的方法，其结果是军事进攻的成绩很少，虽曾一度企图进攻西安、重庆、昆明，以压迫我国投降，但为事实上的困难和华北百团大战的胜利所吓破；政治诱降的阴谋，在一个时期曾收到相当效果，但在我国军民坚持团结坚持抗战之下，屡遭失败，直到最近，又不能不搬出下贱的汪精卫来玩弄，这证明日寇的泥脚已更深的陷入中国的深渊，而无力自拔了。正因为国际环境孤立，中日战争无法结束，反映到日本国内，表现着政治经济的极度不安。中日战费已用去了一百六十余万万元，国债已欠到二百六十万万余元，一九四一年的预算还要百余万万元，国内现金几已用尽，庞大预算只有取之于民，人民反战，士兵厌战正在发展，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今年内阁换了三次，也无法解决问题。日本帝国主义显然已经更加苍老了，虽然它还能在生死线上多挣扎几天，无疑地，它是更加接近死亡了。

这是我国国内局势非常紧张的一年，最初，我们遇到了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我们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东方慕尼黑的危险，进行了严重的斗争，加上国际环境的变动，德意日订立军事同盟，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才算克

服了。接着，日寇于东方慕尼黑失败之后，乃企图发动向重庆、西安、昆明的正面进攻，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诱降，压迫我国投降。我党又提出保卫大重庆大昆明大西北的口号，并主张加强团结进步，以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华北的八路军决死队在这样的要求下，发动了百团大战，取得了空前的伟大的胜利，迫使日寇不能不去考虑到正面进攻中的后方问题，而被迫停止正面进攻，转到敌后进行反复的扫荡。正面进攻的企图被击破了，日寇又采取政治诱降的政策，于是德意劝降、日本诱降的危险又临到中国人民的面前。伴着这次严重危险而来的，是国内亲日派和内战挑拨者的活跃。这些混蛋在日寇指使之下，拼命挑拨反共的内战，企图用内战方式，置统帅于火炉之上，拖一批友军下水，以便经过反共战争转到直接投降，于是反共高潮，弥漫全国，二十九个师向华中新四军八路军前进，二十万大军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周围，并构筑五道封锁线，华北某军，整装待命等等恶耗，纷至沓来。我党乃又奋起号召全国，一致起来反对投降，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时局好转。我党我军一面实行了一些让步（见朱彭叶项通电），一面被迫作必要时自卫之准备，经过两月来的呼吁，反投降反内战的运动开展起来了，不仅进步势力，而且中间势力也感到亡国灭种的威胁，同我们一块致力团结抗战了。广大的友军也表示着对内战厌恶，加上苏联始终积极帮助中国抗战，英美在日寇南进威胁下，贷款中国以制日，于是亲日派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顽固派也不能不顾及人民的意志，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现在投降反共危险，

依然存在着，但争取好转的可能，显然是增加了。从整整一年中，我们看到，投降危险没有一天不威胁着我们的民族，这固然是由于日本诱降政策，和英美利用中国随时准备牺牲中国的影响；更主要还是由于国内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亲日派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也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政策，倒退政策的结果，困难增加，动摇也就随之而增加。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坚持团结抗战的进步力量大大发展了，广大的中间势力和大多数友党友军还赞成团结抗战，亲日派的力量是不大的，顽固派虽有钱有势，但为数是不多的，真正强大的是抗战派的力量，特别是我党我军已发展成为团结抗战的决定力量了。所有这些，充分证明我们民族常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我们有足够力量，不断克服困难渡过难关，走上胜利的道路。

这是华北斗争非常紧张的一年。即以本师所在冀南、太行、太岳区而论，我们的斗争是很艰苦的，我们的收获也是很大的。年初我们遇到了日寇和顽固分子朱怀冰、石友三等的夹击，使我们一面加强对敌斗争，一面却不能不对朱、石的进攻，实行自卫的回击。只有在回击了这般顽固反共分子的进攻之后，我们才能建设巩固抗日根据地，才有可能一心对敌进行严重的交通斗争。随着朱、石的南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了，几个休戚相关的区域，联结成一个带有战略性质的根据地了；各种政治改革，财经文化等建设工作，也在联办统一指导统一计划之下，顺利进行了；群众工作更加深入了；抗日根据地更进一步的巩固了。随着朱、石的南移，在冀南展开了整年的交通

战争。虽敌据点大大增加，但我们给予敌人的打击是极其巨大的；在太行、太岳我们第一次发动了破击白晋路的战役，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接着从八月二十日起，我们全区的八路军决死队参加了华北的百团大战，在党政军民一致努力之下，我们达到了战役的目的，破坏了敌人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计划，缴获之多，胜利之大，也是空前的。整个的一年，我们全区军民都在自卫斗争，交通斗争，进攻敌人和反扫荡的战斗环境中，斗争是艰苦的，虽然由于某些区域某些同志掌握政策不紧，甚至发生某些错误，使得我们党政军民的进攻，表现出不平衡的状况，各种力量的发展也嫌不足；但这仅是前进中的弱点，发展中的不足，我们是胜利的。

这是本师战斗最多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本师军事政治质量大大提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进行了一千四百余次的大小战斗，几千个优秀共产党员和非党布尔塞维克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根据地的巩固，或者光荣的负伤，或者流了他们最后一滴血。然而，我们获得的却是克服时局危机的胜利，根据地的巩固，战斗力的提高，敌人的挫败，以及二万余敌人的伤亡和无数的缴获。在这一年中，我们的部队发展了百分之七十，特别是经过五月整编之后，部队的组织性加强了，正规化的程度提高了。在这一年中，我们坚持了干部轮训制度，我们经过党校，轮训队，政工训练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供给卫生通讯等训练班，以及各种各色各级的训练队，培养了大批的干部，所有经过训练的干部，一般的党性提高了，政

治文化进步了，军政技能也增强了。在这一年中，我们部队的政治工作也有了一些新的建树，军民关系也更加进步了。不可否认的，我们还有不少弱点：我们还没有百分之百的完成发展的任务；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地方武装的建立大大不够；巩固部队的工作太差；发生了阚兴学、高恒如的可耻叛变；某些部队的进步不够；干部关心战士不够；供给制度尚未健全起来等等，这还需我们大大的努力。但是，总的任务我们是完成了的，一二九师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前进一大步了。

一九四〇年是胜利的一年，我们的努力，不是空过的。世界革命和中国抗战的胜利更加接近了。让阚兴学、高恒如这般下贱东西去悲观失望动摇叛变罢，我们是要继续前进，继续胜利的！

* * *

一九四一年开始了。

这将是世界革命更加发展的一年，也将是中国抗日战争更加困难，更加接近胜利的一年。

我们不可能对未来的一年，作出详细的准确的估计，但一般的趋势，是可以想像的。

两大帝国主义集团的战争，更加向着世界范围内扩大，资本主义世界继续削弱，苏联社会主义力量大大发展，第三个五年计划进入了第四年，很快要出现一个崭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给全人类以显明的奋斗目标和无限的希望。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战争的运动将蓬勃的发展起来。两个世界对比将起着更显著的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必然坚持贯彻其灭亡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基本方针，其南进政策，必然引起日美在太平洋上更尖锐的矛盾，甚至有爆发日美战争的可能。其解决中国事件之要求，亦必更迫切，而解决中国事件之方法，亦不外政治诱降军事进攻双管齐下，其外交上的孤立状态，不会得到多大改善。其财政困难，不会得到解决。其国内不安现象，人民不满情绪，必然增长。所以，这个先天不足的帝国主义将在愁城中去渡过一九四一年，而将其希望寄托于迅速解决中国事件之上。只要我国坚持抗战下去，日本必败，这是肯定的真理了。

中国抗战，必然更加艰苦更加困难，同时也更加接近胜利。无论日寇从政治诱降，或从军事进攻以压迫我国投降，投降危险是时刻威胁着我们的，而亲日派制造投降运动挑拨内战的活动，也必然是变本加厉的。英美帝国主义目前虽在帮助中国，利用中国以制日，但它并没有放弃争取日本孤立德意的战略企图，所以英美牺牲中国，再来一个类似东方慕尼黑的把戏，也并非没有可能的。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还在于中国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动摇。因为这种人惧怕困难，没有自力更生的信念，熬不过战争的难关，同时不愿进步，反对民主，害怕民众力量，致使抗战更加困难，所以时有被敌引诱屈辱求和的危险。因为这种人不愿表里一致的联苏，而甘心情愿跟着英美走，所以时有被英美出卖的危险。因为这种人抱有很深的反共成见，所以时有被敌挑拨被亲日派利用，发动内战，经过内战走到投降的危险。因为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全

国一切拥护团结抗战拥护民主进步的力量，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停止地主资产阶级动摇的程度，所以投降反共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假如我们只看到困难，看到投降反共危险，不看到全国抗战的进步的力量曾经克服了无数次的危险和困难，也有力量足以克服不断到来的危险和困难，那必然发生悲观失望的情绪。一九四一年的环境，将给我们以更多的克服投降反共危险的条件：国际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特别是英美日在太平洋矛盾的加深，给我国以更好的机会去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苏联力量的更加强大与始终如一的援助中国抗战，将给我国人民以无限的鼓励和兴奋；日本强盗的困难激增，弱点更多，更便于抗战胜利的取得；而我国抗战力量进步力量必然发展，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尤必需发展，这是不断克服危险克服困难的决定因素。我们认识困难和危险的目的，在于寻求各种办法去克服困难和危险。条件是具备的，不管情况如何变化，我们都将以正确的政策去争取继续团结抗战和继续进步。团结下去，抗战下去，进步下去，中国是一定胜利的。

华北的斗争也将是更加艰苦更加进步的一年，在任何条件下，敌人是不会放松华北的，我们坚持华北抗战也是肯定的方针，斗争是极其尖锐的。敌人必将企图增加其公路网铁路网和据点的密度，以缩小抗日根据地，打断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束缚我之机动；我们亦必进行更残酷的更带群众性的交通斗争，打击敌人的企图，缩小敌占区，扩大抗战区，使我各个根据地之间，具有更密切的联系和更灵动的配合。敌人必将更残酷的实行其分区的连续

扫荡，甚至可能局部的由分区扫荡变为分区清剿，大肆摧残抗日根据地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也必进行严重的连续的反扫荡斗争，用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去削弱敌人，用坚强的正规军去消灭敌人，用充分的战争动员工作和不疲倦的建设，去打击敌人的破坏，以建设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敌人必将加强其政治经济的进攻，必将强化其欺骗宣传和奴化教育政策，必将厉行其特务活动和内奸政策；我们亦必将以正确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去加强政治经济斗争，与敌人进行严重的文化的宣传的斗争，并以群众的锄奸政策最高的警觉性去打击敌人的特务活动和内奸政策。我们相信，依靠于已有的基础，不断发展的力量，特别是正确的政策，我们一定能够坚持华北抗战，打击敌人各方面的进攻，使抗日根据地更加坚强更加巩固。

根据上面的估计，显然的，我们华北的党，华北的八路军，华北各个根据地的政府和人民，责任加重了。我们要以最大的毅力，最坚强的斗争勇气，来坚持华北的艰苦斗争。同时，还要以华北抗战和建设的模范，去增强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打击投降妥协的危险，并准备应付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我们有着充分的条件和信心，去迎接一九四一年的新的发展与新的胜利。

* * *

迎接一九四一年新的发展和新的胜利，决定于我们的力量尤其决定于正确的政策。

在晋冀豫整个区域说来，我们有了力量，但是无论在数的方面，质的方面都很不够。在军事方面我们正规军的

充实不够，游击队和游击战争的发展尤其微弱，军队建设和战术素养亦嫌太差。在政权方面，还不善于运用政策，贯彻政策，还没有认真执行三三制的原则，下级政权改造极其不够，还有一批土豪劣绅把持下级政权，破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政权与人民的联系还差，部队行政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还是严重，因而政权力量的发挥是非常不够的。在群众工作方面，我们有了比较普遍的工、农、青、妇的群众组织，而且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组织生活是很差的，是经不起风浪的，还有不少地方是形式的；某些地方还存在官办民众运动的严重错误，真正的当地的群众领袖还没有大批的涌现出来，所以基础是不够巩固的；特别是在群众组织中缺乏正确政策的教育，某些地方表现出过左过高的要求，不少地方对基本群众的生活改善，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些或左或右的错误，都不能把群众力量广泛发挥出来，都有害于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都无法把群众工作向着健全的道路上发展。在党的工作方面，我们有了大的发展，有了相当的基础，在全区党努力之下我们创造了晋冀豫的局面，而且胜利的领导了三年半的艰苦斗争，但是，无论军队党或地方党都尚未能掌握住“严格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路线”的方针，缺乏严格的组织生活，缺乏坚强的支部工作，缺乏必需的民主，缺乏党的和政策的的教育，缺乏群众工作的研究与对群众痛苦的关切，因而党与群众的联系是极其不够的，离开群众来建设布尔塞维克党是不能想像的。在团结二百万友军抗战，团结知识分子，团结士绅，团结各阶级等工作上，在敌占区工作，敌伪军

工作上，我们有着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一些弱点以至个别错误，个别区域个别同志常常忽视这些工作，忽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甚至多树一些敌人，当然这对抗战力量有损，而对敌人有益的，必须纠正。

所有这些证明我们力量的发展是不够的，尽管这是发展中的不足，前进中的弱点，也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与警惕。

克服这种不足的现象，克服这些弱点，以适应于一九四一年的新环境，就必须我们努力于三大建设的工作：

第一，建设我们的军队，重心就应该放在正规军的加强，游击战争的发展与军区工作的健全上。一切努力为着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在全党中要造成爱护党军的热潮，在人民中造成爱护自己子弟兵的热潮，保证党军的壮大与充实，保证党军的物质供给，共产党员应起到模范的作用。

第二，建设我们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民主政权，重心应该放在掌握与贯彻统一战线政策，正确执行三三制的原则，首先完成村区的民选，树立民主政治的基础，以及加强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上。一切为着团结各阶层，发扬民力，增加根据地的财富，保证德怀同志提出的一九四一年经济建设计划之完成，和密切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第三，建设我们的党，重心应该放在加强群众工作，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切实掌握政策的领导，加强党对武装的领导，和严密党的组织提高党的纪律上。一切为着高度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提高党及群众的战斗力，树立严格的布尔塞维克组织路线的基础。

三大建设的胜利，就可以使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和正确

方向去发展各方面统一战线，开展敌占区和敌伪军工作，完成全部的任务。

三大建设的胜利，依靠于正确的政策。离开了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一切努力都是空洞的，有了正确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够发展，能够胜利。

三大建设的胜利，依靠于细心的有计划的组织工作，反对粗枝大叶的不实际的作风。

三大建设的胜利，也必须依靠于坚持的努力，和工作的战斗性，要保障在战斗环境中不放松工作，在敌人连续扫荡中还能完成任务，保障一定的任务在一定时间完成，反对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

一二九师的党和全体指战员，在执行党的政策上，在完成三大建设的任务上，都应起到模范的作用。

* * *

因此一二九师的党和全体指战员，与地方党地方政府和全体民众一样，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一定能够胜利的信念，来迎接一九四一年的艰巨任务，我们的责任加重了。

一二九师的党应把自己的努力放在下列的中心工作上。

第一，保障正规军的经常充实，保障战斗力的提高，保障在一九四一年打几个更大的歼灭敌人的大胜仗。

为了部队的充实，除了协同地方进行兵员补充工作外，在部队本身上必须加强巩固部队的工作。巩固部队首先在于巩固部队的团结，发扬本军阶级友爱团结一致的传统。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要爱护战士，关心战士的生活，注意对部队的管理教育，消灭个别的打骂现象，在生活上遵守

纪律上成为战士的模范。战士要爱护干部接受管理教育，服从指挥命令，要帮助友邻的同志，尤其是老战士要帮助新战士。能如此，就可减少以至消灭非战斗减员，巩固部队的战斗力。

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必须加强党的政治工作，加强战术和技术的教育，加强部队体力的锻炼，改善部队的给养，特别是提高干部的指挥能力。

为了歼灭敌人，打大胜仗，必须发挥部队作战的顽强性，不仅要有消灭敌人一部和几部的决心与信心，而且当我们抓住了消灭敌人的机会时，应不惜牺牲以求干脆的消灭，任何犹豫迟疑都是不能容许的。所谓顽强性，应具体表现在敢于白刃扑搏上面，不能进行坚强的白刃战的部队，就没有资格称为顽强的党军。敌人在一九四一年的扫荡是严重的，我们有着消灭敌人的良好机会，而不消灭敌人，我们就无法巩固与建设根据地。

第二，发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用普遍而有力的游击战争去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用普遍而有力的游击战争去消耗疲惫和削弱敌人，去配合正规军，反对敌人的连续扫荡，去打击敌人对根据地的摧毁政策。

为此目的，必须在补充正规军的任务完成之后，立即进行充实与发展游击部队的工作。要大量发展地方部队才能支持残酷的斗争局面。

为此目的，必须大大提高游击部队的战斗能力和政治质量，我们对于游击队的要求必须提高，游击队的战斗力不能比正规军相差太远，而在游击战术的素养上，应比正

规军还要灵活，还要熟练。也因为游击队经常处于独立活动的环境，更需要有高度的积极性与自动性，更需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

为此目的，必须把地方兵团游击队，放在地方党的领导与监督之下，地方党对于同级的地方武装必须定期的检查指导其工作，保障这些部队能够执行上级的命令，保障它能够执行党的政策，保障它有模范的纪律，保障它与当地群众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联系。所有的地方部队，尤必须接受地方党的领导，任何轻视骄傲的态度，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为此目的，必须要求正规军对游击队积极的帮助。我们的党军要善于领导，使用和帮助地方武装，使地方武装成为自己有力的助手。在必要的时候，正规军应抽出适当的部队去加强游击队的战斗力，在必须动员一部地方武装补充正规兵团的时候，尤应反对连根拔的现象。

第三，加强军区的建设。各军区军分区除了善于领导地方兵团和游击队外，应把自己的重点放在民兵制度之上。我们需要在一九四一年训练出大批的自卫队和青抗先的干部，这些干部应该是最坚决的，最有斗争勇气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我们需要在一九四一年全区完成发展民兵十万的计划，并使这十万民兵真正成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基础，成为正规军补充的泉源。我们需要在一九四一年打下自卫队青抗先的组织和工作的基础，使之像晋察冀一样，能够担负起抗日戒严，配合军队作战，侦察锄奸等任务。我们要求军区工作能够保证每期兵员计划的完成。

我们要求地方党、政府、群众团体对于军区的建设，民兵基础的树立和兵员的补充，起到坚强的保证作用，每个共产党员更应成为参加军队领导民兵工作的模范。

第四，打下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的基础，加强所有干部的职务技能的教育，首先我们的正规兵团必须做到。

打下政治工作的基础，一九四一年政治工作的重心应该是：甲、依据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而在一九四〇年本师颁发的《连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作参考，来重新训练所有的政治干部，务使每个政治干部以至军事干部，通晓政工条例的精神和内容，切实的贯彻执行政工条例的规定，使每个政治工作干部熟练政治工作，特别熟练战时政治工作。乙、加强连队工作支部工作，每团创造一个到两个模范连队和模范支部，用模范去影响落后，树立连队政治工作的基础。丙、高度的树立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威信，反对破坏政治委员制度和轻视政治机关的任何表现，特别是要求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的模范作用，从自己工作去树立自己的威信。丁、进一步的审查干部培养干部，进一步的加强党的意识锻炼，学习党的政策，以培养干部独立活动的的能力，各级干部的提拔必须经过政治机关（班排干部必须经过支部）的审查。戊、切实做到指战员一体，军民一体，发扬党内民主，实行军人大会的制度，发展青年工作，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发动全体指战员爱护党军，发动全体人民爱护自己的子弟兵。己、提高民族的和阶级的警觉性，加强锄奸保卫工作，严防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内奸政策的破坏。

打下管理教育的基础，一九四一年的军事工作重心应该是：甲、根据本师拟发之内务条令，在干部中进行深入教育，保证准确的执行内务条令，实行阶级管理。乙、提高部队的纪律，特别是战场的纪律，严明赏罚，有功者一定要奖，有错误者必须适当的惩罚，要善于运用模范例子去压倒坏的东西。丙、建立经常的教育制度，学习晋察冀的同志，善于利用一切空隙来进行部队的训练，以提高战术和技术。丁、健全参谋工作，选拔优秀的有能力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党的意识很好的干部，来加强参谋部门，用加强政治工作的注意力去加强参谋工作。

打下政治工作和管理教育的基础，决定于干部。我们的轮训队，抗大分校及其他各种教育部门，都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这些上面。

第五，健全供给制度，发扬本师艰苦的作风，与一切贪污浪费现象做斗争，供给干部必须尽一切努力，在可能的范围内，去改善部队的的生活，各级军政首长应加强对供给工作经常的注意与领导，加强卫生部门的工作，爱护伤病同志。

第六，根据师政治部颁发的条件，创造模范兵团、模范干部、模范党员和模范战士。所有干部，所有共产党员，所有阶级战士动员起来，为争取模范而斗争，为创造模范党军而斗争。

* * *

依靠于过去三年半抗战努力的成果，依靠于一九四〇年胜利的基础，依靠于我们不断的努力，不管未来的环境

如何困难，我们都是能够克服的，我们是一定能够胜利的。

我们以胜利的姿态结束一九四〇年。同样，我们也以胜利的姿态迎接一九四一年。

回忆陕北公学

李 维 汉

编者按：李维汉同志生前嘱我们转告读者，对他的回忆录“敬请提出批评建议”。意见请寄本刊编辑部。

陕北公学是我党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创办的一所革命大学。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延安成立，一九三八年七月在关中栒邑设立分校，一九三九年一月，延安陕公总校迁到栒邑与分校合并。一九三九年六月，党中央决定陕北公学、延安鲁艺、工人学校、安吴堡青训班四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校址迁到晋察冀根据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党中央决定恢复陕北公学，在延安重新招生，称为后期陕公。一九四一年八月底，党中央又决定将陕北公学与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结束了陕公的历史。我于一九三八年三月到陕公工作，先后担任过副校长兼党组书记、分校校长、后期总校校长等职。我和许多同志们在陕公的那些兢兢业业、艰苦奋斗、共同切磋的日日夜夜，虽已过去了四十多年，回忆起来仍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一、陕公的创立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十二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会议，批判了长期统治党中央的王明“左”倾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从此，革命进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新时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华北节节逼进，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由于党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建立国内和平、实现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事变以最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结局得到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极大地提高了党的威望。它向全国人民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蒋介石残杀千百万革命群众的血海深仇，从而使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抗战离不开共产党。因而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们，向往共产党，向往延安。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青年，背着行装，唱着抗日歌曲，风尘仆仆地奔向延安。青年们是为追求真理、学习抗日救国的本领而来。从我们党来说，为了开展全民族抗战，也急需增添新的力量，所以党把青年视为极宝贵的财富。但当时延安只有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它们的任务是轮训党

的高级党政干部和高级军事指挥员，无法容纳来延安的广大知识青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中央决定把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并增设了第四大队。这是我党在延安培训全国抗日青年的第一所熔炉。

“七七”事变后，开始了全民族抗战。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广大国土相继沦陷，因而从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沦陷区奔赴延安的青年，与日俱增。为了开展全民抗战，以最快速度培养他们成为抗战的人材，党中央决定，在积极扩大抗大的同时，创办陕北公学。

本来我们想把陕公取名为“陕北大学”。当时，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边区要办一所大学，不能不事先通报国民党当局。国民党以边区地域小、已有了抗大等为由，不同意再办“陕大”。这样，我们便改称陕北公学。大革命时期，党在上海办过上海中国公学，陕公的名称，一方面是继承过去的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我们的学生，并非是中學生进大学，实际上留学生、大学生、中小學生都有，叫公学，更符合实际，学生们也都满意。

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始筹建陕北公学。党中央委派组织部长李富春直接领导此项工作，并任命成仿吾（当时是中央党校教务长）为陕公校长。成仿吾带来十几个干部负责筹建工作，他们是陕公的开拓者。

九月九日，《新中华报》刊载了筹办陕公的消息。《新中华报》载明，陕公的发起人为林伯渠、吴玉章（当时在国外）、董必武、徐特立、成仿吾、张云逸；创办陕公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设有政治经济、

师范速成、医学、国防工程、日本研究等五个系；准备招收学员一千人，每系二百名。校址在延安东门外。随即，我们在三原、西安、延安等地设立了报名处。我党设在国统区的八路军办事处，是介绍、接收陕公学员的重要阵地。

九月十四日，《新中华报》又刊载了陕公的招生简章。简章对陕公的办学宗旨，各系的培养目标、报考资格、考试科目、报名手续、考试日期、地点、学员生活待遇、毕业分配方向等等，都作了简要介绍。关于报考资格，我们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没有对学历、文化水平等作机械的规定，强调只要有志于抗日救国，年满十八岁，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不分性别、出身、职业、党派信仰，均可报考。

党中央要求我们以最快的速度为抗战培训人才，输送干部。因此，陕公的学员，随到随编班，一面招生，一面办学。最初的学员，从抗大转来的大约有二百名，延安的一些部门、白区党的一些单位、爱国民主人士（如郭沫若、沈钧儒等）也送来一批学员。经过一个月的筹备，到校学员有三百多名。九月一日，正式编班上课。

初创时的陕公，领导机构很简单，干部也极精干。在校长领导下，设有教务处、生活指导委员会（相当于政治部）、校务处等三个部门。教务处长邵式平，生活指导委员会主任周纯全，校务处主任袁福清，秘书长饶志雄。中共陕公总支委，是学校专作党务工作的组织，第一任总支书记宋琏（女），以后是季凯、申力生等。陕公最高党的领导机构是党组，设有党组书记。

陕公最初开设三门课程：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社会科学概论。此外，还有不定期的时事政策报告。授课教员，除学校的行政领导如邵式平、周纯全等兼课外，专职教员有周起应(周扬)、李初梨，聘请的有吴亮平、凯丰，约请的有毛泽东、洛甫、陈云、李富春、王若飞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党中央的大力协助和学校的努力下，教师的阵营很快得到加强、充实。党中央将一些名学者、名教授如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吕骥、李凡夫等从白区调到陕北，在陕公任教；另外聘请、约请的教员也大大增加，如张如心、李培之、宋侃夫、林惺夫、邓止戈、何定华、李唯一、贾克、陈昌浩、陈伯达、徐冰、陈唯实、王观澜、毛齐华、杨松、任白戈、王思华、贾侃、李舜初等，都先后在陕公讲过课。

一九三七年十月，陕公学员已编了五个队，第一到第四队是男生队，第五队是女生队，共约六百人。十一月一日，陕公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宣告陕北公学的诞生。

我于一九三八年三月调陕公任副校长和党组书记。在这以前，我任中央党校校长。一天，洛甫到党校作报告，报告毕，他通知说中央决定我去陕公任副校长兼党组书记，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有意见。我问何时去，他答一个礼拜内。我又问他有何指示，他说了两点：一、搞好领导干部的团结；二、发展党员要放手些，可以发展到学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至八十。我如期到达陕公。

二、党中央和毛泽东对陕公的亲切关怀

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是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日，陕公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亲临讲话。他开头第一句话，就是讲陕公的任务，他说“陕北公学的重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当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练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毛泽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一生，号召陕公学员在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中，要象鲁迅一样，“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看清了政治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的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要象鲁迅一样，决不畏惧敌人的威胁、利诱、残害；“一点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恶的一切。”毛泽东在开学典礼上，还表扬了陕公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勤恳学习革命理论的精神。他说，陕公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创造革命先锋的场所。”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为陕公写下了著名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

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陕公一创办，在财政、物资方面就遇到极大的困难。一九三八年三月，当陕公发起向国内外要求支援时，毛泽东在我们出版的《援助陕公》的小册子上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容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责任，我认为也应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

在办学过程中，毛泽东对陕公的关怀是经常的、多方面的。以一九三八年为例，三月三日，他参加了六至十队的毕业典礼，会上他作了“临别赠言”，说陕公是统一战线的缩影，是进步的中国的缩影，有陕公中国就不会亡。三月二十九日，他在陕公讲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四月一日，他参加陕公第二期的开学典礼，首次讲述我党我军的“三八作风”问题，对其中的第一、第二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作了详细阐述。四月五日，毛泽东在陕公讲国共合作问题。五月七日，他在陕公讲张国焘叛逃的问题，勉励学员要忠于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六月二十七日，他在陕公讲抗日战争的基本规律和党的基本战略持久战问题，将《论持久战》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向学员作了介绍。毛泽东还给陕公师生讲过哲学课，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

党中央的其他许多同志也非常关心陕公的成长。周恩来在陕公作过关于大后方的抗战形势和平江惨案的报告，朱德作过关于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发展的报告，董必武作过关于中国法制问题的报告，张闻天作过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问题和青年修养的报告，陈云、李富春作过关于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的报告。此外，任弼时、王若飞等都到陕公作过重要讲演。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陕公能迅速发展和作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原因。

三、陕公的教育方针

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政策，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斗争环境密切联系着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党的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规定，抗日的教育政策，必须“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六届六中全会又规定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为长期战争服务”的方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必须改订学制，废除不急需与不必要的课程，改变管理制度，以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及发扬学生的积极性，尽快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等等。

我们根据党中央关于战时教育的基本方针，根据陕公的性质、学员的特点等等，规定了陕公的教育方针：

第一，使学员获得革命的宇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获得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与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知识；

第二，使学员获得当前革命运动发展规律的知识，获得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第三，使学员获得抗日民族战争的知识，首先是游击战的知识；

第四，培养学员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民众运动工作者和文化教育工作者；

第五，培养学员敢于斗争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及理论联系实际与民主作风。

陕公最初的招生简章曾规定设置五个系，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个设想脱离实际。因为，当时有的系如医学、国防工程，延安无条件设立。以后陕公不分系，只分普通队和高级队。普通队培养前线与后方急需的抗战民运干部，学习期限一般为三到四个月。高级队培养学校的师资，学习期限为一年。学校的重点是办好普通队。

普通队开设四门课程：

1. 社会科学概论，又称“政治常识”。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学生通过这门课的学习，初步懂得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识中国革命不仅当前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求得民族解放，而且将来还要谋求社会解放、阶级解放。讲这门课的有李凡夫、吴亮平、张如心等。

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讲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方针、政策，统一战线的产生、形成和意义，以及在实践中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又斗争又团结，正确处理

理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等。这门课有史有论，有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学员们非常爱听。讲授这门课的有邵式平、何干之等。毛泽东每次到校讲演，也总要讲这方面的问题。

3. 游击战争。主要讲游击战的理论、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等。最初讲这门课的是周纯全，他是从四方面军来的，是位经过长征、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他讲课具体生动，绘声绘色。邵式平、张然和也讲过这门课。

4. 民众运动。这是一门崭新的课程，主要讲群众运动知识，如怎样动员和组织群众、建立政权、建立武装；还讲各种政策、法令，如减租减息、拥政爱民、合理负担、妇女解放；以及扫盲、儿童站岗放哨等等。讲这门课的有邵式平等。这门课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抗战开始到一九四〇年底，是我们军队和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那时我们派些干部深入敌后，几个月、半年、一年，就能拉起一支队伍，建立根据地。这里就有我们陕公的功劳，有我们民众运动课程的功劳。

除了上述四门课外，还有不定期的时事报告，主要是讲国内外和边区形势，对开阔学员的眼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增强胜利信心，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常请党中央的一些负责同志来作这方面的讲演。

上述课程的内容、讲授的份量、时间的安排都不是死板的。有时，前线特别需要民运干部，我们就加强民众运动课程的份量。毛泽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发表后，

我们就重点讲授。国民党搞反共磨擦，统一战线课程内容也作相应的变化。

陕公课程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启蒙性。由于前线急需干部，学习时间又短，我们只能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让学员短期学习后就立即投身于实际斗争，在实践中继续学习和积累经验。实践证明，这种启蒙性教育是成功的。第二是理论联系实际。课程的开设，不仅是为了满足斗争的需要，而且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也是密切联系的。在校内，结合游击战课程，经常举行各种军事演习。但是，这些活动只起辅助作用，主要还是搞好课堂学习。

陕公的高级队，专门培养师资。陕公本身的师资需要补充，延安其他许多干部学校也向我们要教员。高级队学习期限一年，开设的课程也较多。计有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运动史、世界政治、中国问题讲座（如中国农民问题、土地问题、边区经济、工农政权问题等）、三民主义研究、战区政治工作等。

高级队各课的内容，比普通队也深得多。比如马列主义课程，要讲不少原著，《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都是必学著作。政治经济学课程，还要学《资本论》。

不论是普通队或高级队，我们在教学中，都注意贯彻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历史到理论等项原则。也注意了各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

有一个时期，在课程的设置和讲授上，我们比较强调

少而精。陕公是一个短期干训班性质的学校，搞多而杂当然是不行的。可是，从学习规律来说，人们的知识总是从少到多，从简到繁，由浅入深的。对学员来说，他们应该尽量多学一点，学好一点。所以，我们不把少而精作为一个普遍的原则，我们强调的是刻苦。

四、陕公的教学组织、教学过程

陕公的主要教学组织是教务处、队、班。在陕公学习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学习第一”、“一切为了学习”，因此教务处成为学校生活的中心，它是全校最高学习领导机关。课程的设置、教员的配备、教材的编定、教法的研究、学员的学习考查等等，均统一由教务处负责。

教务处下面，设有教育科、学习指导科、军事教育科、各科研究室（即各科教研室）、图书室、陈列室。学习指导科，是教务处直接领导教学的行政机构。以学习指导科科长为首，吸收各科教员代表、学科指导员、各队队长参加，组成学习指导委员会，具体负责教学计划的制定，并实地指导学员学习，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

学员编为队，下设班。队相当于连，是教育单位，又是自治单位，每队约有学员一百到一百二十人，由队长、指导员（最初叫队主任）、助理员、副队长、队学生分会主任等组成队的领导小组，负责全队的工作。他们的分工是：队长管学习，副队长管生活和军事，队指导员是队的支部书记，负责党的支部和政治思想工作，政治助理员管党的组

织宣传，队学生分会主任管课外活动和社会活动。班是学习单位，每班有八到十二人，文化水平有高有低，搭配编班，每班都编进一两个政治文化较高的学生，以便发挥骨干作用。班长、副班长均由学员选举产生，是学习较好，能力较强，工作负责，能团结全班的优秀学员。

由于客观条件困难，上课采取大课堂制，常常是几个队、数百人在一起听课。教学的基本环节为：引言、预习、质疑、讲授、复习。各门课一般都没有讲义、教科书，但各课都编印了教学大纲，对课程内容、范围、研究方向等作扼要说明。陕公教学程序的主要优点，是废止了注入式，能启发学生思考，讲授有的放矢，它把教员的指导、学员的自习、个人的研究、集体的讨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组成一个连续反复、由浅入深的过程，既发挥了教员的指导作用，又调动了学员的学习兴趣与积极性。

学校对教员的要求是很高的。教员多是革命的前辈，或由国统区来延安的有威望的革命的教授，这些教员既掌握了革命的理论与方法，又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处处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诲人不倦，既教书又教人。所以他们在学生中的威信是很高的。

学员的学习强调三个原则：

一是自学为主。在时间的分配方面，学校规定自学的时时间多于上课的时间；在自学时间内，个人自学时间又多于集体自学时间。但同时并不否认集体作用，不否认同学间的互助。相反，当时陕公的课堂讨论、先进帮后进等活动，都是组织得很有成效的。

二是循序渐进。学习要靠思考，思考只能从容前进，“欲速则不达”。

三是发扬民主。陕公是一个统一战线的学校，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的来自海外，其中有少数国民党员，他们各自的经历是不同的。在学习中，我们提倡独立思考，敢于辩论，反对强制服从，反对随便给人戴大帽子。课堂讨论是体现学习民主的重要环节。除此而外，当时每个队每周还出版一次《学习导报》，内容有学习评论、学习收获、学习方法介绍、讨论会总结、参考书指导、各班学习反映、问题质疑与解答等。《学习导报》充分贯彻了民主精神，受到学员的普遍欢迎。

陕公也有考试、考查制度，主要是给学员对已学知识有一个温习、整理、综合与提高认识的机会，同时也检查教学计划是否适合学员的情况，检查教员的教学方法是否得当等。考试、考查方法，除笔试外，课堂讨论、辩论会、问答晚会、学习笔记、学科展览会、学科集体创作、实习通讯，都是考查学生成绩的途径和方式。

五、陕公的校风

陕公的校风是忠诚、团结、紧张、活泼。这是陕公全体师生员工的共同生活准则、共同作风。

第一，陕公所提倡的忠诚，就是忠于抗战，忠于革命，对共产党员来说，还必须忠于共产主义信仰，忠于马列主义原则。这个精神，具体贯彻在陕公的教育方针、教育制度、

教育计划和教育内容中，使他们毕业后，成为一个先锋战士，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陕公这个革命大熔炉，曾经培养锻炼了成千上万的优秀革命战士，他们无限忠诚于民族革命战争，忠诚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可歌可泣的贡献。有些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是，也有极少数人，经不起考验成了逃兵，有的甚至成为叛徒和民族败类。出现几个坏人，当然无损于陕公的光辉。我们对这些人，在校内和《新中华报》上，进行过公开地揭露和斗争。

第二，陕公所提倡的团结，就是团结于抗日，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于革命，把陕公办成革命的大家庭。陕公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有汉、藏、蒙、回、彝等许多民族，有的来自祖国边远的东北、西康、云南，有的是从朝鲜、暹罗（泰国）回国的华侨。年龄上的差别也较大，有十五、六岁的小弟弟、小妹妹，也有年过半百的老大哥、老大姐。从经历来说，有红军战士，有白区地下党员，有陕北贫下中农的儿女，也有国民党高级人士的子女（如邓宝珊的女儿）。陕公的干部也有来自部队和地方的区别。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抗日，抗日是陕公团结的政治基础。虽然，陕公是共产党创办和领导的，但我们在信仰上不强迫他们，我们以马列主义真理、革命理论来培养教育青年，使他们成为自觉的革命战士。

为了搞好团结，陕公执行四个原则，这就是平等、民主、五湖四海、用人唯贤。

平等。陕公内部生活，严格执行红军年代行之有效的

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的原则。学校对所有学员在政治上、生活上都给以亲切关怀。一个同学病倒了，他会受到大家的热情照料。为了帮助一个落后同学，校长也常常亲自出马。陕公的校长、教员、公务员、学员，生活平等，功过赏罚一视同仁。象成仿吾，每天比学员起得还早，学生出操时，他早已在各处巡视了。他对学员十分爱护，学员送给他“妈妈校长”的爱称。

民主。陕公提倡学校全体成员参加管理学校。学校的一切大政方针，师生员工都参加讨论，任何人都有权对学校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学校也不隐瞒自己的问题，谁有缺点、错误，都要作自我批评。

五湖四海。陕公不许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先进不许歧视落后，党员不许歧视非党同志，某个地区、部门来的，不许歧视另一地区、另一部门来的。这一点，在当时陕公干部之间，尤为重要。陕公有四方面军来的干部，也有一方面军来的干部，还有少数陕北地方干部，他们中又有知识分子出身和工农出身的区别。但我们在指导思想，坚决贯彻党中央、毛泽东的“搞五湖四海”的方针，对所有干部一视同仁。

用人唯贤。这也是我们搞好团结的重要原则。陕公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发现、识别、培养人材的经验。比如在认识人材方面，我们注意把干部的学习和生活、思想和行动、过去和现在、长处和短处、一时表现和一贯表现统一起来观察，防止片面性。对于干部犯错误，我们主要着重教育，启发他作自我批评，作组织结论时，让本人亲自参加，

允许有充分发表意见和上诉的权利，对于干部的鉴定，让本人过目，也允许保留意见。我们注意在实践中发现、培养、提拔和使用人材。陕公不少教员和学校干部就是我们从学员中提拔的，如柴树藩，他原是十七队的学员兼副队长，以后提拔为分校校务主任。

由于我们在团结方面，注意了上述原则，陕公的确成了一个温暖、团结、抗日的革命大家庭。学员、师生、干部之间互相友爱，充满革命情谊。陕公初创时，无力发统一服装，膳费也要自理，一些家在沦陷区或家境贫寒的学员，生活困难。但由于互助，问题都得到顺利解决。师生之间，关系很亲热。教员到学员那里，学员们都报以热烈掌声，对教员很有礼貌。有的学员还用自己每月一元钱的津贴费买香烟慰问老师。教员也虚心向学员学习，教学相长。如有的教员，向一些在白区做群运工作、妇女工作的学员调查，充实自己的教学内容。从国民党统治区来学习的青年，深切感到陕公与国统区学校有天壤之别。

第三，陕公所提倡的紧张，就是培养严守纪律、迅速果敢、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精神。陕公生活的军事化、战斗化，就是这种作风的具体体现。

清晨六点，军号把学员从梦中唤醒，二十分钟内，完成内务整理、洗漱，然后全校集合，点名早操，整队露天进餐。早餐后，稍稍休息，就开始了紧张的学习。晚饭后文娱活动，唱歌、看节目，也是集体的、有组织的。

结合游击战课程，经常进行军事战斗演习，如夜间紧急集合、行军、防空演习、作战等等。夜间的紧急集合，

并不事先通知，且多在深夜或黎明前进行。同学们听到紧急集合号声后，不准点灯，要求在十分钟之内，将每人的衣、物、书籍、被褥等，打成行军背包背上，然后奔赴指定地点集合。有的学员开始有些手忙脚乱，但以后就都符合要求了。集合后，有时是夜间行军，月色朦朦，戎步匆匆，走过田间小路，又爬上到处是荆棘的山坡。途中，又往往穿插着“敌机来了”、“发现敌人”、“捉俘虏”等演习。虽然紧张劳累，但同志们精神上无比欢快。因为他们懂得，这是民族革命战争的需要。

学员的学习期限，一般只有三个月，但严格的军事化、战斗化生活，使他们的思想、作风都很快发生深刻变化。初到陕公时，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短袄，“少爷”、“小姐”的气息，不能一下抛弃。但到毕业时，都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能吃苦耐劳，养成了集体生活习惯，工作说干就干。陕公就是这样熏陶、锤炼了祖国千万个优秀儿女。

第四，陕公所提倡的活泼，是指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目的都是为了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使学校团结进步、朝气蓬勃、欣欣向荣。

生活有紧张的一面，也有生动活泼的一面，有张有弛。特别是青年，爱说说唱唱、蹦蹦跳跳，千篇一律的死板生活是不行的。为此，学校在困难条件下，也非常注意开展文体活动，有篮球、排球、乒乓球、足球，还有拔河、掷手榴弹、爬山；晚饭后经常组织歌咏会，有时也有晚会。学校集会前，总要热烈地拉歌，歌声此起彼伏，高亢雄壮，激发着人们革命的热情。当时陕公最流行、最受欢迎的歌

曲有《陕公校歌》、《大刀进行曲》、《毕业上前线》、《我们在太行山上》、《黄河颂》、《游击队员之歌》、《松花江上》等等。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常来陕公辅导，吕骥是陕公的教员，郑律成是陕公学员，因此陕公歌咏的开展，在延安要算首屈一指了。

陕公的集体盛会不少，每期新生开学，要举行开学典礼，毕业又有毕业典礼，每逢陕公的周年纪念，盛况更为热烈。在这些会上，总要举行展览会（学校行政、教学、学员的学习与生活等）、体育比赛、墙报比赛，还有演出晚会及会餐。记得第二期新生开学典礼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参加，她在会上作了山西之行的报告，还与几位女同志合唱了几支民歌。

为了活跃文化生活及进行社会宣传，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剧团。在延安成立的是陕公剧团，在柘邑成立的是陕公流动剧团。后期陕公成立的是陕公文工团，团长是苏一平。这些文艺社团，先后演过《放下你的鞭子》、《游击队长》、《在敌人的牢狱中》、《补缸》等短小精彩的节目，也演出过《蜕变》、《母亲》等大型话剧。陕公自己编的《生死关头》、《送郎上前线》，曾受到社会的好评，胡乔木还请我校剧团到安吴堡演出过。黄天是陕公剧团的很有才能的领导者，他后来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陕公是统一战线的学校，因此它所提倡的活泼，最重要的还是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使所有成员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要形成这种局面，关键是民主，是民主集中制。这是陕公治校的根本指导思想之一，也是陕

公区别于国统区学校的根本标志之一。为此，在实践中我们遵循下列原则：学校成员，不论有无党派关系，一律平等；凡属于政治与理论方面的原则问题，遇有意见分歧，采取辩论、讲道理的办法解决；凡教学和工作中的实际问题，采用大家商量、讨论、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决定；学校教育计划与工作计划的讨论、决定、检查，由学员派代表参加，并在实施过程中监督；凡学校成员，对学校全部工作有权随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副队长以下各级干部，由学员选举；各队设立意见箱和救亡室，任何人都有权越级上告，每星期三为救亡日，救亡室的壁报是各队的喉舌。

在实践民主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对学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如不关心政治、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都采取疏导的方针，利用他们的实践来教育他们，使之对民主有正确的认识。

陕公的民主、自治，还突出地表现在学生会的工作和活动中。学生会是全体学生的自治机关，全校有学生总会，各队有分会，它的职责是：

(一)领导全体同学恪守学校的制度、规则、纪律；

(二)协助组织学习和开展课外研究（学生会设有各种研究会）；

(三)领导和组织学员的课外活动，如文娱体育、参观访问、参加社会实习等。

(四)组织和开展各种互助活动，如募捐支前、同学间的互助等；

(五)积极领导学生参加改良行政设施、改善生活和物

质条件的活动，如筹募学校基金等。

学生会在完成上述任务时，学校给予必要的指导。在组织上，学校尊重学生会的独立性，经常倾听学生会的意见和呼声，吸收学生会干部参加学校行政的各种会议，对学生会的活动时间予以充分保证。

学生会的干部，由学员民主选举，迅雷、刘春、齐语、王敬、李琦、顾明等都曾是陕公学生会的骨干。

六、艰苦奋斗是陕公的光荣传统

陕公的创建是白手起家的。校址最初设在延安东门外清凉山下机场旁边，校舍是一个汽车训练班的几间旧营房，开办费很少。工作人员只有成仿吾从中央党校带来的十多名干部。这就是陕公创建时人、财、物全部家当。但延安是全国抗日模范根据地，党中央指示我们必须把陕公办成全国闻名的革命大学。怎么办？我们的方针是因陋就简、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学员入校，第一课就是解决栖身之所挖窑洞。窑洞并不宽敞，一般七八个人共睡一个土炕，下面铺的是茅草，晚上翻身都感困难。至于上课、吃饭、开会等等，就都在室外。同学们说陕公的室内活动就是睡觉，确是如此。冬天，空中飘着雪花，教员头顶雪花上课；雨天，泥泞满地，教员赤脚上课。数九寒天吃饭，饭凉菜冻，若遇上狂风，饭菜里还要掺杂点沙尘、草芥。学员的被子一物两用，白天捆起来当坐凳，晚上打开睡觉。以后在露天广场用石头、泥块砌一些坐墩，算是小小的改善了。

一九三八年夏秋，大部分师生到了栒邑分校，留在延安的总校迁到北门外，师生自己动手盖了一个能容七八百人的礼堂，当时在延安算是一个宏伟建筑了。这个礼堂以后交给了党中央使用，人们称为“中央大礼堂”。

教材教具，都极缺乏。基本上没有教科书，图书资料也很少。因此，记好课堂笔记，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延安当时文具纸张很少，加上我们经费困难，故一学期每人只发一支铅笔，墨水用兰靛泡，每人发两张油光纸订笔记本，夜晚照明用小油灯，也是几个人共一盏，因此夜晚多用来举行讨论会。煤气灯也有，只在盛会或演出时才使用。

陕公初创时，我们在招生简章上写明：免收学费，衣服用具自理，膳费每月收六元。后来经党中央批准，学生一律免交膳费，还发统一的土布灰军装。生活津贴：校长五元，科长二元，科员一元五角，勤务、炊事员、学员均为一元。

主食是小米饭，土豆是主要蔬菜。以后我们到关中栒邑办分校，那里较富裕，经常能吃上白面馒头，同志们就很满意了。

为了克服困难，学校采取的办法是：第一，自己动手。就是自己挖窑洞、修操场、筑路、挖厕所、开荒种菜、打柴等等。第二，精打细算，节约开支。学校不用或少用勤务员，值班、清洁卫生以至印刷、搬运等工作，大部由学员自己干。延安医生少，学员懂一点医学的，既当学生又当医生。第三，开展互助活动。这个工作由学生会负责进行，口号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一些家庭

经济较好的学员，根据自愿原则，将自己多余的钱、衣物，交到学生会，由学生会统一分配给困难的学员。第四，开展社会募捐。《新中华报》、《新华日报》都刊登陕公向社会募捐基金的启事，学校还专门编了一本《援助陕公》的书，出版发行。学校还给每个学生一个募捐册，由他们向熟悉的亲戚朋友开展募捐。陕公的募捐活动，扩大了陕公的社会影响，国内外都知道陕公这样一所坚持抗日教育的革命大学，因此以各种方式积极援助陕公。我们也每隔一个时期，在《新中华报》、《新华日报》上载明募捐人的姓名、款数，刊登“鸣谢”启事。

陕公接受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援，同时也在物质上对全国抗战尽力所能及的援助。一九三八年冬，朱总司令发出了慰劳八路军的号召，陕公立刻响应。师生员工把自己身边最珍贵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很快汇集了约五千元的物款，慰问前线八路军将士。

七、陕公分校的创办与后期陕公

陕公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创办，到一九三八年五月，办了两期，共建立二十七队，先后接收和培训了约三千名学员。这个成绩当然是很大的，但仍不能满足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全国要求来延安进陕公学习的青年，与日俱增；另一方面，边区各部门、各个抗日根据地、各部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要求增添更多的干部。这时又有两个新的情况，一是由于延安的人口膨胀，粮食及各种日用

品日趋紧张；其次是国民党加紧反共磨擦，在西安去延安的路上设立许多关卡、检查站，沿途堵截、逮捕去延安的青年。根据上述情况，中央书记处和组织部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底相继开会，作出了在柤邑创办陕公分校的决定。柤邑地处关中，土地肥沃，粮食供给等较延安容易筹办；这里离西安近，青年较容易进入边区。中央决定成仿吾留在延安主持总校工作，着重办好研究班，为分校培养师资；由我任分校校长，率领一部分骨干去柤邑看花宫创立分校。我从学员中挑选了一批干部同往，其中有柴树藩、何定华、孙力余、吕光、席柳溪、赵志萱、华子扬、陈琅环等。从此陕公的主力即移到分校。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开始了我们的行程。

我们是分两批走的。第一批约一百多人，出发的那天正好有一队汽车从延安到西安去，他们首先坐汽车到耀县，然后步行去柤邑。我去分校是第二批，有四、五十人，其中有袁福清、申力生、陈伯村、季凯、何定华、邱春甫、华子扬、吴景直、朱改、张煜、倪淑英、缪文等。我们从延安出发，一路步行，经过甘家、郿县、直罗镇、店头、关门子、羊坡头、织田镇，最后到达看花宫，全由解放区通过。每日行军近百里，一个叫陈彤的女学员打着一面旗子走在前面，使队伍显得更为生气勃勃。七月初，去分校的人员均安全抵达看花宫。

看花宫据说是唐代杨贵妃看花的地方。这里过去牡丹花很多，也有些古迹。我们分校的校舍，全是借用老百姓的房屋，除校部和女生区队设在看花宫外，其余各区队分布在看花宫附近的平坊、门家、赵庄等村庄。教学用的桌

椅、板凳及其他生活用品，都是老百姓借给我们的。七月七日，在抗战一周年纪念日，陕公分校正式开学。

分校的领导班子、工作人员有以下这些同志：

校 长：李维汉

教 务 部 长：邵式平

政 治 部 主 任：周纯全；副主任：张然和

校 务 部 长：袁福清；副部长：柴树藩

党 委 书 记：申力生

党 委 组 织 委 员：陈伯村

党 委 宣 传 委 员：申力生兼

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吕 光

俱 乐 部 主 任：刘 春

合作社主任、总务科长：席柳溪

分校党组由李维汉、邵式平、周纯全、张然和、袁福清、申力生、陈伯村七人组成。

有了总校的办学经验，分校各方面的工作都进展很快。我们接总校编队，从第二十八队开始，编到五十四队。分校在组织上新建了区队一级机构，每四至五个队组成一个区队，相当于部队的营。区队有区队长、军事副区队长、协助员（相当于总支书记）。分校共有四个区队：

一区队，地点在坪房，区队长何定华，副区队长季凯，协理员廖作华。

二区队，地点在门家，区队长朱改，协理员李言。

三区队，地点在看花宫，区队长申力生兼，副区队长赵志萱，协理员吴景直。这个区队全部是女学员。

四区队，地点在赵庄，区队长孙力余，协理员方波。

分校的教学方针、教学制度、教学组织、课程设置等等，都与原来的总校差不多。总校不少有名的教员如何干之、李凡夫、李培之等也来分校任教。但由于学生增加快，教员总是不够，因此，除一些区队长同时兼任教员外，学校还成立高级队和几个研究室培训师资，充实教员队伍。高级队的学员是从普通班选拔的优秀生，学习期限一年，所学的课程较多较深。我们前后共办了五个高级队，廖盖隆、田家英、霍遇吾、张腾霄、胡华等就是分校高级队的学员。校部所设立的研究室，有中国问题研究室，由何干之领导，成员有季凯、刘春、陈琅环等；政治经济教研室，由李凡夫领导，成员有尹达、温济泽、李唯一；哲学研究室由陈唯实领导。研究室也有教员上课，以老带新，一边研究、一边教学。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党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及大会的结论，不指名地批判了王明放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领袖是毛泽东。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我在开完六中全会后回到分校，从十二月三日起，用了一个星期传达和讨论会议的精神。全校师生员工对会议

表示极大的关注，一致拥护会议的决议。根据会议的精神，我们的课程作了调整，集中讲授六中全会的文件，清除了过去讲授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观点。

分校的劳动任务比延安时增加了，这是因为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加紧了对边区的军事蚕食和经济封锁，学员除白天上课、晚上站岗放哨外，还要开荒生产，保证生活的需要。陕甘边界处有个何家山，离我们分校约七十里地，我们在那里开荒两千一百多亩，种了土豆、谷子、糜子、麻子、蔬菜。学校在那里建立了一个“陕公新村”，师生轮流到那里边劳动、边学习、边作群众工作。另外学校的合作社还试验自造肥皂，生产草鞋。

一九三九年初，党中央为加强对干部教育的领导，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任命洛甫为干部教育部部长，我为副部长。我即于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离开陕公分校，到干部教育部工作。我走前，曾召集校部、各区队、总支的干部汇报和总结陕公办学的经验，开了几天会。在此基础上，我写了一篇总结性的文章《战时干部学校教育》，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上。

这时，我党已在敌后建立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冀鲁边、山东等广大根据地，亟需大批干部。中央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干部教育，决定在晋察冀和晋东南两地建立抗大分校，并指令从陕公总校、陕公分校抽调干部前往办校。一九三九年一月，周纯全、邵式平各率一千多名师生，相继离校。周纯全等在晋东南的长治一带建立了抗大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邵式平等在晋察冀的灵寿一

带建立了抗大二分校，校长陈伯钧，副校长邵式平。陕公因此只剩下四、五百高级班学员。

为了节约人力、物力和有利于集中领导，中央决定延安的陕公总校也迁到看花宫，与分校合并，由成仿吾任校长。一九三九年一月，总校到达栒邑。新的领导班子是这样：

校 长：成仿吾
教务部部长：江隆基
政治部主任：张然和
总务处处长：鲍建章
党 委 书 记：申力生

合并后的陕公，其主要任务是办大学部，培养行政、民运及文化方面的高级干部。学习期限一年，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民主义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等。为了进一步培养专门学者，还计划在大学部上面筹办研究部，学生为大学部的毕业生和有相当程度的外来学生、研究人员，学习期限亦为一年。这个计划后来未能实现。除此而外，学校附设了训练班，专门培训不能进大学部的学员，学习期限为四个月。课程有中国问题、社会科学概论、三民主义、游击战争与政治工作、民众运动。这个训练班就相当于最初陕公的普通班。

一九三九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和斗争需要，党中央决定将陕公、延安鲁艺（院长周扬）、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由胡乔木、冯文彬主持）、延安工人学校（校长张

浩)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由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团书记,全部开赴晋东南前线。六月下旬,陕公由栒邑先迁回延安。七月初,四校完成整编任务,在离开延安前,我送他们到桥儿沟,党中央书记处的几位负责同志: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等,在桥儿沟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作了报告。去前线的学员送给毛泽东一面锦旗,毛泽东在报告中回赠他们“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游击战争、革命的团结。指出,只要好好掌握和运用这“三个法宝”,就什么敌人也不怕,什么困难也能战胜。七月十一日,在陕公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送晚会。七月十二日,他们踏上新的征途,向晋东南进军了。

一九三九年冬,党中央为了培养更多的抗战干部,又决定复办陕公,在延安重新招生,校址在北门外,人们称为“后期陕公”。由我兼任校长和党组书记。教务处长胡松,干部处长武光,总务处长刘汉兴,秘书长杨石人,总支委书记石砚之,副书记吴景直。学员编队与以前的总校、分校相衔接,从五十九队起编队,共有学员数百人。十二月初即开始上课。

一九四〇年九月,陕公改变学制,成立师范部和社会科学部。师范部主任孙力余,培养师资及教育行政干部,分本科与预科,本科修业期限两年,预科修业期限一年。社会科学部主任张仲实,培训抗战民运干部,也分本科与预科,本科修业期限为一年半,预科修业期限为半年。两个部的课程,除一般的政治课外,都还有各自的专修课程。一九四〇年,后期陕公还有计划地组织学员参加边区的民

主建政工作（如参议会选举）、办冬学扫盲、演出宣传、下乡搞社会调查，参加镇压汉奸、反革命分子的公审宣判大会等等。

后期陕公，在领导体制上成立了校董会，成员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李富春、高岗、张仲实和我。校董会通过了新的陕公简章、教育方针及施教计划。

后期陕公加强了民族干部的培训。一九四〇年八月，成立少数民族工作队，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有少数民族学员三十多人。他们自己选举队长、副队长，每十人编一个班，队指导员由学校委派，天宝即是这个民族工作队的学员。他们学习的课程有政治课、少数民族问题研究，还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学习期限一年。一九四一年夏，进一步成立民族部，六月三十日在陕公大礼堂举行民族部开学典礼。民族部有学员一百八十五人，包括蒙、回、藏、彝、苗、满、汉七个民族。民族部主任贾拓夫，杨静仁、汪锋分别任回、蒙班主任。以后又在民族部的基础上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学院，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陕公为党的民族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为加强民族团结作出了贡献。

一九四一年八月底，党中央为了精简机构，以及在延安办一所正规大学，使高等教育正规化，积累高等教育的经验，决定将陕公、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中央任命吴玉章为校长，赵毅敏为副校长，校址即原女大校址。延安大学设有师范学院、社会

科学院（院长艾思奇）、法学院三个院及俄文系、体育系两个专修科。另外还附设了中学部，分高中、初中两个分部。九月中旬即筹备就绪上课，九月二十二日正式举行开学典礼，有学生五百余名。延大的成立，结束了陕公前后约四年的光荣历史。

八、陕公的共产党组织和党员

陕公的每个队都设有党支部，支部由指导员、队长和政治助理员组成，支部以上是总支（在分校期间，总支设在区队），这是学校专做党务工作的机构。总支上面是学校的党组，总支书记也参加党组的工作。在分校总支上面设党委，党委书记参加党组。

陕公的共产党员和党的活动，有下列特点：

（一）党员的大多数是正在过着学习生活的新党员，即学生党员；学校工作人员中的党员，只占党员比例的少数。

（二）党支部的周围，是一大批非党青年，他们有极高的革命热情和学习热情，迫切要求学习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迫切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组织，把参加共产党当着自己崇高的理想。

（三）由于当时共产党在全国还没有公开获得完全合法的地位，陕公党的组织生活，也未完全公开。

（四）学员在校学习的时间很短，党的思想工作、组织发展工作，必须特别抓紧。

根据这些特点，陕公共产党支部的第一个任务，就是

要团结全体党员和非党员，保证完成学校全部教学计划、工作计划和学习任务。“学习第一”，是对学生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求学校工作、党支部工作也要贯彻“学习第一”的方针。党支部对组织好学生的学习，起保证作用。

陕公共产党支部的第二个任务，是接收新党员及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这个工作，是陕公支部最重要的工作。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党中央在《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中指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为大量发展党员提供了客观必要性和可能性，一方面是大批的革命分子要求入党，另一方面是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克服关门主义，大量地发展党员，强调要勇敢地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下级官兵中吸收党员。

在延安时，中央组织部直接抓陕公的组织发展工作。组织部长陈云、副部长李富春经常亲自找陕公的总支书记汇报，指导工作，还亲自给学员上党课及参加新党员的宣誓仪式。陕公第一期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就是在中央组织部举行的。

陕公发展新党员的方针是既慎重、又大胆放手。我们根据中央精神，强调不要受家庭出身的限制，不要怕社会关系复杂，只要表现好、思想进步、历史清楚，就可以发展。当时从国统区来的大批青年学生，从他们本人的情况看，多数是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先进分子，不少是“民先”队员。他们的家庭和社会关系虽比较复杂，但他们到延安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政治觉悟高的表现。对他们搞“唯成

分论”，是完全错误的。

陕公学员在校学习期限很短，一般只有三、四个月，因此发展工作必须抓的很紧。学员一入校，支书、助理员就同他们谈心，积极了解他们的情况。当时共产党在学员心目中的威信是很高的，所以他们一到陕公，立即找党组织谈思想，写自传。支部经过仔细研究，确定重点考察培养对象，一二十天之后，就找他们谈话，进行党的教育，端正入党态度。由于要求入党的学员很多，一些候补党员也要参加谈话的工作。

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比例，中央组织部开始要求我们发展三分之一，以后提出发展二分之一多。一九三八年洛甫对我说，陕公学员中要求发展百分之六十到八十的党员。可见当时发展组织任务之迫切、繁重。

新党员要填写入党志愿书，并有两个正式党员介绍。介绍人要对被介绍人的优缺点写出报告，说明介绍的理由。党支部审查通过后，还要写出支部讨论的意见和评语。经总支批准后，新党员履行宣誓仪式，最后编入支部，过党的组织生活。当时我们所发展的新党员，有的是很年轻的，一个叫徐光的，入党时才十五岁，田家英入党时才十六岁。

为了使党员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斗争传统，保持优良作风，我们严格党的组织生活，抓紧思想教育，强调党员在学习中必须比非党同志学得更刻苦努力，在职的党员必须比非党同志承担更多的工作，并积极完成在职干部的学习任务。

陕公要求共产党员必须树立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

奋斗的决心，必须模范地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坚持民主、团结等原则，必须在任何环境中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作一个先锋战士。

陕公的党的组织发展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都是很有成绩的。陕公创办不到两年，我们培养训练的六千多名抗战干部中，发展的新党员就有三千多人，他们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九、成绩、经验和教训

陕公创办后的近四年中，共培训了约一万一千多名学员。他们在校学习的时间虽有长有短，但都有共同的收获：第一，提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坚定了抗战意志与必胜信念，获得了抗战的理论与知识；第二，领悟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以及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的方法；第三，培养了民主精神与习惯，树立了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的决心；第四，初步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懂得了改造旧社会旧中国的必要；第五，养成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作风。

学员毕业后，响应学校提出的“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去！到困难的地方去！”的号召，愉快地奔赴战斗岗位。他们有的分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分到国统区或敌占区，也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少数转到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或通讯学校、卫生学校等继续学习。陕公学员分配的面是很广的。以第一队到第十队毕业的一千一百八十六

名学员分配为例：江苏三十七名，湖北七十九名，安徽七名，湖南十八名，江西十五名，四川十四名，福建二名，上海十六名，广东十四名，浙江三十名，广西一名，宁夏十二名，贵州四名，山东十七名，山西一百二十九名，河南三十一名，华北五十四名，绥远九名，甘肃六名，边区六百一十三名，陕西七十八名。从这个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东北、新疆、西藏外，差不多每个省都有陕公的毕业生去工作。这十个队的一千一百多学员中，留在边区的占一半多，这是较特殊的情况，因当时边区太缺知识分子干部，我们不得不首先满足延安、边区的需要。但以后陕公的毕业生，百分之八十以上分到前线去了。一九三八年冬，分校第一批毕业生，分到晋东南前线去的就有一千多人，“毕业上前线！”这是当时的光荣口号。

每期学员毕业，我们都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党中央负责同志也来参加。一九三八年一月三十日第二期学生举行毕业典礼时，毛泽东还给毕业生送来了“勇敢向前，牺牲一切，为着驱逐日寇、解放中国而斗争！”的题词。

毕业生离校，有的行程是很远、很辛苦的。分到太行山辽县前线的学生，从延安到临汾、再到辽县，行程一千四百多里，沿途要经过国民党顽军的不少关卡，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还会遇到敌机的轰炸，而太行山又是“四月仍结冰，八月即飞雪”的气候。但我们的学员依靠自己坚强的革命意志，在沿途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战胜一个个困难，胜利到达。许多学员始终保持着与母校的联系，经常向学校汇报自己工作中的收获、体会和问题，并提出对

学校工作的意见，在经济上还为母校的建设开展社会募捐。

从学校来说，也密切保持与毕业同学的联系。学校设有同学会的组织，编有同学录，设有通讯联络部，出版通讯集和纪念册。通讯集交流毕业生的工作情况，介绍母校各方面的状况，还刊载学校给毕业生的工作、思想指导方面的文章。每逢陕公创办的周年纪念，学校都要举行展览会、报告会，编辑纪念特刊，全面介绍学校各方面的情况、经验和成绩，并欢迎校友们返校参加盛会。

陕公学员奔赴各地，许多人一走上工作岗位，就担任游击队长、县长、科长等职，工作中勤勤恳恳、英勇战斗、历尽艰辛，为党为人民创建了光辉业绩。其中不少同志在战争年代就贡献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建国以后，当年的陕公学员、干部中不少人已成为党和国家各方面的重要骨干。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中，他们再次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今天，他们虽大都已过花甲或古稀之年，仍精神焕发，老当益壮，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辛勤工作。陕公桃李遍神州，陕公的光荣传统将永远哺育我们的后代。

回顾陕公的全部工作，最重要的一点经验，是我们较好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九三九年底党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强调在长期的和严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团结知识分子的极端重要性。决议批评当时一些干部恐惧、怀疑、排斥知识分子的种种错误思想，号召大胆地吸收和使用知识分子，条件成熟的要坚决吸收他们入党。陕公在办学过

程中，切切实实地贯彻执行了党中央的这一政策。我们为一切要求抗日的知识分子敞开大门，广泛招收他们前来学习。我们在思想上、生活上亲切关怀他们，政治上充分信任他们，使他们深感党的温暖。知识分子在国统区常常因失学、失业、政治上没有出路而苦闷，但他们一进陕公就朝气蓬勃，不仅是有用之材，而且有用武之地，刻苦地为祖国学习、为革命献身。

陕公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教育是启蒙性的，课程不多，教学时间也不长，但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因而他们学得快，兴趣高，生动活泼，效果也好。

陕公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是大胆放手的。有的同志把陕公的成就集中概括为“识别人材，培养人材，使用人材”，是有一定道理的。抗战开始后，我们边区和前线可说是什么都缺，但最缺的是干部、人材。当时各地方请求党中央支援的主要不是钱和物，而是干部。长征结束到达陕北时，剩下的红军和干部总共才三万多人，这同抗战初期的大发展形势极不相适应。因此，能不能在短期内培养大批干部，的确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公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都是以有利于干部的成长、使用为出发点，任人唯贤，量才使用，大胆提拔。学员一进陕公，两三个月就入党，三五个月就提干。党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上，让他们肩负重任，在炮火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延安培养了中国一个时代的革命骨干，陕公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然陕公的工作也是一分为二的，我在工作中也有不

少缺点和错误。有两件事，我至今深感不安。

陕公创办之初，几个从国统区来的青年学生组织了一个“卡尔学会”，其目的和主要活动是学习马克思主义。但陕公有些干部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当时的青年团、“民先”等组织都已解散，为什么在延安还要成立这样一个组织？为什么不名正言顺的叫马克思主义学会，而要叫“卡尔学会”？这个组织的青年学生作了辩解，我们一些干部仍然不理解。加上这些青年在一起，有时也难免发表一些批评性的言论，于是断言“卡尔学会”是一个近似托派性质的反动组织。那时王明、康生刚回国，他们把苏联的反托派斗争搬到延安，也影响了陕公。结果学校找“卡尔学会”成员一个个谈话，最后将为首的七八个学员开除出校，受牵连的其他几十个学员毕业时，也不给分配工作。后来的事实证明，“卡尔学会”并非反动组织，那些被打击的学员，并无不良企图，他们是好学的青年。他们中的一些人虽遭受错误打击，但仍不忘革命，有的还返回延安找党。此案发生时，我尚未到校，但最后处理时我在，我当时是学校党组书记。我听了汇报，未深入调查研究就处理此事，损害了同志，也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以为疚。

还有一件事是在后期陕公发生的。学校结束时，总务处还保存一些布匹，校务主任兼秘书长杨石人反映有些干部缺衣服，提议给他们每人做一件，我同意了，并由总务处长刘汉兴执行。后来中央组织部一位领导同志追查此事，认为这是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找我们谈话，我表示事情是我同意的，应由我负责。但后来给了刘汉兴同志警告处

分，调往前方工作。临走时，我深感不安，送他到中央党校前面的河边，一边走一边谈心，安慰他，鼓励他努力工作。他走后，我经常打听他的情况，得不到消息。“文化大革命”后有同志告诉我，曾经听说刘汉兴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英勇牺牲了。刘汉兴是一个为人忠实、工作勤恳的好同志，追忆至此，以志怀念。

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

李 运 昌

一、奉命出关，挺进东北

一九四五年，苏联政府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在击败德国三个月后，出兵远东。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次日，苏军一百五十万人组成诸兵种合成部队，沿中苏、中蒙、中朝边境三千五百公里的战线，从东、北、西三面，向日本关东军七十万人和伪军三十万人发动了进攻。

八月九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宣布我国抗日大反攻的到来。十日，朱总司令发布第一号命令，令各解放区部队、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游击队向日伪军举行大反攻，消灭日伪军，收复失地，积极配合苏军作战。十一日又发布第二号命令，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诗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冀热辽区党委、军区接到命令后，于八月十三日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全力以赴坚决执行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抽调八个团、一个营、两个支队，一万三千余人（占当时部队的三分之二），四个军分区司令员、四个地委书记兼政委及二千五百名地方干部，由我负责组成“东进工作委员会”和指挥部，率领挺进东北，先由靠近东北热河的第十四、十五、十六三个军分区部队组成第一梯队，由军区直接组成第二梯队，于八月中下旬分三路，北出长城各口，迅速进入东北、热河。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冀热辽区党委热河分委，由李子光同志任书记，领导热河党的工作；成立热河行政公署，领导热河的政府工作。

会议确定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热河的任务是：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东北、热河的日伪武装及日伪汉奸势力；接管敌伪城市，建立人民政权；收缴敌伪武器、资财，扩大部队；为后续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开辟通道；西路十四分区和中路十五分区，配合苏军解放热河，东路十六分区和军区第二梯队，配合苏军解放辽宁、吉林。

苏军从八月九日发动攻势到八月底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占领了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长春、沈阳、旅大、承德、赤峰等城市，占领了主要铁路线。但日军残余武装没有完全投降，广大中、小城市尚未解放，还有许多地方的日军在负隅顽抗，有的直到九月间，还在进行抵抗。至于伪满军还有成团、成旅的武装，不但没有缴械投降，而且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在城市

的伪满警宪，则持枪挂刀为国民党党部及汉奸维持会站岗放哨，压迫人民。我军进入热河、东北后，经过战斗和工作，才将他们解除武装、消灭或改编。

西路十四军分区部队第十三团、十六团一部和北进支队二千人，由司令员舒行、政委李子光、副政委黄文率领，八月中旬由冀东平谷出发，经兴隆向承德进军。在兴隆县争取伪满热河军管区西南地区司令黄方岗率伪满国兵四个团、七个讨伐大队和警察队共万余人起义，解放了兴隆、承德、滦平，进入承德与苏军会师。原在围场活动的北进支队王文所部，八月十八日，与由多伦南下之苏军会师，解放了围场、隆化等县城。

中路十五军分区部队第十一团、五十一团二千八百人，由司令员赵文进、地分委书记宋诚率领，八月十七日经喜峰口向热河平泉、凌源、赤峰、朝阳进军，八月二十日在平泉与苏军会师，在平泉外围解除了伪满军一个旅的武装，接管了八座县城，俘敌伪人员五千余人。

东路第十六军分区部队第十二团、十八团、朝鲜支队、临抚昌支队，约四千人，由曾克林、唐凯率领挺进东北，第一仗就攻打山海关。

二、与苏军会师，配合解放山海关

北宁铁路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大动脉，山海关是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从一九三三年日寇攻占山海关，盘踞山海关已十二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我冀热辽十六分区的

部队和人民，就是在山海关这块战略要地周围，长城内外进行抗战的。日寇经常从此出发向我根据地进行残酷的烧杀虏掠，“清剿”、“扫荡”，使山海关内及附近人民遭受了深重的苦难。日寇的法西斯暴行，对我国人民欠下了一笔又一笔血债。

一九四五年八月，我军举行对日大反攻时，山海关城内有日伪军两千余人，拒不投降，成为我军挺进东北的障碍。要攻克山海关，必须先打下山海关附近的外围据点。十六分区部队先打下了张各庄车站和樊各庄日军据点，又于八月二十日打下山海关外围的重要据点海阳镇。二十八日打下柳江和石门寨煤矿。拔掉了山海关外围据点后，八月二十九日，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由九门口出关，经一夜行军，于三十日上午迎着朝霞占领了山海关外的前所车站，解除了该站伪满军四百余人的武装，切断山海关至绥中敌伪联系。我军经十天作战，扫清山海关周围的日伪据点，使山海关成为一座孤城。这时，得知苏军从林西、赤峰方向经叶柏寿、凌源等地南下，向山海关方向前进。南下苏军由一位上校和一位少校营长伊凡诺夫率领，约六七十人，带大炮三门，分乘汽车五辆和吉普车，向我前所车站开来。这个消息使大家都很高兴。

抗日战争中，中苏两国军队相隔千山万水，各自在东西两个战场上，打击共同敌人法西斯军队，但从未见过面。一九四五年八月，由于苏军出兵东北，使两国军队会师，同在一个战场上打击日本法西斯军队，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事情。我军为表示热烈欢迎与苏军会师，临时抽调司号员，

组成“军乐队”，奏起“迎宾号”，部队排成四路纵队，呼口号，行军礼。两军领导人热情握手，亲切拥抱。中苏两支部队会师后，我方向苏军介绍：“冀热辽是我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八年来，我们在这里同日伪军进行了艰苦的作战。这次我们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伪武装，收复东北失地。”“目前山海关还有日伪军两千余人和日寇伪满驻该城的地方政府人员，没有缴械投降，对我挺进东北不利”，希望“苏军配合，共同攻打山海关，消灭守城敌人”。开始，苏军迟迟不表态，经我再三交涉，苏军报经他们上级同意，直到下午才同意配合我军攻打山海关。经中苏双方指挥员研究决定：攻打山海关由我军担任主攻任务，苏军以炮火配合。并决定八月三十日十二时以中国八路军司令官代表和苏联红军司令官代表的名义向山海关日军发出通牒，命令敌人无条件投降。通牒指出：“由于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强大苏联红军攻入东北，我八路军已全面举行对日大反攻。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已向日本全国下诏，接受无条件投降。现中国八路军和苏联红军两国强大军队已兵临山海关城下，即派中苏两军代表向驻山海关日军司令官送去通牒，命令驻山海关的日军和伪满洲国军，接到本通牒后，限于本日下午二时，率部于山海关南火车站无条件向中苏军队投降。”

我军派侦察科长郑公然、参谋董占林、敌工干事齐勇为中方代表，苏军派一名副连长和两名战士，手持转盘枪，挂着苏联国旗，共乘苏军吉普车驶往山海关送通牒。一小时后，日军一名上校带领一个班出城，与中苏代表谈判。

由我方当面交给通牒。苏军副连长提出：“限日军及伪军全部下午二时在火车站二百米处集合投降，交出全部武器。”日军指挥官借口北支派遣军司令官下村定大将奉有蒋介石命令，拒绝向中苏军队投降。苏军代表上尉副连长当即怒火冲天，连连对日军指挥官大骂，苏军战士端着转盘枪，吓得日军回头跑入城内，将城门关闭，顿时战斗气氛紧张起来。城内敌人也登上城墙垛口，作战斗准备。这时，我军部队已跑步到达山海关外不远的地方。我军指挥员和苏军当即决定攻城，以武力消灭守城敌人。

未攻城前，再次向守城敌军发出最后通牒，但日军守城司令官顽固不化，再一次拒绝投降，并对我军加强戒备。中苏双方指挥员当即下定决心，消灭守城敌人，并对攻打山海关作了部署。

三十日下午五时，各部队部署就绪后，在统一命令下，由苏军首先向守城敌军开炮轰击；十二团、十八团从南北两翼同时向指定目标发起攻击。一时枪炮声大作，敌人也进行顽抗。经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十八团由团长周家美指挥，首先夺取城内的制高点，将红旗插上“天下第一关”的城楼。掩护部队向城内突击。十二团在团长杨树元指挥下，首先夺取火车站，肃清敌人，而后炸开城门，迅猛向城内敌人突击。守城日军见城内外制高点已全部被我控制，形势不利，大都无心恋战；伪军眼看日军弃城溃逃，纷纷举枪投降；守城日军指挥官妄想组织巷战，进行顽抗，但由于我军攻击猛烈，敌已丧失斗志，有的举枪投降，顽抗的均被我军击毙，敌人此时已象无头苍蝇，到处乱窜，争相逃命。

我十二团、十八团及苏军部队对未放下武器的敌人，穷追猛打，不给喘息之机。经过三四个小时激战，至黄昏，除一部分日军逃跑外，城内日伪军被我全部消灭。

在我军与敌激战时，被压迫长达十二年之久的山海关人民，怀着对敌人十分仇恨的心情，不顾安危，提着开水，捧着食物，涌向街头，支援我军作战。在人民群众积极援助下，山海关战斗取得了胜利，被国民党蒋介石奉送给日寇的山海关及被奴役的数万同胞，才得到解放。

战略重镇山海关解放，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苏联红军共同战斗的结果，两军指战员万分高兴，共庆胜利时，不断发出“斯大林、毛泽东乌拉！”的欢呼声。

这次战斗毙日军二百余人，伪军五十余人。伪军警由于眼看日本失败，无心为日寇送死，当我军进入山海关后，稍作抵抗，即全部缴械投降。临榆县伪县长陈维廉及伪政府人员，伪满海关人员也缴械投降。此战共毙俘日伪军二千余人，缴获步枪三千余支，轻重机枪七十余挺，各种子弹百万发及大批日伪军屯积的军用物资。

我军打下山海关的消息，很快在长城内外传开，振奋了根据地的军民，被奴役的山海关人民更是欣喜若狂。当夜，山海关各条街道张灯结彩，悬挂彩旗，燃放鞭炮，商店开业，欢庆解放。山海关胜利的消息，还通过电台迅速传遍全国。《解放日报》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在第一版用大字标题进行了报道；新华社向全国作了广播：“华北军事要冲山海关，及沦陷敌手十二年之久的榆关镇，已

于八月三十日为我军光复。”

山海关收复后不久，我即率前方指挥部进驻山海关，与苏军在山海关的负责人和滦东地区专员于明涛同志见面。苏军表示很友好，并派汽车迎接我军入城，山海关人民群众也列队欢迎，场面非常热烈。

我十六军分区部队打开山海关以后，稍事休整，扩充，在曾克林、唐凯同志率领下，于九月四日乘火车进入锦州与苏军会师，并消灭盘踞锦州地区的伪满军两个旅及沿线伪宪警。然后由十八团组成锦州卫戍司令部，接管锦州市，控制了辽西战略要地。

三、进驻沈阳，肃清敌伪残余势力，建立民主政权

十六分区司令部接管锦州后，于九月五日率领十二团及朝鲜支队二千余人，乘火车迅速进入东北最大城市——沈阳。我军突然出现在沈阳，影响很大，苏军感到意外，对我军来得那么迅速有怀疑。开始，不准我军下车。面对这一情况，曾克林和张化东、刘云鹤同志带着参谋人员到苏军沈阳司令部交涉，卫戍司令卡夫东见到曾克林时曾责问：“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谁叫你们来的？”这很不礼貌的责问是曾克林同志没有料到的，但他仍心平气和地向他说，“我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八路军，是坚持冀热辽地区抗日的部队，奉延安总部的命令到东北，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接管东北

的。”卡夫东向曾克林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这时曾克林也说：“你们有最高统帅部，我们也有最高统帅部。我们的最高统帅部是毛泽东、朱德。我们是奉他们的命令来沈阳的。要我们离开沈阳，需要有延安总部的命令。”卡夫东很生气，发了一顿脾气，仍不同意我们进沈阳。这次交涉无结果。曾克林回到火车上和唐凯同志研究了情况，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有中央二号命令作根据，一定要和苏军据理力争，排除万难也要进驻沈阳。曾克林等同志第二次找卡夫东交涉，卡仍坚持不让下车，又无结果而回。直到下午三点，曾克林和唐凯同志第三次到苏军卫戍司令部。这次他俩态度都很强硬。一见卡夫东，唐凯同志便伸出胳膊，指着参加革命后在手臂上刺着的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标志连声说：“共产党、毛泽东！共产党、毛泽东！”这时出来一个政治干部叫格拉辛科，此人态度和气，较老练。曾、唐两同志向他们说：“我们是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队伍，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到东北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和你们共同作战了，在锦州又和你们部队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我们长期在这里坚持抗日，你们不让我们来，让谁来？你们如果不相信，可以打电报问莫斯科。”苏军听了这一席话，感到有道理，格拉辛科和卡夫东耳语进行商量，最后表示同意下车，但要驻到距沈阳市三十里外的苏家屯去。尽管这样，与苏军三次交涉总算有了结果。

傍晚部队接到下车的命令，两千多人迅速集合得整整

齐齐，干部战士身着一色黄军服，战士每人一个钢盔，带着子弹盒，枪都上了刺刀，每连九挺机枪，队伍显得威武雄壮。

八路军到达沈阳的消息很快传开，成群结队的工人、学生、市民，冲破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反动势力的阻挠，自动涌上街头欢迎。广场和街道两旁聚满了人群，当部队排成四路纵队沿大街唱着“八路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歌曲出发时，沿途群众高呼口号：“不当亡国奴！”“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八路军万岁！”“抗日战争胜利万岁！”当时国民党地下军一个坏家伙趁机捣乱，扔出一个手榴弹，炸伤了一个老百姓，群众一拥而上，当场将他打死。人们骂着：“十四年东北人民被卖国贼蒋介石国民党出卖，过的是亡国奴生活，吃的是‘橡子’面，穿的‘更生布’，日本鬼子、汉奸、特务屠杀、欺凌，我们盼望着解放，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你们还捣乱！”当人们看到自己的队伍行进在大街时，许多人流下了眼泪。人们说：“这下子好了，该是出头的日子来到了！”

当队伍行进中，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前呼后拥，并肩而行，象举行一次庆祝胜利解放的大游行。苏军有两辆装甲车为前导进行护送。当苏军看到这么多老百姓自发欢迎中国八路军时，也非常震惊。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马上改变原先的态度，派了两名上校，坐着吉普车，前来追赶队伍，在途中拦住说：“你们不要去苏家屯了，就住在市区故宫东面的小河沿。”于是，部队又迈着整齐的步伐，高唱着歌曲，

走向小河沿驻地。许多群众夹道欢迎，直送到驻地，不愿离去。

九月六日，十六军分区司令部搬进原伪满沈阳市政府大楼，政治部搬进原日本宪兵司令部，部队仍驻小河沿。这样，我军力排万难，总算站住了脚。当天，苏军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副司令格拉辛科，派人来市府大楼找唐凯同志到苏军司令部会谈。他们询问了我党我军的一些情况，及党员在部队中的比例等等。唐凯同志回答了他们提问的问题。九月七日下午，苏军驻沈阳最高司令部，近卫军坦克第六集团军派来两名上校军官到市府大楼十六军分区司令部，通知曾克林、唐凯说：“斯大林、莫洛托夫来了电报，你们确实是毛泽东、共产党的部队，请你们两位将军到司令部去。”

曾克林、唐凯到了苏军司令部。最先打击日本关东军、攻击沈阳的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上将和军事委员图马尼扬中将，即苏军驻沈阳的最高领导人亲自会见曾克林、唐凯同志，双方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苏军驻沈阳的各军兵种负责人、军长、军事委员们均在坐。

克拉夫钦科说：“你们来沈阳，我们没有去车站欢迎你们，很对不起，这主要是中苏条约的限制。”

曾克林、唐凯同志说：“八年抗战，我们一直坚持在最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冀热辽是我军战斗的地方。这次我们出关，与你们部队会师，配合作战，打开山海关，就是我们这支部队。”

唐凯补充说：“正因为我们坚持了这个地区的斗争，所以才来得这么快。蒋介石消极抗战，躲在大后方，他们是不能这么快到这里的。”

曾、唐还向苏军讲了延安最高统帅部发表的第一、二号命令的精神。当唐念到“为配合苏军有效地消灭日本关东军、伪满军，收复东北。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时，克拉夫钦科、图马尼扬，各军负责人均非常高兴。

克拉夫钦科说：“我们不叫你们将军了，称你们为同志，我们是同志式的谈话。”

接着，就对今后我军和苏军如何配合，肃清各地敌伪武装势力问题，进一步进行了会谈。会谈后，我军成立了沈阳卫戍司令部、政治部，曾克林任司令，唐凯任政委，并发布安民告示。九月三十日，党中央正式下达命令，令进入东北的我军改用“东北人民自治军”番号。苏军也通知驻东北各地的部队，凡佩带有“东北人民自治军”标志的部队，可以在各地自由活动，不受限制。从九月七日会谈后，苏军对我军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这对于后来我军继续挺进东北，开创东北的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十六分区部队进入沈阳后，得到很大发展，并一度接管看守关东军在苏家屯的军火仓库，取出大批武器弹药，装备了部队。九月十四日，十六分区部队即开赴南满，接管鞍山、辽阳、营口、抚顺、本溪等城市，并坚决消灭了南满的日伪残余势力。我朝鲜支队参加了消灭通化日军三千余人的战斗。盘踞辽阳的伪满军一个团，在伪满大臣于

芷山的儿子于学谦指挥下，拒绝向我军投降。经过激烈战斗，将其全部消灭。从本溪逃入平顶山的日军残余千余人，在我驻本溪部队发出通牒后，仍拒绝投降，被我军二十一旅及警卫部队围剿歼灭。仍在辽阳奉集堡机场的关东军林木航空大队（有飞机二十余架），在我军政治攻势下，投降我军。驻连山关、凤凰城的日军航空大队地勤人员向我投降。伪保安部队一千五百人，经我二十一旅包围，解除武装。

我冀热辽部队自八月中下旬进入热河、东北，至十一月底，各部队经过战斗和发出通牒，共解除伪满军三个旅、二个团，六十个县、市的伪满警察大队等，约四万人的武装；以及日本关东军残余五千人。并在兴隆争取伪满热河军管区西南地区司令黄方岗部万人和青龙县伪讨伐队张金祥部两千人起义。

九月初，我率领前方指挥部和第二梯队五千人及大批地方干部出关，九月十六日进入沈阳。当时，苏军态度很好，派三百人到车站欢迎。

我十六分区部队进入沈阳后，即与东北抗联冯仲云同志取上联系。九月中旬，在长春的原东北抗联的领导人周保中等同志又亲来沈阳与我们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我军进入沈阳后，东北抗联同志利用广播电台，向全东北人民传播了冀热辽部队已到沈阳的消息，这既鼓舞了东北人民，也大大帮助了我们。关内各解放区，主要是晋察、山东派到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原在东北潜伏的地下党员，得到消息后，纷纷前来接关系，仅东北工作委员会系统就有一

百余人。这些同志向我军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对我军接管东北城市，建立人民政权，收集资财，肃清敌伪残余势力，扩大部队，都有很大帮助。

四、曾克林飞赴延安，东北中央局成立

冀热辽出关部队攻克山海关，迅速进驻锦州、沈阳，提高了我军地位，扩大了我党影响，争取先机之利，接管了城市，给日伪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以严厉打击。但由于东北是重工业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妄图从苏军手中和平接收东北，因此，国民党和我党争夺东北的斗争十分激烈。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中央的方针政策，及时得到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但当时通讯技术落后，不能达到目的。

恰好这时，苏军驻长春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也要与我中央联系。九月十四日，苏军代表卫斯别夫上校及翻译谢德林和曾克林一起乘机飞赴延安。在机场，受到杨尚昆、伍修权同志的迎接，并与彭真同志见了面。当时，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已去重庆和国民党谈判，中央工作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当日少奇同志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同志关于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及我军在东北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朱德、任弼时、彭真、陈云、彭德怀、叶剑英、张闻天等同志。中央领导同志听取汇报时，不时提出问题，曾克林一一作了回答。听取汇报后，中央对冀热辽部队接到命令后，迅速挺进东北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

曾克林同志在延安期间，苏军上校卫斯别夫代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延安总部转达了苏军照会，并与朱总司令进行谈判，达成协议。苏军同意将原属冀热辽抗日根据地范围内的锦州、热河两省完全交给我军接管（锦州在伪满时为一个省，辖辽西十四个县）。

中央听取了曾克林的汇报后，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和东北的情况，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调遣大批主力部队和干部开赴东北。并于十四日深夜（实际是十五日凌晨）作出决定，成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中央局，立即赴东北开展工作。

九月十七日，彭真、陈云、伍修权、叶季壮等同志，由曾克林陪同，从延安起飞赴沈阳。由于天气不好，当天飞机在山海关着陆时出了点故障，叶季壮同志受了伤。中央领导同志在山海关休息一夜，于十八日由山海关乘火车前往沈阳，途中在锦州又听取了锦州卫戍司令王珩、政委徐志的汇报。

当天，东北局同志乘火车平安到达沈阳。唐凯、罗文、汤从烈等同志前去迎接。陈云同志在市府大楼向驻军干部讲话：“你们搞得好，执行中央的命令坚决勇敢，先机占了东北，这对中国革命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央向你们慰问。”并对今后的工作作了指示。

当天晚上，彭真、陈云等同志住在原张作霖大帅府。十九日，在西楼召开了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由彭真、陈云同志主持，伍修权、叶季壮、李运昌、朱其文、

曾克林、唐凯、段子俊、刘达、段苏权等二十来人参加。会上，彭真、陈云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心和战略方针，确定东北局的任务，是力争控制全东北，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迎接党中央派往东北的大批干部和部队，粉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阴谋。并确定东北局当前任务是立即收缴敌伪武器，加紧剿匪工作，严厉镇压汉奸和敌特分子；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准备回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接管的城市中摧毁伪政权，建立各级民主政府；在农村组织群众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大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肃清国民党的影响。

会议之后，我即通知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中共中央东北局已到沈阳。

东北局到沈阳后，加强了对东北工作的领导，并报请中央，于十月三十日批准正式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为政委，罗荣桓为第二政委，程子华为副政委，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肖劲光为副司令，肖劲光兼参谋长，伍修权为第二参谋长。从此，东北党政军工作均有了强有力的领导。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东北局会议提出的任务，我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后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 1.放手发展武装，迅猛扩大部队。由于东北地区辽阔，大、中城市很多，在其他解放区部队尚未到达东北之前，我出关部队深感兵力不足，急切要求扩大部队，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这种情况，我冀热辽部队采取以老部队

为基础，吸收新兵的方法，以连扩为营、团，团扩为旅。新兵大部分是矿工、工厂产业工人；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被俘人员和关内被抓到东北的劳工；同时也收编和加委了一部分伪满国兵和警察队。从八月到十一月，我冀热辽出关部队迅速发展为十二个旅（内有两个炮兵旅）、两个支队、十个独立团，约十万余人。其中进入辽宁、吉林、齐齐哈尔的部队发展为十个旅、两个支队和十个独立团，约九万余人；进入热河的部队，发展为两个旅、一个团，一万四千余人。此外，在热河、辽西发展地方武装一万余人。在扩军过程中，由于我们扩充部队的心情过急，对改编的伪军审查不严，致使后来国民党军进攻时，出现部分新部队叛变事件。这种情况，我们在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整编，及时得到了纠正。

2. 镇压敌伪汉奸特务、国民党地下军，消灭政治土匪。当时苏军只占领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许多中、小城市尚在敌伪手中，广大农村的敌伪势力还原封未动。残余的伪军宪警，被国民党加委，大部变为国民党地下军，形成政治土匪，到处抢劫民财，破坏公家财物。这些反动势力，对我威胁很大。根据东北局指示，我进入东北和热河的部队，把剿匪作为接管东北的一项重要任务。从九月到十一月，我冀热辽部队和已进入东北的我兄弟部队互相配合，并在苏军支援下，坚决地进行了剿匪工作，剿灭大量土匪。

盘踞在南满鞍山、海城、本溪、辽阳以东山区的股匪，约万余人，由大汉奸邓国卿统领，散布于千山、七岭子、

山印子、白石子一带，以千山为中心，经常控制南满铁路一段交通，进行破坏，对我威胁很大。十一月，由曾克林组织二十一旅、二十三旅，在鞍山保安旅和苏军配合下，数路合围，经三天激战，占领该匪控制地区，毙匪官兵三百余人，俘三千余人，内有日军一千五百人；缴枪七百支，轻重机枪二十三挺、机关炮三门、手枪五十余支；子弹三万发；战马五十余匹、汽车四十余辆。其余匪徒溃逃。

盘踞在抚顺山区的股匪二千余人，九月，我二十一旅组织部队围歼，将其全部消灭，缴获所有枪支弹药。

由奉吉路辉南、磐石一带进入长白山区顽抗的伪警察二千余人，十一月，由二十四旅马骥组织围剿，大部消灭，缴枪千余支及一批弹药。盘踞在辽西阜新、黑山地区的国民党地下军，和惯匪崔辛伍、于海川、曹老五等几股土匪，约四千余人，九月底，由我驻锦州的二十二旅组织部队围剿，经数日追捕，除一部惯匪逃入内蒙古外，大部被歼灭，缴获枪支三千余支，子弹百万发及大批物资。

盘踞辽北榆树一带的伪警察千余人，在苏军配合下，由黑龙江支队围剿歼灭。

进入热河作战的十四、十五军分区部队，也积极进行了剿匪工作。热河二十五旅副旅长杨思禄、副政委郑维佳率部队剿灭北票、黑城子土匪四百余人，二十四旅副旅长陈云中率部队与冀察军区钟辉琨部队配合，剿灭丰宁县大阁的土匪五千人。

张苏率三十旅第二次剿灭阜新、彰武土匪千人。

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辽宁、吉林、热河地区被我剿

灭的政治土匪及国民党地下军约二万余人。

3. 摧毁伪政权，建立民主政府。我冀热辽部队前委到沈阳后，立即派李海涛、王化一、刘可天等率部到辽北白城子、齐齐哈尔和四平街接管城市，发展部队。同时，成立了辽宁行政公署，朱其文任主任；成立沈阳市政府，由白希清、焦若愚任正副市长；刘云鹤为鞍山市长；张士毅为辽西专员，王木林为通化专员，夏尚志为辽北专员，着手接管辽宁省及吉林西部政权。建立了四十多个市、县政府。进入热河的部队，顺利接管了热河全省地区，九月初即成立热河行政公署，李子光、杨雨民为正副主任。并于十一月选举产生了以李运昌为主席、李子光、杨雨民为副主席的热河省人民政府，成立热东、热西、热中、热南、热北五个专员公署和承德、赤峰等二十个市、县（旗）政府。

4. 收缴敌伪武器、物资、器材，装备部队。冀热辽部队进入东北、热河后，利用三个多月的时间，从敌伪手中收缴一批武器、物资，装备了我军。曾克林部进沈阳后，苏军曾一度将沈阳苏家屯日本关东军军火库交我军看管，我驻沈阳部队及时取出了一批武器装备了部队。但在曾克林去延安后，苏军又将军火库收回去。而在这段时间内，我军又在抚顺、本溪、辽阳、安东、锦州等中小城市搞到了一批军火物资，为装备扩编的新部队和出关部队创造了条件。

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宣传工作。尖兵剧社演出了《合流》、《地狱人间》，唤起和教育东北人民。还在锦州、本

溪等地接收了日伪广播电台，并利用电台，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传播我党我军的声音，揭露蒋介石的丑恶面目。

五、整编部队，以自卫战争 阻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由于我军已先机控制了东北，在辽西、热河、南满、东满、北满接管了大批城市，国民党经外交途径接管东北的企图已失败。蒋介石决定依靠美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以武力抢占东北。十月，蒋军由美舰运送陆续在秦皇岛登陆，开始向我军进攻。

中共中央和东北局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及时部署军队以自卫战争阻击国民党的进攻。由于冀东、山海关、辽西、热河是华北通往东北的必经之地，葫芦岛、营口、秦皇岛是敌人登陆之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央军委和东北局令我在锦州执行三项任务：（1）整编部队，准备作战，控制山海关和葫芦岛军港；（2）接运部队和干部继续进入东北；（3）辽西党政军工作受东北局统一领导，听林、彭指挥。我十月由沈阳返回锦州后，立即组织十九旅、二十二旅和冀中的三十一团在山海关、葫芦岛构筑工事，准备还击进犯的国民党军；同时传达军委的命令，责成冀热辽军区副司令詹才芳同志组织冀东野战军，准备配合山海关和古北口作战。

这时在辽西的冀热辽部队二万余人，除三个老团四千人外，大部分是新兵，急需补充老部队作骨干，提高战斗

力，适应作战需要。

十月下旬，沙克、黄永胜、文年生带四个老团，共四千七百余人到达锦州，报经东北局批准，与冀热辽军区在辽西的新部队合编，以老部队为基础重新配备干部。在山海关战斗打响后，抓紧时机进行了合编。

文年生的警一旅二个团，分别与冀热辽新部队第二十二旅和三十旅合编，以欧致富为二十二旅旅长，周家美为副旅长，陈志彬为政委，吴宗鹏为副政委。张德发为三十旅旅长，谢镗忠为政委，张苏为副旅长，徐乃斌为参谋长。

黄永胜部教一旅一个团，冀热辽特务一团，冀中的三十一团合编为第二十七旅，以丁盛为旅长，韦祖珍为政委。

十一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为准备与国民党作战，成立五个前线指挥部。其中，第三前线司令部，负责统一指挥由营口（不含）至叶柏寿之线的部队，我兼任司令和政委，黄永胜、文年生、沙克为副司令员，雷竞天为副政委，辛世修为参谋长，朱军为副参谋长。

辽西部队于十一月初整编完毕。

此后，曾克林、唐凯在南满扩大的部队，和冀热辽军区留在沈阳、齐齐哈尔、四平街的部队，全部交东北局直接领导，均按东北局指示，分别与老部队进行了合编，增强了骨干，巩固了部队。

十月下旬，国民党军集中先遣部队十三军和五十二军七万人，从秦皇岛登陆（该港由美军防守）。先占我海阳

镇，十月二十五日开始向我山海关守军发起小规模进攻。此时，我守山海关部队为冀热辽第十九旅二个团和二十二旅一个团。这一时期，美军飞机经常出动到山海关低空侦察威胁，有时多达数十架，并通牒我军撤离山海关，被我军拒绝后即派出海军陆战队为国民党军打头阵。十月二十八日，美军数十人和国民党军官一人，分乘数辆汽车，向我山海关守军挑衅。在十九旅旅长张鹤鸣指挥下，我守军坚决予以痛击，击毁汽车一辆，打死美军一人，缴获吉普车一辆，俘美军四人、国民党军官一人。其余美军狼狈逃回秦皇岛，三天未敢来犯。

十一月初，山东部队第七师师长杨国夫同志，带一个旅七千人到达山海关。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部命令杨师防守山海关，并统一指挥山海关部队作战。山东七师是老部队，擅长夜战，曾两次夜袭山海关南面敌人，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并缴获了不少武器。

当时，我守山海关九门口部队有山东七师一个旅，冀热辽十九旅的二个团和二十二旅一个团，共万余人。从十一月八日至十六日，敌以七万人向山海关九门口正面进攻，激战多次均被我军击退，乃以三个团出城子峪口，迂回山海关和九门口侧后，企图包围我军。我因兵力不足，无预备队阻击敌人，在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不得已于十一月十六日撤出山海关。山海关保卫战从十月二十五日开始，至十一月十六日撤退，共二十二天。

敌占山海关后，从十一月十六日到二十五日，继续沿铁路向东进攻。我新整编三个旅未来得及整训，即开赴前

线，在兴城、锦西一带节节抗击敌人，展开激烈战斗。但由于敌人实行战略性进攻，我参战部队未经训练，战斗力差，未能阻止敌人前进。

这时，林彪已到前线指挥。华东新四军三师和山东一、二师主力刚到辽西一带，由于部队长途行军疲劳，未获补充装备，高桥伏击战未能打好，致我军被迫于十一月十六日撤出山海关后，又于十一月下旬先后撤出绥中、兴城、锦西等地。接着，林彪又下令主动撤出锦州。十一月二十六日敌占锦州。从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冀热辽部队与山东七师，在山海关和辽西并肩作战一个月，打击了敌人，挫败了敌人锐气。虽未保住山海关、锦州两地，但拖延了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时间，达到了接运干部、掩护部队进入东北的目的。

至十二月初，各老区部队及大批干部经过长途行军，经过冀热辽地区和海路先后到达东北，实现了中央派十万部队、二万干部进入东北的战略计划。这些部队和大批干部的到达，为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我军从锦州、辽西撤退后，地方武装多有叛变，并有一部分勾结国民党土匪，攻占建昌、盘山、台安等处，后方不稳，也影响了前方作战。从这一点，可以看建立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

敌占锦州后，辽西战役基本结束。林彪率主力六万人撤至阜新、黑山、北镇一带，冀热辽部队撤至北票、朝阳、义县一带。

十二月中旬，按中央和东北局通知，林彪在阜新会议

后，他率新四军第三师和山东三个师（一、二、七师）及冀热辽第十九旅开赴西满，我率热辽纵队返回热河。此后，冀热辽中央分局、军区为创建巩固的冀热察辽根据地，配合东北作战，进行了艰巨的工作：进行了土改，剿灭了土匪，扩建了主力部队十四万人三个纵队，六个独立师，与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辽沈决战和解放全东北的伟大斗争。

解放军打到那里 火车就开到那里

——回忆辽沈战役中的铁路运输

吕 正 操

辽沈战役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当年东北广大铁路员工们为保障决战胜利而作出的牺牲和贡献，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党中央为了在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派出十万大军，两万多名干部挺进东北。我于十月下旬来到东北，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总司令员。

刚刚光复了的东北大地，到处是战争的创伤。铁路被破坏得百孔千疮。线路有三千七百多公里被拆毁，桥梁、涵洞有一千零三十多处遭破坏，通信、信号、给水、站舍等设备都遭受了严重损坏。经过我们大力抢修，到一九四六年六月，东北解放区的铁路通车里程已有四千六百九十多公里，这些铁路均由各地方铁路局分散管理。东北局为了加强对铁路的管理和统一指挥，更好地支援前线作战，一九四六年七月决定成立东北铁路总局。开始由陈云同志兼任党委书记、总局长，李富春同志兼任党委副书记。不

久任命我为总局长兼政治委员，徐光生、郭洪涛、黄逸峰、马钧、陈大凡等同志任副局长，陈坦同志任政治部主任。从那时起，我在东北铁路总局一直工作到辽沈战役胜利结束。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广大铁路工人刚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发扬了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刻苦兴家，日夜奋战，克服了器材不足、粮食缺乏等种种困难，抢修铁路，复活机车、车辆。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解放区的铁路线也逐步延长，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加快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铁路员工们提出：解放军打到那里，铁路就修到那里，火车就开到那里！到辽沈战役前，东北解放区又接收和修复铁路五千七百多公里，通车线路里程达九千八百一十八公里，占全东北通车线路里程的百分之九十八，修复机车八百八十五台。这就为支援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年，在东北铁路工作的苏联同志，特别是中长路茹拉夫廖夫局长，在建设人民铁路，支援战争中，也给了我们很大帮助，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运送主力 直插辽西

一九四八年八月下旬，东北铁路总局接到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东野”总部）的紧急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最秘密的情况下，把在东线的东丰、大兴镇、

西安（今辽源）、烟筒山一带的三纵、炮纵、二纵五师和六纵十七师，迅速运送到西线的新立屯、西阜新等地区，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打击。为保证前线作战的胜利，要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运两千万斤粮食和作战物资到前线；为堵截与包围长春之守敌，要从后方向吉林、四平运送十九个独立团。同时，还要准备几个列车随时供第一纵队机动运输之用。

总局党委认为，这次军运关系到东北战场战略部署的实现，关系到整个东北解放战争的胜负。党委决定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价，坚决保证这次军运任务的胜利完成。我们随即迅速、周密地进行运输准备工作。

为了保证这次军运的秘密指挥，“东野”总部和东北铁路总局联合组成了临时军事运输委员会，在梅河口铁路办事处、郑家屯铁路分局设立运输分委会。军铁双方又在装卸车站及主要中间站派出特派员，全权指挥一切装卸及车辆调配，随时与分委取得联系。分委则随时与总委取得联系，并坚决执行由总委下达的“东野”总部与铁路总局的各项命令。这样，不论总委与分委均指定了专人负责，使各铁路线调度指挥工作，得以在严格保守秘密又十分复杂的战时情况下，既高度集中统一又机动灵活，有条不紊地进行。

当时，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在连续遭到我军的打击后，已被我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和北宁线几个孤立据点内，东北广大地区也已经控制在我们手中。但是铁路东线的梅河口至四平段，西线由四平到郑家屯区段，开通到西阜新

区段，都在敌机空袭范围之内。其中郑家屯、彰武、新立屯至西阜新一带，是敌机的重点轰炸区，每天从早到晚，敌机频繁轰炸扫射，袭扰不停。而由梅河口起经四平、郑家屯到新立屯、西阜新区段内，每天通过能力只能容纳六个列车往复，而且列车编组不能超过三十二辆。我们根据这些情况与部队密切协同，打破平时运输的常规，商定了编组计划、装卸车时间等事项，坚决把参战部队按计划集中在一旬内全部运往前线。

首先是必须把郑家屯、西阜新闻，各站停留未卸的重车七百四十多辆，在大规模军运之前卸后排空。总局下达指示后，各站立即行动，很快将重车全部卸完，把空车排送完毕。另一方面为保证前线通讯畅通，在器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把通辽、西阜新闻刚刚修复的通讯线路，从原有的三对临时增设为四对，并安装了区间电话和直通电话。齐齐哈尔、西阜新闻的电报业务，也抢在九月上旬开通。在此期间，吉林局动员职工群众更换腐朽枕木六千四百一十三根，捣固线路六千九百三十米，并将被破坏了的大兴镇的站台修复。为了便于部队兵员乘车，粮食、弹药等作战物资装车，总局从哈尔滨调拨一批钢板给各前沿装车站。后方各铁路局，为了保证军运列车运行安全，千方百计减缩管辖区内运用车的风管，拨出二千三百四十多根风管和一批胶皮垫圈，使军运列车全部安上了制动风管。当时运用机车极其紧张，总局想尽一切办法给郑家屯分局、吉林局配备了足够的运用机车。

最后，东北铁路总局对这次军运的组织领导和人员配

备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安排。梅河口、四平、西阜新一线，刚收复不久，特别是彰武以南地区，职工缺员很多，成份比较复杂，繁重的军运任务又落在这样的地区。总局下决心从各局抽调一批工人、干部充实了这一地区。仅齐齐哈尔局就调出一千二百多名政治可靠、有业务技术经验的工人、干部，分派到西线各站段。齐、吉两局的主要负责同志都亲自到前线指挥运输。每个站都派干部具体指导，每趟列车都有干部添乘。如齐齐哈尔局局长黄铎同志亲自到郑家屯分局组织运输；郑家屯分局长廖诗权、政委尹诗炎，分别到彰武、西阜新就近指挥军运；吉林局副局长孙鲁光同志到梅河口坐阵，郑家屯分局运输科长常克、副科长何彬和四平办事处主任沈影同志亲自坐台指挥行车。齐、吉两局还派出大批干部到列车运行的重要地点亲自参加作业。

一九四八年九月六日，“东野”总部下达命令：十日晚开始运输。总局迅速调集车辆。九日，集中车辆达一千二百二十四辆，其中棚车六百八十四辆，敞车、平车五百四十辆。九日晚，以梅河口为主，以朝阳镇、四平、吉林、西安为辅的编组站，也编好列车；部队上车站为东丰、大兴镇、西安，下车站为新立屯、新邱、西阜新，同时做好了一切准备。

十日晚，这次大规模军运开始，军列按计划正点发车。

当前行列车已驶进四平站时，突然接到“东野”总部首长急电，命令连夜将已经发出的两个军列，立即返回原地下车待命。同时，将已经停运的混合列车又恢复运行。这

是“东野”总部为了迷惑敌人，防止暴露目标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十二日夜晚，军运列车又按计划开始运行。

这次运输中，西线郑家屯、彰武、西阜新；东线梅河口、四平站是关键地区，敌人的飞机不但白天来，夜间有时也来，四平最多一天达七十二架次之多。这两个站和沿线的运输一线员工，为了保证军列不被敌机发现，夜间都是采取无灯火作业。扳道员扳完道，为了确认道岔是否密贴，还要依次用手去摸，以保证军用列车及时安全地、源源不断地开往前线。

军运开始后不久，辽西大雨连绵，西辽河大水猛涨，水位比最高的一九四六年还超出一米多。钱家店区段的线路被水淹没，水势凶猛，线路状态不明，不知路基是否冲断。在这关键时刻，通辽工务段段长乔子龙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用手柱着木棍，趟着大水，顶着激流，在前边一步一步地探查线路，慢慢地引导机车把军列安全送过被淹区段。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复杂的战争环境下，长距离、短时间、大规模地运送兵员和装备，没有发生什么事故，这在现在看也是难得的。

严守秘密，在这次军运中做的也很成功。运送部队的列车全用棚车。列车出发前，车门加锁，贴上封条。列车运行时，看不到部队人影，听不到部队声音。就连铁路员工也不知道运送的是什么。因此，在义县解放后，敌军俘虏说，你们攻打义县时，我们都不知道贵军是从哪上来的。

九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按计划完成了三纵、二纵五师、炮纵等主力部队到达西阜新的军运任务。由于各路局

员工的努力和军队的配合，运输速度比预想的还快：四平、西阜新闻，最快的只用十四小时四十六分钟，最慢的十九小时四十七分。前三天全是重车单程运行，到第四天，空车开始回返，白天，没有敌机袭扰时，放行空车，减少会车，使运行时间大大缩短。在九天之内，共运送了六十四个军列，把近十万大军安全、迅速、及时地送上了辽西前线，胜利完成了我军大兵团调动的运输任务。九月二十八日，总局接到“东野”总部的电报，表扬铁路员工在困难的条件下，顺利地完成了军运任务。

战胜轰炸 抢运军火

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打响后，我军以突然行动攻占昌黎及其以西地区，同时包围了兴城、沙后所、绥中之敌，切断了锦州、唐山间的联系，断绝了华北敌人增援东北的陆上通路，形成了“关门打狗”的形势。

九月二十二日，敌人发觉了我军行动意图，派出大批飞机对我方铁路狂轰滥炸，频繁袭扰。

这时，我们运输大兵团的空车还没返回，而西线的作战物资、民工列车，东线的炮兵纵队、后勤部队列车共六十九列又从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方面接连发出，密集运行到郑家屯一带。同时，按运送上级机关列车办理的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及坦克团、工农学校等军列也相继到达，挤在一起，造成堵塞。由于敌机轰炸，白天空车不能运行，夜间重车又不能按时发出，途中运行时间随着加长。

二十九日敌机袭扰更甚，彰武、通辽、新立屯、苍土、西阜新等站先后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通讯、给水中断，情况非常紧迫。

总局针对上述情况，采取了紧急措施：一是迅速组织抢修，白天敌人轰炸，晚间保证通车，各个部门保证时间，不得贻误；二是组织特别运输机车大队，由昂昂溪、北安，把军列一直送到郑家屯前线；三是组织“片面运输”，当时人们叫“赶羊式”运输，即向着一个方向连续发车。执行这三条措施效果很好，很快疏通了堵塞，扭转了被动局面。

东北铁路工人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刻苦兴家、艰苦奋斗的战斗作风，他们是在战争紧张、物资缺乏、生活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完成军运任务的。东北解放的头两年，因为我们还不能给铁路工人发工资，每人每月只发给一百三十斤高粱米维持生活。有一次我去哈尔滨机务段，看见工人们穿得很破，寒天冻地腿上缠着麻袋片，干活很吃力。问他有什么困难？一位老工人说：“吃不饱，干活没劲”。他们就靠这一百多斤高粱米，拉家带口维持生活，坚持上班，坚持修车。我回来把这个情况向陈云同志汇报，陈云同志当即决定，将每人每月的高粱米增加到二百五十斤。这也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而铁路工人们体谅党和人民的困难，毫无怨言，他们说：“为了支援前线，不给钱也干。”

在紧张的军运中，他们勒紧裤带，冒着生命危险，抢修被炸坏的线路和设备。经常是敌机刚刚飞走，大火未消，硝烟未散，不顾敌人扔下的一些炸弹还没爆炸，铁路工人

和员工家属们就奔向现场，抬钢轨、扛枕木、挑砂子、填平弹坑、铺设线路。由北安、齐齐哈尔、昂昂溪、白城子、哈尔滨、吉林等后方机务段组织的特别运输队的乘务员们，告别父母、妻子的时候，没说到什么地方、去干什么，没想是否能回来，他们只说一句：“这次出乘日子长，不用惦记。”拎起饭盒就走。多少不平凡的事迹，就是这些平平凡凡的铁路工人和家属创造出来的：机车被打坏了，我们的司机头上顶着闸瓦，冒着敌机扫射，抢上去修；途中机车燃轴起火，乘务员冒着生命危险，蹲在机车底部拉条上，给轴箱填硬油；炉条坏了，他们把草袋子蘸上水，披在身上，钻进灰箱里去修；有的宿营车被打坏，乘务员就在煤水车顶上休息。东北晚秋的夜晚，寒风刺骨，可我们的铁路工人抱着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坚定信念，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锦州是北宁线上的枢纽，是东北通向关内的咽喉，遵照军委指示，为集中兵力攻克锦州，“东野”总部决定再从长春、沈阳方面抽调两个纵队，参加北宁线作战。

正当这时，运往锦州前线的军火列车连续被炸，连运军火的汽车也被炸起火，攻打锦州的部队又急需弹药补充。九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总部和总局当即决定，在昂昂溪组织一列秘密军火列车——三〇〇五次，抢在敌人沈阳援军出来之前运到西阜新车站。总局立即指示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和郑家屯分局，要趁敌机大批轰炸暂停的空隙时间，以出其不意的突然行动，确保抢运成功。

三〇〇五次列车乘务组的十六名同志冒着敌机轰炸的

危险，九月二十八日将军列开出。一路上同敌机斗智斗勇，在群众的支援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冲破了层层险阻，经过四昼夜的运行，终于在十月二日早四点四十六分到达西阜新前线。实现了他们临行前的誓言：“人在车就在，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把车开上去。”“东野”总部为了表扬他们的英雄事迹，赠给他们一面锦旗：“献给三〇〇五次英雄列车”，后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给他们记特等功一次，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了他们的代表，毛主席说：“向铁路工人致敬！”

疏通堵塞 保证畅通

进入十月，敌人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对我西线的苍土、新立屯、泡子、彰武、通辽、郑家屯等站进行狂轰滥炸，妄想切断我运输线。十月一日柳河大桥被炸坏，运输陷入瘫痪。在这紧要关头，铁路员工为线路畅通创造了惊人的奇迹。当天夜里，全线员工、家属和铁道纵队战士共同奋力抢修，经过一夜奋战，就架起了便桥，二日夜就通过两次军列，三日夜，又通过四次军列。

十月一日的大轰炸，使郑家屯地区的铁路遭到很严重的破坏，铁路工人承受了更大的压力。郑家屯历史上曾是我们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战略重镇。今天，它成了铁路员工支援解放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铁路枢纽。从一九四七年五月，郑家屯第二次回到人民手里，敌人就把它视为眼中钉，每天飞机声不绝，炸弹声不断。郑家屯分局政

委尹诗炎同志说，敌人扔在郑家屯地区的炸弹，立着摆，也能摆一层。十月一日这天，整个地区被炸得一片火海，车站、电务段、机务段都遭到敌机的轰炸，烟尘滚滚。敌机还没飞走，员工同志们就冲上去抢救起火的房舍，抢运仓库的器材，抢救受伤的同志。机务段长边光辉同志，看到库停机车有全部被炸坏的危险，就冒着敌机疯狂扫射，迎着大火冲上去，连续将七台机车开走，分散隐蔽起来。电务段长金子元同志原是齐齐哈尔电务段工人，随齐局支援前线大队来到郑家屯的，在一次轰炸中爬上电杆，抢修被炸断的通讯线路，不幸牺牲。解放后，郑家屯分局在车站树立一座纪念碑，纪念为辽沈战役胜利，为东北全境解放，在抢修、抢运战斗中光荣牺牲的金子元等十七位烈士。今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我们的青年同志，应当学习他们为人民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精神，为振兴中华贡献更大的力量。

十月三日后的铁路军事运输，较前个时期更为繁重。不仅要大量往前线运送各种作战物资，还要及时运送随着战争进展不断前移的各级指挥机关。后方的十九个独立团也要向四平、吉林地区集结。同时还必须准备几个列车，随时供给总预备队的一纵队机动运输。

从一日到十日，敌机白天、黑夜不停地轰炸。四日，章古台停留三辆弹药车被炸，站内三条线全被炸坏。五日，柳河大桥再次被炸，钢梁塌落。当时，列车运行十分困难：西阜新伤病员要送后方医院，空车连续回返；一部分重车待卸；六纵十七师因接受战斗任务，所乘列车急需前进。

但因大桥被炸，上下阻塞，南下重车都挤到彰武以北，停留在沿途。郑家屯、通辽间有七列，齐齐哈尔、郑家屯间十九列，哈尔滨、齐齐哈尔间五列。共有三十一个列车运不上去。而四平、郑家屯间阻塞的列车还有不少。

为了扭转这样局面，十月四日和七日，总局与“东野”后勤部召开紧急联席会议，确定整个运输由总局全面负责，统一指挥，重新排列了运输次序，决定以部队、弹药、汽油为先，其他次之，为确保安全，规定每个列车所挂弹药车不得超过五辆，汽油车不得超过两辆。并按李富春同志指示，以通辽为主，以甘其卡为辅，接受后方到达的物资与民工。同时“东野”总部首长决定，野政、野后机关的人员和所有后方支前的民工，均在郑家屯下车，徒步赶往前线；只允许作战部队、军火和被服列车通过郑家屯开往前线。这一系列的紧急措施贯彻下去，很快扭转了郑家屯枢纽地区的运输堵塞状况。

地处战争前沿的西阜新车站，也被敌机炸得只有站线，没有一间房舍。扳道房设在地窖子里，站舍是用雨布搭起来的低矮的帐篷，但是调度指挥，运输组织都从未间断，保证了军用列车一列跟着一列到达，卸下的草堆成了山，粮堆成了垛。

至十月八、九日，从后方各地运往吉林、四平地区的十九个独立团，相继到达。给一纵集结的列车，也已停留在所需地点。这个时期使用车辆之多是空前的。以七、八、九三日计算，留在彰武以南的重车达八百零三辆，供一纵和十九个独立团使用的车辆达一千零九辆，往前线运输的

一千零八十五辆。几个大站待装的空车二百一十三辆，共计六千一百余辆。

英勇斗争 迎接胜利

在东北，我军完成了“围锦打援”的部署以后，龟缩在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即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组成“西进兵团”出犯新民，企图解锦州之围。

廖耀湘兵团出沈阳后，敌一股骑兵窜到苍土车站，看到车站被破坏的状况，到处寻找工具。敌人抓来了苍土养路工区养路工人史云普，问他工具那去了？他说被撤退的人带走了。敌人说他藏起来了，逼他交出工具，他不交，敌人就打，老工人被打得浑身是伤，嘴流鲜血，还是说没有。敌人气急败坏，端起刺刀，对准史云普的胸膛进行威胁，但这位老工人，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宁死不交。敌人逃跑后，等我们的同志回来，史云普才把自己埋藏的工具挖出来，给大家抢修线路。苍土车站很快通了车。

为了在运动中歼灭廖耀湘的西进兵团，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必须暂时撤出彰武。郑家屯分局长廖诗权同志在彰武亲自组织撤退，疏散车辆。他首先组织人力将一千多名伤病员送上火车，转移到通辽；又将在甘其卡收容的四百多伤员及掉队人员的行李、物资，用四、五个列车运到通辽。撤退工作做的井然有序。直到十一日早晨，敌人的枪弹已打到彰武车站，廖诗权同志才乘一辆轨道摩托车离开彰武。

彰武电务段的员工，撤退前秘密地藏好器材备品，撤

退到甘其卡后，立即装置好交换台，接通了电话。当时铁路电话不单单是铁路使用，更重要的是供军事指挥用。电话交换台设在一所地主院落里，以迷惑敌人，掩护自己，安全保密。那时不仅要和公开的敌人斗争，还得同看不见的敌特、坏分子作斗争。交换台刚安装好，敌机就来轮番轰炸。但是我们的电话员，在敌机轰炸扫射下，仍坚持工作，始终保持电话畅通。在交换台前坚持工作的是李桂兰、车锡娥、李廷霞三个女孩子。她们中最大的二十一岁，最小的才十四岁。这三位姑娘日夜坚守岗位，连续十几天没摘下耳机。电话线不知被炸断多少次，电务工人们冒着危险一次又一次地接通了。电话交换台不知搬了几个地方，但是，通讯联络始终没有间断过。

十月十五日锦州解放了。从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开始，到十月二十日，这三十八天内铁路共开行军列六百三十一列，使用车辆一万九千五百六十一辆，运输各种作战物资五十八万六千八百三十吨。

接着，前方胜利喜讯不断传来。十月二十八日，辽西会战全歼廖耀湘兵团；十一月二日，沈阳、营口宣告解放。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线一万零九百四十公里的铁路至此全部回到人民手中。伴随人民解放军胜利前进，东北铁路员工们欢天喜地，庆祝东北全境解放。同时，他们又提出响亮的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把火车开到北平去！开到南京去！开到广州去！

辽沈战役的炮声刚停，曾与解放大军并肩作战的东北铁路员工们不待休息，不顾疲劳，来不及与家人告别又投

入了新的铁路运输工作。十一月月上旬，沈（阳）山（海关）线开通以后，他们开着火车、拉着器材，跟随东北野战军浩浩荡荡进关了。当时在铁路员工中流传着这样一支歌。让我记录在这里，作为这篇回忆录的结尾。

穿过山洞，穿过铁桥，
不分黑夜和白天。
越铺越长，越铺越远，
千山万水莫阻拦。

枪炮人马，粮食被服，
海水一样送到前线，
前方后方，连成一片，
绿灯时时保平安。

嗨嗨，嗨嗨！
路程在我们面前缩短，
我们绝不错过时间。
不管黑夜，不管早晚，
火车头吼叫着——
一直、一直、一直地冲向前！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和党的领导

罗占元 李秉刚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东北各阶层广大群众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违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意志，起而自卫。从十月份起，辽、吉、黑三省各种抗日武装相继组成。辽河两岸，松花江畔，以至整个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燃起抗日烽火，大批义勇军健儿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浴血厮杀。因为这些抗日武装乃民众自发组成，实行民族自卫对日作战，并不代表政府抗日，故把各种抗日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本文综合介绍两个问题。

一、东北抗日义勇军发展简况

东北抗日义勇军全盛时期人数大约三十万，遍布东北各地。义勇军成分极其复杂，几乎包括社会各个阶层。部队来源，有东北军的正规军队和公安警察大队；各县的民团、保甲；农村广大农民群众和部分城镇工人以及大小绿林帮伙等等。各部义勇军的领导人，有军官、警官、官吏、知识分子、开明地主、士绅、绿林首领和农民。以辽、吉、

黑^①三省而论，又各有特点。有以东北军爱国官兵为主组成，有的则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主组成。

辽宁省抗日义勇军

辽宁抗日义勇军是从一九三一年十月份开始相继兴起的。义勇军的主要成分是农村各阶层群众及部分军队、民团和绿林队伍。义勇军的分布大体有三个中心地区：以北宁路（今京沈铁路）、大通路（大虎山至通辽）、营沟路（营口至沟帮子）为中心的辽西、辽北地区；以安奉路（安东即今丹东至沈阳）、南满路（长春至大连）为中心的辽东三角地带和辽南地区；以通化、桓仁为中心的东边道地区。

1. 辽西、辽北地区

辽西抗日义勇军兴起最早。沈阳失陷后，原在沈阳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于十月二日移锦州恢复办公。十月八日，日本侵略者派飞机轰炸锦州，并派出兵力沿北宁路向西进犯。这时，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在锦州北三屯一带整编公安骑兵总队，并调动当地民团对日军开始反击，从而揭开了义勇军抗日的战幕。十月中旬和十一月初，日军先后策动土匪头子凌印清和亲日分子张学成组织伪军，在辽西一带骚动扰乱，并准备进攻锦州。黄显声再次调动公安总队，并联络绿林首领项忠义（青山）、张海天（老北风）、盖凌香（盖中华）等队伍，一举镇压了

① “九一八”事变前，辽、吉、黑三省管辖的县份与现今的省界划分有很大不同，本文在涉及义勇军活动时，为符合当年历史情况，仍按三十年代的治属划分。

凌印清、张学成和他们的日本顾问。嗣后，黄显声将讨逆有功的项忠义、张海天、盖凌香分别委任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二、三路司令。与此同时，辽西、辽北各地义勇军急剧发展。从一九三一年十月份开始，先后有东北军军官耿继周、高文斌、郑桂林及绿林首领高鹏振（老梯子）等组建的十余支抗日武装出现在北宁、大通路沿线。每支武装人数少者二三百，多者三五千以至近万。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下旬，日军调集四万余人向锦州进犯，辽西各路义勇军共三万余人参加了阻击日军或骚扰、袭击日军的战斗。但是，正当义勇军拼死御敌之际，驻北宁路沿线和锦州的东北军却于十二月下旬奉命向关内撤退。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锦州被日军占领，扼守京津的最后一道门户山海关便暴露在日军炮火之下。

锦州失守后，辽西、辽北义勇军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加活跃，在纵深千余里的广阔土地上，以山地、苇塘和广大农村为据点，乘日军立足未稳之机，到处攻城打站，袭击军火列车和敌人小股军队，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一月四日夜，第四路义勇军在耿继周指挥下，袭击了新民县城，歼灭日伪军数十名。一月九日，义勇军刘纯启等部在锦西县西园村一带歼灭日军第二师团骑兵第二十七联队长古贺传太郎以下四十余人。一九三二年二月，高文斌部义勇军配合蒙边中国驻军对进犯开鲁的伪蒙军迎头痛击，蒙奸甘珠尔扎布组织的伪蒙古自治军被彻底打垮，该伪军的日本顾问松井大佐被击毙。据《东三省义民血战记》等专著记载和实地调查，一月至三月辽西、辽北义勇军与日伪

作战一百余次，打死打伤敌人一千余名，其中日军军官少佐五人，大佐二名^①，击落飞机三架，缴获大批枪支弹药，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

一九三二年四月，辽宁各地由救国会委任的义勇军已达五十四路二十七支路，另有骑兵六路。在辽西、辽北活动的就有三十多路。除救国会委任的以外，还有国民党改组派、国民政府委员朱霁青组建的辽吉黑国民救国军，自任总监，可谓异军突起，独树一帜。

一九三二年五月，日军第八师团开进辽西，加紧对辽西义勇军的讨伐。各路义勇军之间各自为战，很难形成集中的军事力量。六月，东北民众救国会决定将辽宁各地义勇军划分为五个军区：辽西为第一军区，总指挥为彭小秋；辽南为第二军区，总指挥王化一（由李纯华代理）；辽东为第三军区，总指挥唐聚五；辽北为第四军区，总指挥熊飞（未到任）；辽北蒙边为第五军区，总指挥高文斌。一九三二年九月末，以朱庆澜（朱子樵）为首的“辽吉黑三省民众抗日后援会”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合作，又将原来的军区改为军团；并增设了第六军团，军团长为冯占海；第七军团，军团长为冯庸。

辽西义勇军第一军区成立后，其所辖各路、各支队继续与敌人苦斗。第四路耿继周部于八月二十日一度攻占辽西重镇锦西；第四十八路郑桂林部主动攻击绥中、兴城之敌，袭击车站，炸桥梁，使敌人防不胜防。辽北义勇军也

^① 日军官佐被歼数字系根据日“满洲护国社”编《满洲军肉弹史》等书统计的。

频频袭击大通路，攻打了通辽、法库等地。

一九三二年底，日军第八师团及第十飞行大队向西移动，加紧了对兴城、绥中一带义勇军的讨伐轰炸，为进攻山海关扫清障碍。在敌人强大攻势下，辽西各路义勇军虽经艰苦奋战，终因粮饷不济，武器缺乏，日渐不支。耿继周、郑桂林等部退往热河，北宁路沿线和辽北法库、通辽一带义勇军也遭到敌人大规模围剿，大部分队伍溃散失败。但也有一部分义勇军如兰天林等部，仍坚持抗日斗争，一直到一九三五年才最后终止。

2. 辽东三角地带和辽南地区

在辽东三角地带和辽南地区，活跃着邓铁梅、刘景文、李纯华、张海天等部义勇军。

辽东三角地带是指安奉路与南满路之间，东南至黄海岸的三角形地带，包括今丹东、东沟、庄河、凤城、岫岩等县。“九·一八”事变后，这里先后兴起了邓铁梅、李春光、鞠抗捷、刘景文等组建的义勇军共四万余人。三角地带几乎全为义勇军所控制，坚持时间又长，成为著名的三角抗日区域。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邓铁梅率部千余人夜袭安奉路上重镇凤凰城，一举攻进城内，包围车站，围攻日本独立守备队，捣毁县署，砸开监狱释放了被日军逮捕的爱国群众。凤城一役，首战告捷，打死打伤日伪军五十余人，缴获大批枪支弹药。这是三角地带抗日斗争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邓铁梅曾经担任过凤城县公安局长，事变前被排挤解职。他领导的义勇军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纪律很好，抗日

坚决。一九三二年十月，邓铁梅和该部总参议苗可秀挫败日伪政权“招抚”阴谋，在凤城县刁窝堡处决了伪凤城县日本参事官友田俊章等谈判代表六人，更加坚定了军民的抗日斗志。十月下旬，邓铁梅、刘景文等部义勇军围攻了伪安奉地区警备司令李寿山部驻地大孤山，前后二十余日，李寿山伪军孤军固守，弹尽粮绝，被打死打伤二百余人。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中旬，日军调集第二师团、第六师团和铁道独立守备队各一部及伪军共一万多人，四面包围三角地带，发动了第一次大讨伐。各路义勇军避敌主力，利用熟悉的山林村镇与敌人兜圈子，伺机反击敌人。十二月十六日，庄河大刀会五百余人包围在土城子宿营的伪靖安游击队和部分日军，经短兵相接，奋勇冲杀，砍死日本陆军大佐（死后晋为少将）以下日伪军数十人，给敌人以重创。十二月十七日，刘景文、邓铁梅部义勇军配合辽南第二军团李纯华接运军火的部队，在岫岩关门山、黄花甸一带与日伪军展开激烈战斗，一举击溃由辽阳前来配合讨伐的伪军七百余人，毙日军少佐长岗以下五十余人，生俘伪辽阳县日参事官成泽直亮。十二月末，邓铁梅率主力部队反攻文家街、红花岭之敌，收复被日军占领的尖山窑据点。经浴血奋战，三角地带各部义勇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大讨伐。

从一九三三年四月到一九三四年一月，日伪军对三角地带又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讨伐，每次都以密集的兵力、强大的炮火向义勇军进攻，到处杀戳群众，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妄图断绝义勇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在敌人频繁

进攻之下，义勇军损失很大，弹药奇缺，甚至有不少战士因冻饿而死，但各部义勇军仍坚持苦战。一九三三年七月，原在新宾一带抗日的李春润由海上从关内运来一批军火，与其弟李春光部汇合，在龙王庙等地连连重创日伪军。八月中旬李春润受重伤牺牲；李春光余部由阎生堂等率领一直坚持到一九三六年底。义勇军第五十六路又坚持了近一年时间后，司令刘景文入关，余部逐渐溃散。邓铁梅部于一九三四年春化整为零，分散游击。同年五月，邓铁梅在群众家秘密养病时被伪军侦知逮捕，押解到沈阳，于九月二十八日被杀害。

邓铁梅牺牲后，原邓部总参议苗可秀另创少年铁血军，继续坚持三角抗区的反日斗争。少年铁血军编为三个大队，十二个分队，基本队伍四百余人，多为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不仅战斗力强，而且十分注意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常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群众宣讲日军暴行和抗日救国道理，深受群众爱戴。为加强与其他抗日部队联系，苗可秀于一九三五年春曾派人到宽甸、桓仁一带找到杨靖宇同志领导的抗日部队，相约协同作战。后因日伪加强了控制，苗可秀部始终未能与杨靖宇部会合。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少年铁血军在岫岩北部沟汤村袭击了日伪军宿营地，打死日军中尉西泽以下七人，伪军数十人，缴获大批武器。此后，敌人加紧追剿苗可秀部义勇军。同年六月，苗可秀受伤被俘，日军千方百计诱惑苗可秀投降，苗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七月二十五日被杀害于凤城，时年仅二十九岁。苗可秀牺牲后，少年铁血

军在白君实等领导下继续坚持反日斗争，与敌作战不下数百次，威镇三角抗区。直到一九三九年一月白君实壮烈牺牲后，三角地带的抗日武装斗争才最后终止。

辽南义勇军活动区域主要是南满路中段营口、海城、辽阳三县以及靠近这三县的盘山、台安一带。这一地区靠近沈阳、营口等大中城市，又有南满铁路这一运输大动脉从中穿过，敌人兵力密集，防守甚严。从地理形势看，这一地区多为平原，只东部有些丘陵地带，无险可守，无林木山岗可掩护，义勇军的回旋余地甚小。

辽南地区的义勇军主要有以李纯华为首，张海天、项忠义、顾冠军等部为主力的第二军区，以李兆麟等人为主的第二十四路义勇军和以赵殿良为首的第二十一路义勇军。

一九三二年春，救国会派青年知识分子高鹏、纪亭榭等人到辽南海城一带指导义勇军工作，并担任救国会的联络员。六月辽南义勇军组建为第二军区后，下辖六个路军、四个独立大队，在辽阳、海城、营口、盘山、台安一带活动的小股抗日武装，也受第二军区指挥。

从一九三二年春天起，辽南义勇军在北从苏家屯、南至盖平（今盖县）间数百里的南满铁路沿线，广泛开展对敌斗争。四月，以李顿为首的国联调查团到东北进行所谓的调查，海城等地义勇军决定以武装斗争的实际行动，表现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他们沿铁路线袭击车站，拆毁铁道，割断电线，从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的四十多天里，南满铁路屡遭破坏。七八月间，青纱帐起，

辽南各地义勇军再次掀起反日斗争高潮。仅据伪《盛京时报》八月二十三日报道：在七月中下旬的二十天里，南满铁道被破坏事件竟达一千零六十三起，平均每天五十多起。八月初，李纯华部义勇军两次攻打了海城县城，顾冠军部攻打了营口市，辽阳纺纱厂工人尚吉元为迎接义勇军攻打辽阳，奋不顾身焚烧清纱等车间，均给日伪以沉重打击。十二月下旬，东北民众救国会拨给第二军团一批军火，李纯华从海路押运到三角地带，在邓铁梅、刘景文部协助下将部分军火运到辽南。第二军团利用运来的武器和爆破器材，多次炸毁敌人的铁道与军车。

一九三三年一月，日伪调动大批铁道独立守备队和于芷山等部伪军向辽南各部义勇军发动进攻，第二军团的处境十分困难。这时，救国会拨发的另一批军火由高鹏等人由陆路押运到热河珠碌科，第二军团领导人遂决定抽调各部主力撤出辽南赴热河取军火。第二军团冲破敌人围追堵截，且战且走，于二月到达珠碌科。不久，日军西侵热河，第二军团便在热河参加了抗战。以后，第二军团各主要部队始终未能返回辽南。

第二十四路义勇军是由冯基平、林郁青、李兆麟等人 在辽阳与沈阳交界的小堡附近组建的。“九一八”事变后，小堡一带的煤矿工人和部分民团组织了几支小股抗日武装，力量较弱，行动不统一。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在共青团北平市委工作的胡乔木同志派出团员林郁青、反帝大同盟成员李兆麟等到李的家乡辽阳小堡一带组织义勇军。不久，中共北平市委又派共产党员冯基平到小堡会同林郁青、

李兆麟收编各小股抗日武装，组建了第二十四路义勇军，公推辽阳烟台区区长苏景阳为司令。但苏景阳并未到职，该路军实际由李兆麟指挥。二十四路军下设六个支队，总兵力五千余人。第二十四路义勇军成立后，冯基平、林郁青、李兆麟等人一边领导部队开展反日斗争，消灭了附近反动日伪武装洪胜团、南大会等；一边领导小堡一带农民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建立了妇女会、儿童团、反帝大同盟和反日会等组织，推动了小堡一带反日斗争的发展。

在沈阳南郊，有赵殿良组织的第二十一路义勇军。赵殿良原是东北军退役军官，“九·一八”事变前即在沈阳与车向忱等人一起从事爱国活动。事变后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托，在沈阳组织救国会分会，并接受了第二十一路义勇军司令的委任，但他并没有基本队伍，只是在沈阳南郊和辽阳本溪一带收编了一些小股抗日武装，并在城内伪警察和伪靖安游击队中进行了一些分化瓦解工作。

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一、二十四两路义勇军约定共同袭击沈阳。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是日伪在南满的统治中心，日伪防守甚为严密。在进攻沈阳之前，赵殿良等作了详细的研究和准备，并派人与辽东唐聚五、邓铁梅等部取得联系，相约由他们协助破坏沈海（沈阳至海龙）铁路和安奉路以牵制敌人兵力。八月下旬，唐聚五部所属第六路自卫军连克南杂木、营盘等车站，逼近抚顺，围攻清原。驻沈阳日军铁道独立守备第二大队主力前往清原救援，沈阳日伪兵力空虚。恰逢这时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离任即将回国，日本政府派武藤信义来东北接替本庄职务，日军首脑机关正忙于交接事宜，对义勇军攻沈阳十分有利。八月二十八日夜，第二十一、二十四两路义勇军分别从大、小南边门、小河沿、小北门等处发起攻击。当晚天降小雨，漆黑一片，攻城战斗打响后，城内日伪军一片惊慌混乱。守卫车塔飞机场的伪靖安游击队四十多人反正抗日，掉转枪口攻击敌人，义勇军纵火焚毁了机场油库、机房，烧毁飞机二十七架。与此同时，义勇军还攻打了兵工厂、无线电台等处，打死打伤日伪军数十人。天将明时，日军出动坦克、装甲车向义勇军反击，义勇军撤出战斗。这次袭击沈阳，使日伪军遭受重大损失，在政治上也引起巨大震动，国内及日本各大报刊都登载了消息，极大地鼓舞了东北乃至全国人民反日爱国热情。

第二十一、二十四路义勇军袭击沈阳后，引起日伪军的注意。从十一月份起，敌人加紧了对沈南、辽阳一带义勇军的追击讨伐。在敌人重兵追击和政治分化下，各小股抗日武装或溃散，或投敌，到年底这两支义勇军就基本解体。李兆麟等同志由奉天特委另调本溪工作。

3. 东边道地区

在辽宁东部东边道地区的义勇军主要是以唐聚五为首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东边道”是清末所设“东边兵备道”的简称，辖辽宁东部北至安图、长白，南至安东等二十余县。这一带山高林密，便于义勇军的活动。

唐聚五原系辽宁陆军步兵第一团中校团附，“九·一八”

事变时，团长姜全我被俘投敌，唐聚五被张学良委为第一团团长，到桓仁另建团部，并秘密筹备组建民众队伍抗日。一九三二年三月，唐聚五准备就绪，遂召集抗日武装代表于桓仁聚会，决定成立辽宁民众抗日救国会和辽宁民众自卫军，众推唐聚五为自卫军总司令。四月二十一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桓仁县城举行了成立大会。大会向全国发出了抗日通电。不久，通化、新宾、临江、辑安等县自卫军相继打出了抗日旗号。民众自卫军编制为十八路，但基本队伍只有第一、五、六、七、八、十六、十八等路军，主要是原步兵第一团的两个营，桓仁、临江、辑安（今集安）、通化等县的公安警察大队和各县民众武装，共约五千余人。

辽宁民众自卫军誓师抗日后，沈阳日伪当局震惊，一面责令伪奉天警备司令于芷山调兵镇压，一面抽调日军二百六十余人携带轻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于四月二十七日向通化进犯。五月一日，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十六路司令孙秀岩率所部千余人，在通化北二密一带迎击敌人。经一昼夜激战，毙日军六十余人，击退了敌人的进犯。几乎与此同时，自卫军第六路李春润部在新宾顽强阻击了于芷山部伪军的进犯。新编的自卫军第十九路王凤阁部克复了柳河，进逼山城镇。六月六日，日军由朝鲜越过鸭绿江，侵入我长白、临江、辑安、宽甸四县，自卫军第八路徐达三部、第十八路林振清部和第五路张宗周等部，分别在各县顽强抗击了日军的入侵，打死打伤日军二百余人。六月二十日，第十九路自卫军在金川境内俘虏了前来讨伐的一营

伪军四百余人，尔后一举收复了金川、辉南县城。

经几个月激战，到一九三二年七、八月间，辽宁东边的桓仁、通化、新宾、抚松、金川、辉南各县全境及抚顺、清原、海龙、柳河、长白、临江、辑安、宽甸等县广大农村，皆为辽宁民众自卫军所控制。广大农民纷纷加入自卫军，自卫军总数猛增至将近十万人。据一九三三年版柳河县志记载：自卫军仅在柳河就“拥众数万，县城以外，全境皆为占有，可谓群匪如毛，无一寸干净土矣”。

一九三二年八月，辽宁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在通化召开了各路抗日将领会议，将部队统一编成七个方面军，并确定了向日伪盘踞的城镇据点发起大规模攻击的方针。从八月下旬起，自卫军各个方面军向沈海铁路和鸭绿江沿岸敌人据点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先后攻克了南杂木、营盘等车站，围攻了清原、海龙、辑安等县城，攻打了敌人重兵防守的山城镇伪军老巢和抚顺市，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是，民众自卫军在攻打城镇时，弹药消耗过巨，人员损伤极大。特别是大规模的攻城打镇，引起了日伪军的疯狂报复。从九月起，日军便调集了骑兵第一旅团、第四旅团混成第十旅团及第二师团、第八师团、第十师团各一部相配合，并有辽东全部伪军，总计三万余人，于十月十一日分三路向辽东地区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讨伐。在敌人大炮、坦克攻击和飞机轰炸的强大攻势下，自卫军各部相继溃散，总司令唐聚五率部分人马退往抚松，准备利用抚松一带天险坚持抗战。不料自卫军在抚松的支队司令王永成已叛变投敌，唐聚五失去退路，只好化装潜赴北平。其余部数千

人由第七路司令郭景珊带到热河。另有第十九路司令王凤阁带千余人马在通化与辑安、临江交界的深山密林中坚持作战，直到一九三七年作战被俘牺牲。唐聚五入关后，于一九三八年再组织队伍准备返回东北抗日，不幸于一九三九年五月牺牲于冀东迁西县长城附近。

吉林省抗日义勇军

吉林省义勇军主要是由驻吉林境内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和大批民众抗日武装所组成的。从系统上说：一是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一是以王德林为总指挥的吉林救国军。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日军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市。原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投降日军，并按日军指示组织临时吉林省政府，极力拉笼吉林省各地驻军投降日本。当时，吉林境内共有国防军与省防军八个旅，一个卫队团，共约六万五千人左右。在熙洽拉笼下，有四个旅投敌附逆，而卫队团长冯占海、依兰镇守使兼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则先后宣布抗日。十月，张学良指示在宾县重新组织吉林省政府，以与熙洽的伪政府抗衡，宣布抗日的各旅官兵均归在宾县的临时省政府统辖。

一九三一年十月底，伪吉林省政府任命汉奸于琛澂为吉林省剿匪军司令，并以投降日军的附逆部队为骨干重新编成了伪军五个旅、一个铁道守备队。伪军成立后，即向抗日部队发动进攻。日伪军以优势兵力首先在榆树击垮了

第二十五旅张作舟部，后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向哈尔滨进犯。在哈尔滨的滨江镇守使、中东路护路司令兼旅长丁超联合了李杜、冯占海等抗日军，齐聚哈尔滨一带共同防守。一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抗日军击败了于琛澂伪军的第一次进犯。一月三十一日，李杜、丁超、冯占海、邢占清、王之祐、赵毅等抗日将领在哈尔滨召开联席军事会议，决定由各抗日部队联合组成吉林自卫军，公推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自卫军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为左路总指挥，王之祐为前敌总司令。自卫军成立后加强了对哈尔滨的军事防守。这时，哈尔滨南面的双城堡已陷日军之手。二月二日，日军第二师团司令部、第十五旅团及铁道独立守备队等大批兵力已逼近哈尔滨南郊。二月四日，日军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向哈尔滨发动了猛烈的攻势。吉林自卫军将领李杜等亲临前线督战迎敌，但哈尔滨南郊无险可守，自卫军官兵虽拼命抵抗，却无法阻止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不能扭转失利战局。二月五日，自卫军全线撤退，哈尔滨遂告陷落。

哈尔滨失守后，自卫军各部相继撤至巴彦、方正、延寿一带，后方基地和总司令部则设在依兰。这一期间，自卫军各部大批吸收了中东路沿线和松花江沿岸的民众抗日武装，使自卫军这支原来纯由吉林正规军队组成的队伍在人员构成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九三二年三月，日军又调集大批兵力向自卫军发起进攻，自卫军各部在方正、延寿一带与敌交战，战斗非常激烈。三月末在方正县的会发恒、

桶子沟一仗，冯占海部重创日伪军，敌军死伤逾千，并有千余伪军反正，缴获轻重机枪数十挺，以及迫击炮、大枪等武器。但从整体上看，自卫军无法抵御住日伪军的攻击，不得不退往依兰一带。

四月初，自卫军总司令李杜在依兰召开了各部将领会议，决定兵分三路反攻哈尔滨。这一期间，日军主力已调往黑龙江一带对付马占山所率抗日军，而且沿江一带红枪会、大刀会等民众抗日武装大量兴起，整个形势对自卫军是有利的。会议结束后，各路开始行动。经一个多月的奋战，右路军冯占海部连克方正、宾县，先头部队逼近哈尔滨；中路、左路也取得很大进展，打到珠河附近。这时，日军调来第十师团等主力部队加强了哈尔滨的防务，并组成中村支队避开自卫军主力，趁松花江开江之机，顺流而下，于五月十七日突然攻占了自卫军后方基地依兰城。李杜等总部人员仓促退出依兰，向勃力、梨树镇转移；丁超则心怀异志独向宝清一带活动。依兰既失，自卫军后方所存武器弹药、军需粮饷等均落敌手，反攻哈尔滨的计划遂告失败。此后，冯占海部便脱离自卫军，转向五常、舒兰一带活动。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下旬，日军又以三个师团的兵力开赴下江地区，向自卫军进犯。在强敌进攻面前，丁超投降日伪，李杜率部北移，在途中又遭日军袭击，死伤严重。十二月下旬，李杜、邢占清等率二千余人退入苏联境内，自卫军的反日斗争遂告失败。冯占海部于十月间越过南满路，取道通辽到达热河的开鲁，后被国民党北平军分区所改编。

吉林救国军是东北军下级军官王德林创建的。王德林原系绿林出身，后被东北军收编，“九·一八”事变前任二十七旅六七六团三营营长，驻防安图县明月沟。事变后第二十七旅旅长吉兴投敌，王德林与三营全体官兵莫不义愤填膺。为了摆脱吉兴的控制，王德林一面佯作服从，一面积极筹备起义抗日。经过一段准备，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王德林率部在延吉县小城子联合各界抗日力量，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正式宣告成立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简称吉林救国军。经大家推选，王德林为总指挥，孔宪荣为副总指挥，吴义成为前方司令。不久，又委任李延禄为参谋长。誓师大会发出抗日通电指出：所有反抗日伪的群众，都是我们的同志，我们要联合他们，扶助他们的发展，只要大家都抱定牺牲的决心团结反日，胜利终归是我们的。王德林还提出了工农商学兵各界同胞联合起来，不分党派，共同一致对外抗日的口号。

吉林救国军成立后，于二月十五日攻打了敦化县城，首战告捷，击毙日军大尉长谷以下五十余人。以后，救国军又向宁安、穆稜一带转移，指挥部移到五河林，大部队集中于镜泊湖附近。这时，各地抗日武装纷纷投向救国军，队伍已近二万人，编成骑兵两团，步兵七个旅。三月中旬，日军上田支队和伪军二千余人从敦化出发，开赴镜泊湖一带讨伐救国军。救国军补充团李延禄等部于额穆墙缝一带利用有利地势伏击敌人。三月十八日，大批日伪军进入伏击圈，救国军突然发动袭击，走在前面的一营伪军带械投降，日军竭力抵抗。经数小时激战，毙日军小川松本大尉

以下百余人。

六月以后，救国军利用青纱帐起、山林繁茂之际，更加活跃，攻打了蛟河、额穆，破坏敌人准备修建的吉会铁路。八月间，周保中同志到救国军总部任总参议，不久又到前方总指挥部任参谋长，从而加强了救国军的军事领导和指挥。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以后，日军加强了对吉东地区的讨伐，向救国军各部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在敌人攻击下，救国军弹药粮秣均发生困难，许多士兵无御寒棉衣，冻饿交加，战斗力大大削弱。十二月中旬，日军大举进犯东宁，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率补充一、二团在磨刀石顽强拒守，打退敌人多次猖狂进攻。一九三三年一月初，日军以大炮装甲车向李延禄部猛攻，救国军不支，放弃磨刀石，中东铁路完全被日军占领。一月五、六日，日伪军又增加兵力，向东宁一带猛攻，救国军总指挥部危在旦夕。在此情况下，王德林、孔宪荣撤入苏联界内，救国军总司令一职由吴义成兼代。十四日，东宁失守，留在吉东的救国军余部继续抗战。后来，在东宁一带的救国军经李延禄同志收容改编，成立我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以后逐步发展为抗联第四军；周保中同志协助吴义成指挥另一部分救国军转战安图、宁安等地。一九三三年底吴义成进入苏联境后，周保中组织救国军残部，联合其他抗日义勇军部队继续抗战，后来该部发展成为抗联第五军。

黑龙江省抗日义勇军

黑龙江省地处边陲，“九·一八”事变时全省有正规军队

三万余人，分驻黑河、拜泉、扎兰屯、海拉尔、满洲里等地。事变发生，日本侵略者以武力迅速占领辽宁、吉林大部领土之后，在军事战略上制定了一条沿四洮路（四平至洮南）北上，图谋侵占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进而控制东北三省的行动计划。但当时，日军兵力尚不足，为此，日本侵略当局首先策动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宣布“独立”，自命“东北边防保安司令”，并做进攻黑龙江的准备。当时，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不在东北，十月十日，张学良任命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主席，主持黑龙江省军、政事务。十月十六日，马占山尚未赴齐齐哈尔就职，汉奸张海鹏便兴兵北上，向嫩江桥一带黑龙江守军进攻，当即被黑龙江省驻军击败。十月十九日，马占山到达齐齐哈尔，宣誓就职，并调集兵力，准备迎击日伪军进犯。

伪军张海鹏部进犯江桥未成，日军便于十月下旬向洮南一带调兵遣将，于十一月四日向嫩江桥黑龙江省驻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马占山下令还击，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爆发。江桥之战前后历时十六天，分两个阶段。十一月四日到六日，黑龙江省驻军与日军血战三天，双方均遭重大伤亡。由于日军炮火猛烈，江桥北侧黑龙江驻军防御阵地基本被敌人摧毁，马占山不得不下令所部撤离江桥，于三间房一带防守。三间房是洮昂（洮南至昂昂溪）路上的一个车站，北距齐齐哈尔七十华里，是保卫省会的重要防线。为加强该地防守，马占山调六个团担任正面防线阻击，两个骑兵旅分别在左、右两侧布防。兵力布置好后，马占山

等亲自到三间房一带视察了阵地。

十一月七日至十二日之间，日军也因伤亡惨重继续增调了兵力，十二日又开始了大规模进攻。这次，日军以第二师团多门中将亲自指挥，以坦克、装甲车开路，步兵及特编轻重机枪队尾随其后，向黑龙江守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战斗异常激烈。黑龙江守军由于连日苦战，能投入作战的兵力仅剩四千余人，弹药严重短缺。到十八日，黑龙江守军无法继续坚持，马占山下令各部撤退。十九日，日军侵入齐齐哈尔，马占山率省政府公务人员和残余部队向北撤往克山、拜泉一带，历时十六天的江桥抗战至此结束。

马占山统率黑龙江省中国驻军所进行的嫩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爱国官兵对日本侵略军第一次大规模的抵抗，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江桥抗战失利后，马占山将黑龙江省政府迁往海伦办公，同时吸收民团，补充队伍，准备再战。但在一九三二年初，马占山听信日伪关于可实现联省自治的诺言，一度动摇失节，于二月十六日飞赴沈阳参加了名为讨论联省自治，实为研究筹建伪满洲国的会议；三月九日，又参加了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的典礼，并被任命为伪军政部长。但马占山很快就改变了立场，四月二日从齐齐哈尔秘密出走，七日抵达黑河，再组黑龙江省政府，宣布继续抗日。

马占山重新宣布抗日后，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各抗日义勇军的热烈支持。马占山将各民众抗日武装统编成十一支义勇军，原有的抗日部队编成九个旅，共同组成黑龙江

省抗日救国军，马占山任总司令。这样不仅壮大了抗日力量，而且使黑龙江省的反日武装斗争具有广泛的民众基础。

从一九三二年四月到六月，马占山率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在呼海路（呼兰至海伦）、齐克路（齐齐哈尔至克山）沿线与日伪军展开游击战。他要求各部队不死守一地，或进行袭击，加以扰乱；或施以破坏，断其联络；或截其辎重，以充军需，掌握作战主动权，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在这一原则下，各部义勇军频频出击，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六月末，马占山率一部沿呼海路东征下江，拟与自卫军李杜部取得联系。此举被日军识破，调集重兵对马占山部围追堵截。七月二十九日，在小兴安岭西侧罗圈沟马占山部被敌人包围，经过激战，马占山仅率几十骑兵突出重围，进入深山密林之中，经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于九月到达龙门县境。这时，正值苏炳文筹备抗日，马占山遂整顿所部，与苏炳文建立了联系。

苏炳文在“九·一八”事变前任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警备司令兼海满护路军司令、第二旅旅长。马占山江桥抗战时，苏炳文曾派一团兵力助战；江桥战后也一直与日伪政权保持距离，但未公开宣布抗日。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苏炳文在海拉尔召集会议，决定举旗抗日，组建东北民众救国军，自任司令，张殿九为副司令，谢珂为参谋长。十月十一日，苏炳文在海拉尔召开了抗日誓师大会。

苏炳文部宣布抗日，对日伪盘踞的齐齐哈尔构成了巨大威胁。侵略黑龙江的日军当局立即调集大批兵力在富拉

尔基一带与苏部激战。这一期间，马占山也指挥所部逼近齐齐哈尔，十月二十日，围攻了省城以北的拉哈车站，经八昼夜激战，歼日伪军六百余人，后因日伪军增援，围攻停止。十月底，李海青部义勇军经两昼夜激战，攻占了昂昂溪车站，歼灭了大批日伪军。

十一月中旬，正当黑龙江省各路义勇军不断出击并准备联合攻占齐齐哈尔之时，日军从南满、吉东调集三万余人向黑龙江义勇军发动猛烈进攻，各部义勇军在强大敌军攻击下渐呈败势。李海青部在昂昂溪附近伤亡五百余人；苏炳文部在富拉尔基阻敌三昼夜，亦因伤亡严重，不得不退守朱家坎一带防地。十一月底，日军又以飞机轰炸海拉尔苏炳文的兵营，然后以服部旅团、骑兵第十四旅团、平贺旅团等向扎兰屯、朱家坎等地发起攻击，战斗异常残酷。十二月二日，扎兰屯失守，苏炳文部反击无效，遂于十二月四日经满洲里乘车退入苏联境内。

马占山所部在围攻齐齐哈尔的计划落空之后，也相继退往拜泉等地。十一月二十九日，日军向拜泉发动总攻，三十日晚拜泉陷于敌手。此时马占山在满洲里得到消息，悲痛欲绝。十二月三日，苏炳文入苏境前，途经满洲里时，说服马占山一同进入苏境，以图寻机再举。

马占山、苏炳文等进入苏联境内后，其残余部队有的就地坚持斗争，而大部转移到热河。至此，在黑龙江以马占山、苏炳文等为首的义勇军反日斗争便告一段落。

东北抗日义勇军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兴起，经过一九三二年的全盛时期，到是年年底或一九三三年初，大部分失

败瓦解时为止，成为东北反日战场上的主要武装力量。东北义勇军在武装反日斗争中，大量地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延缓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占领和扩大侵华的军事进程；发扬了中华民族爱国反帝的光荣传统，发扬了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义勇军大部分失败瓦解以后，仍有相当一部分抗日队伍散在各地。这些抗日武装，有的与党领导的游击队，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军联合作战，成为统战部队，坚持了长期反日斗争。

二、党对东北义勇军的领导

关于党对东北义勇军的领导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陈云同志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在《救国时报》上发表《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防止奸细的破坏》的文章中说：“共产党领导着中国工农红军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和追击，跋涉万里，北上抗日，还领导着东北义勇军，在冰天雪地里打击日寇。”毛泽东同志和陈云同志都一致地指出了党在“九·一八”事变后领导了东北义勇军的反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委、中共中央都为

满洲事变发表了宣言、决议，分析了事变发生的原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谴责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工农大众、青年知识分子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军侵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东北。中共满洲省委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各种渠道，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向广大群众宣传和渗透。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坚决收复失地的主张，得到了全国特别是东北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支持。在党的这些宣言、决议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如何组织民众进行抗日的具体方针和方法，但对东北广大人民群众、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的反日情绪及发动武装抗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支持，也提出了一些口号。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指出：“东三省的占据，象电火一样燃烧了千百万工农群众及小资产阶级的反帝热情，使他们为了中国民族的自由与独立而斗争”，“满洲省委要立刻分配干部到南满各地、中东路、吉长路沿线的农民群众中与动摇不满的东北军阀军队中去发动反日斗争，游击战争与兵变。”

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决议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之后指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

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

九月二十三日，中共满洲省委在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中，提出了在有党组织的军队中和日军尚未占领的北满地区，党应加紧领导与号召士兵群众，不让日军缴械，反抗长官关于不抵抗的一切命令。并指出，如果有占领当地和反抗日军进攻的力量，要反抗日军的进攻；帮助发动农民斗争，解除地主警官武装交给农民，扩大与改编原来的队伍。等等。

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东北各地人民群众及部分爱国官兵纷纷组织各种抗日义勇军，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义勇军”这一民众自发的武装形式刚一出现，在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同志就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支持。他在中央《红旗》周报第二十期（一九三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版）上，以“伍豪”笔名发表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一文，明确提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十一月初，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开始后，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又动员了许多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赴战地慰问抗日将士；并动员一批青年学生直接参加了抗战。

党的抗日主张与行动，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许多抗日义勇军纷纷寻找共产党，要求党的领导。在辽宁，

“台安、辽阳一带的散兵大打反日救国军的旗号，明目张胆的要找共产党去领导他们。”^①一九三二年初，活跃在吉林扶余一带的义勇军李海青部，也派人到哈尔滨找共产党组织。此外，还有许多红枪会、大刀会等农民武装也到处找党，要求党的领导。

但是，正值此时，中共满洲省委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在沈阳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军委书记廖如愿等先后被捕，党的工作无法适应蓬勃发展的义勇军抗日斗争的需要。不久，以中央代表身分在东北巡视工作的罗登贤同志担任满洲省委书记，并将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到当时日军尚未占领的哈尔滨。罗登贤同志组织新省委领导反复学习了周恩来同志的文章，进一步明确了党在反日民族斗争中的责任，加强了对义勇军的领导与支持。

此后，满洲省委及其下层各级组织对义勇军的反日斗争都作过一些具体的分析和规定，提出过具体行动口号。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省委在关于《满洲工作近况》的报告中指出：辽西一带的群众在反日愤怒中自动武装起来，实行抗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有的日本小部队完全被义勇军消灭。报告还指出义勇军有两个前途：一个是在土匪头子、军官豪绅地主的领导下走向挫折失败；一个是党能够打入义勇军中去，树立党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二年四月，省委成湘同志关于满洲政治经济状况向中央的报告中，肯定了一九三二年一月底李杜、邢

^① 《传达中央关于满洲事件决议的报告》，1931年10月。

占清、冯占海等部在第一次保卫哈尔滨战斗中的积极作用，对辽西义勇军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辽西是满洲义勇军反日战争发动最早，斗争也是非常剧烈的地方，义勇军英勇斗争的结果曾经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很大打击，夺回了很多日军所占据的地方”。同时还批评了各地党组织对于义勇军反日斗争的形势估计不足，不积极进行工作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空喊反日游击战争，而不是具体布置的左倾空谈。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满洲省委在《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中指出：“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的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战争，尤其是中东线、松花江、辽西、安东、吉林的地方，更须以义勇军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奉天、哈尔滨、东满饶河等）发展游击战争，袭击敌人粮食与运输，解除敌人的武装（如小部队、便衣队、侦探走狗等），用各种方法夺取武装，武装自己”。决议还严厉批评了一些地方党放弃对义勇军领导的错误。

一九三二年四月五日，满洲省委提出了目前满洲民众义勇军及一切劳苦群众反日战争的十条纲领。纲领主要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义勇军的进攻与屠杀群众的口号；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号召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工农义勇军，创造红军，武装保卫中国，保卫满洲劳苦群众；号召革命士兵与武装民众联合，与义勇军联合，反对长官妥协、投降。

一九三二年九月，《满洲省委为加紧义勇军的工作致

各级党部的一封信》里，对义勇军反日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信中指出：几十万的义勇军与千百万的工农劳苦群众，他们是英勇的战斗着，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不屈不挠的血与肉的拼死的革命战争。北满、南满、中东路的的东西线、哈长线、南满线、奉山线、吉海、吉敦、吉长各铁路沿线，松花江、牡丹江的沿岸，集中了无数的义勇军，他们英勇的战斗的行动，震撼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统治，冲击着满洲地主资产阶级走狗的统治。

通过上述这些文件，我们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和满洲省委关于收复失地，坚决抗日的正确主张，得到了东北各阶层群众及各抗日义勇军的拥护和支持。在驱逐日寇、坚决抗日的总前提下，动员和号召了东北各阶层群众。中央和满洲省委对于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的抗日斗争也是支持和肯定的，并且提出了一些行动口号，强调了加强党对义勇军领导的重要性。

在中央和满洲省委发出一系列指示，加强对义勇军领导的同时，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到一九三二年末，满洲省委先后派出一百多名党团员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此外，还从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进步团体中选派了大批骨干到义勇军部队工作。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也选派一些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到东北抗日义勇军部队开展活动，有的是党组织直接委派的，有的通过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救国会联络员的身份到义勇军部队进行活动。

党派人到各义勇军中协助工作或参加领导，大体有以

下几种情况。

一是派出党员、团员直接组织建立抗日义勇军。活跃在沈阳、辽阳之间的东北义勇军第二十四路，就是由中共河北省委所派党员冯基平同志与团员林郁青、反帝大同盟成员李兆麟、杨受天等人，联合各小股抗日武装组建起来的。后来又派出夏尚志、侯新等党员到二十四路义勇军协助工作。

二是派出党员、干部支持、协助一些义勇军的组建与开展反日武装斗争。王德林于一九三二年初准备建立抗日救国军时，中共东满特委得到消息，马上派出胡泽民、李延禄等十几名党员参加该部的宣传鼓动工作，予以支持；救国军成立后，李延禄、周保中同志先后担任了重要领导工作。在辽宁柳河、海龙一带的辽宁民众自卫军第九路，有共产党员王仁斋（后任抗联一军三师师长）、刘山春在该部工作。他们对该路司令包景华进行说服工作，包景华赞成我党抗日救国的正确主张，并要求我党派人到他的队伍中工作。中共海龙县委派去了二十多名党团员和五、六十名互济会、农会、反日会群众骨干到九路自卫军中工作，该路自卫军的参谋处长、政治大队长、卫队连长等都由党员担任。一九三三年组建的党直接领导的海龙游击队，就是在第九路自卫军余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在宁安的农民抗日义勇军武装“平南洋总队”中，也有宁安县委所派的于洪仁等同志协助工作，并担任副总队长的职务。后来该部被改造成为党直接领导的队伍，改称“东北工农反日义务总队”，总队长李荆朴同志也于一九三三年五月被吸

收入党。

三是派出的党团员与基本群众在各义勇军中发挥了骨干的作用。在吉林自卫军和马占山、苏炳文、邓铁梅等较大的义勇军队伍中，我们党或建立了支部，或派去了党团员与基本群众，他们在各部队中发挥了骨干的作用。“在自卫军方面，党已在几个部队中建立了自己的组织，有四个兵士支部，同时有些上层关系”。^①在苏炳文的部队中以及活跃在吉林蛟河一带的田霖部义勇军中，也有党的组织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邓铁梅部义勇军中，邹大鹏同志担任政训处处长，帮助该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在哈尔滨东部的孙朝阳义勇军中，有李启东、赵尚志等同志在其中工作。赵尚志有勇有谋，被孙朝阳任命为参谋长。经赵尚志等人的努力，孙朝阳部一时成为哈东一带抗日劲旅。党团员在抗日义勇军中的作用是十分突出的。一九三二年初，李杜、邢占清等组织保卫哈尔滨的战斗，一时作战失利，一位共产党员按党的指示，在香坊团结了七十多名散兵重返郊外战场，消灭了大批敌人，最后全部为国捐躯。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反日斗争的前列，领导和协助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反日斗争，促进了一九三一年末到一九三二年末义勇军反日斗争的高潮，党派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的党团员也发挥了自己的模范作用，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党对东北义勇军反日斗争的领导，既不平衡，又有失误。这是由于当时东北党组织的领导力

^① 《孙××巡视东满报告》，1932年12月9日。

量比较薄弱，经验不足，特别是党内存在着“左”倾错误政策所造成的。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以王明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者在提出坚持党对反帝斗争领导的同时，未能正确地分析与估计“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出现的新形势，不顾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引起的阶级关系新变化和各阶层广大群众普遍要求武装抗日这一特点，一再强调“武装保卫苏联”、“建立东北苏维埃与红军”，“实行土地革命”等任务。这些脱离东北实际情形的口号，不能为各阶层群众所接受，严重地妨碍了反日斗争的发展。在对义勇军的策略上，一方面支持和领导了义勇军，肯定了义勇军反日斗争的功绩和作用；而另一方面却又对义勇军上层领导人，特别是对原东北军爱国将领的抗日行动加以排斥和指责，说他们是服从国民党指挥，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则提出反对上层勾结，甚至提出在义勇军中工作的党团员要组织哗变，拉出队伍创建红军。这些错误提法与做法影响了党与义勇军的关系。

“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使我党丧失了有利时机，未能在敌人统治不稳、义勇军反日斗争的高潮时期，把更多的义勇军部队团结在党的反日旗帜之下，汇成巨大的武装反日斗争潮流，取得更大的胜利。后来我党总结了这一教训，提出了实行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以我党直接创建与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为核心，团结了各地零散的抗日义勇军武装，推动了反日斗争的蓬勃发展。我党对“九一八”事变

后义勇军斗争初期的领导与协助，正为后来创建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和联合各反日义勇军武装组成抗日联军，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

李鸿文 王 景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发动了侵略我国东北的战争。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之下，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了东北的重要城镇与各个要地。并且迫不及待地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启用汉奸，建立起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从此，我国东北便成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

但是，酷爱自由，富有革命传统的几千万东北人民，虽然处于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之下，决不甘心屈辱，决不能忍受侵略者的统治。他们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日起，便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地向侵略者进行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反侵略战争。东北的抗日战争，实际上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并且是它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所组织起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前身——抗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在这场正义的抗日战争中，逐步成为东北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主力与核心。东北抗日联军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它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是一部悲壮的史诗。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游击队的抗敌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最前列。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自事变的第二天起，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曾连续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的侵略罪行和南京政府不抵抗的可耻行径，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东北同胞誓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将侵略者逐出中国的决心。在这一民族危急的关头，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斗争精神和勇气，在全国和东北各地迅速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潮。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东北后，东北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不顾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命令，相继组成各种名目的抗日义勇军，抗击侵略者。马占山指挥的嫩江桥抗战，李杜指挥的哈尔滨保卫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战役。中共东北党组织派遣党员和动员爱国青年参加了一些义勇军部队的抗敌斗争。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曾发展至三十余万之众。它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人民群众不顾统治阶级的阻挠，直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正义行动的又一重要体现。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狂妄气焰。

后来，这些部队由于孤立无援，部队缺乏统一和正确的领导，缺乏坚持长期斗争的决心与信心，结果至一九三

三年初相继失败。其中一部分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改编为抗日游击队坚持战斗。东北的抗日形势随之暂时转入低潮。

同一时期，中共满洲省委和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有关建立反日游击队、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先后建立起十余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开拓了若干抗日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

中共中央与满洲省委为在东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曾向各地党组织发出许多指示。在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省委《关于士兵工作紧急决议》和十月十二日中央《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发动和领导当地军队和抗日义勇军坚持抗日斗争；积极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还要求注意引导这些抗日武装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为此，党的组织除派出若干党员干部到一些抗日义勇军中工作外，同时还派遣一些干部和党员到农村去，从事建立抗日游击队的工作。

吉林省南部磐石地区，在党的磐石中心县委领导下较早地建立了抗日群众组织，并于一九三二年连续开展了“二·九”、“四·三”、“五·七”等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日斗争。在斗争中，以县委武装——赤卫队（打狗队）为基础，形成了由李红光任队长的三十余人的武装队伍。同年六月四日，在满洲省委巡视员、省委兵委书记杨林的指导下，正式建立了“满洲工农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简称磐石工农义勇军）。队长张振国（张汝衡）、政治指导员杨君武（杨

佐青)。

但是，由于磐石工农义勇军执行中共中央“北方会议”错误决议，普遍发生没收地主土地，收缴地主与山林队枪支等过“左”行动，弄得工农义勇军屡遭挫折。为了保存这支诞生不久的队伍和便于今后的活动，经与时常同工农义勇军一道开展抗敌斗争的抗日山林队“常占”部协议，在保持工农义勇军独立自主的条件下，磐石工农义勇军加入“常占”部队。九月十日，这支队伍协同黑石镇起义的一支抗日部队攻下磐石县城。不久，磐石工农义勇军脱离“常占”部队，并被迫退出原有的玻璃河套游击区域，转移至桦甸活动。满洲省委于同年十一月派省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前往南满巡视，在他的指导下，磐石工农义勇军总结了经验教训，进行了整顿，部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简称磐石游击队)。一九三三年春，省委任命杨靖宇为该游击队政治委员。在此期间，磐石游击队于春节后在铁路工人协助下，拆除吉海铁路老爷岭路段铁轨，袭击日军铁甲列车，击毙日军七名，重伤其二名。此后，从二月至五月，连续奋战三十余次，打退敌军四次大的围攻。在战斗中，部队发展了三倍达到二百三十余人，声誉迅速提高。

磐石游击队十分注意改善同周围抗日义勇军的关系。一次，平时对游击队持敌视态度的赵旅与马团在玻璃河套板凳沟被日军包围，处境危急。杨靖宇得知消息后，立即率队前往救援，从敌军背后发动攻击，赵、马二部趁机突围。这一行动，使他们深受教育。以此为转机，游击队进

一步团结了其他抗日武装。经游击队倡议，五月下旬成立了“抗日联合军事委员会”，共同对敌作战。在这种有利形势的推动下，打入伪警备旅十四团迫击炮连的共产党员曹国安、宋铁岩等，在端午节组织起义成功，并带领五十余名士兵和枪炮离开驻地烟筒山，加入南满游击队，编为迫击炮大队。此时，抗日游击区已扩大到磐石、伊通、桦甸等五个县区，南满游击队成为抗日武装的中坚力量。

一九三二年夏秋间，海龙、柳河一带辽东民众自卫军十分活跃。同年八月，中共海龙中心县委以十多名党员为骨干建立了海柳工农义勇军。后因人数不多活动困难，加入民众自卫军第九路共同抗日。同年底，当自卫军瓦解时，前海柳工农义勇军成员又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队长王仁斋，政委刘山春，队员二十余人，继续在海龙、清原、柳河一带打游击。

东满各县是朝鲜族聚居区，也是抗日武装斗争开展较早的地方。中共东满特委在领导一九三一年秋收斗争和一九三二年春荒斗争的基础上，已经建立了农民协会和赤卫队等组织。新任特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后，抓紧各县县委发动群众夺取敌人枪支，组建党领导的游击队的工作。至一九三二年夏，各县先后共建立了近十支小游击队，同年冬，这些小游击队又分别合组延吉、汪清、珲春、和龙等四个反日游击大队，共四百余人。延吉游击大队队长朴东根、政委朴吉；汪清游击大队队长梁成龙；珲春游击总队队长孔宪琛；和龙游击大队队长张承汉、政委车龙德。东满各反日游击队一向以英勇善战著称。一九三三年九月，

汪清和琿春两支游击队各一部同吉林救国军余部联合围攻东宁县城。战斗中，许多救国军部队畏缩不前，这两支游击队却英勇顽强，跃过敌军用严密火力封锁的铁蒺藜网和注满了水的护城河，首先攻入城内。游击队的突出战绩博得所有参战部队的赞佩，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威望。

一九三二年五月，北平清华大学学生张甲洲等回归家乡巴彦县，成立了巴彦游击队，张任总指挥，人员约二百。不久，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和夏尚志等到该部工作，帮助整顿部队，严明纪律。赵尚志被任命为参谋长。部队取得许多胜利。但当队内一些共产党员按照中共中央的“左”倾错误要求，率领部队在农村实行“分粮吃大户”时，一些原为地主出身的人员便陆续携带武装离去。同年冬，省委又命令将部队改为“红军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部队处境更加孤立，不久即行散失。赵尚志返回省委反而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错误的处理。

一九三三年春，赵尚志又到宾县参加了义勇军孙朝阳部队，继续抗日。一次因部队危急，赵尚志建议以攻为守进攻宾县，结果取得胜利，使部队转危为安。赵尚志即由马伋被任命为该部参谋长。但同年秋，孙朝阳在敌人派来奸细的挑拨下又欲谋杀害赵尚志。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率七人携械离队。同年十月，在党的珠河中心县委领导下于珠河三股流成立了珠河反日游击队，赵尚志当选为队长。此后，游击队转战中东铁路南北，取得许多胜利。一九三四年三月，又与附近二十余支义勇军组成哈东“反日联合

军司令部”，赵尚志被推选为总司令。五月二十五日，赵尚志指挥珠河游击队和联合军各部，兵临宾县城下，用柳树炮轰城，以步枪击落敌机一架，使哈尔滨的敌人为之震动。

一九三三年一月，吉林救国军王德林等越境入苏联后，李延禄按照党的指示，将救国军余部补充团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任司令，部队转战至密山。一九三四年三月，密山县委又成立了民众抗日军，即密山游击队。后来从宁安调周子歧任队长。这两支队伍在穆棱河两岸开展了游击战争，打击敌人。

一九三三年五月，经过中共宁安县委的长时期工作，将抗日武装“平南洋”队改编为“宁安工农义务队”，队长李荆璞。翌年春，周保中根据党的指示，率救国军余部边区军自安、敦、桦各县边界辗转到达宁安，并于一九三四年春联合工农义务队和附近救国军余部，成立了由党直接领导的绥宁抗日同盟军。同年五月，宁安县委又建立了宁安游击队。这些部队成为绥宁一带抗日部队的主力。

此外，在汤原和饶河，两地党的中心县委组织几经挫折，终于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和一九三四年二月，分别建立起汤原反日游击队和饶河民众反日游击队，各自活动在松花江北岸和乌苏里江左岸。

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这十余支抗日游击队，开始时虽然弱小，却在东北的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了顽强的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成为日伪统治者的心腹之患，给东北抗日武装斗争以鼓舞和希望。

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针 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山海关，华北危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月十七日发表了著名的《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不久，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信中提出了在东北这一“特殊的环境”中，应采取的结成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同年五月，中共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定接受中央这一指示，确定各地党组织和反日游击队当前的中心任务是：必须执行反日统一战线方针，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与民选政府。根据满洲省委的统一布置，从一九三三年九月以后，各地党的组织分别取消了苏维埃和红军抗日游击队的名称，成立抗日人民政府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并注意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和建设游击根据地。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磐石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不久，主力部队即行渡辉发江南下，会合海龙游击队，开辟新的游击区。师长兼政委杨靖宇采用声东击西战术，绕过伪军邵本良重兵驻守的据点凉水河子，攻入三源浦。当日伪军企图于大荒沟围歼独立师时，杨靖宇将计就计，声称调兵前来助战，却又突然攻下敌军后方的凉水河子。不久，又声扬攻打柳河县柞木台子，却

兵出临江县八道江。独立师的一连串的胜利，使伪军邵本良部胆战心惊，疲于奔命。独立师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对人民秋毫无犯，受到群众欢迎。一九三四年二月，独立师在濛江县三岔子附近城墙砬子（今属浑江市）召集附近十七支部队参加的抗日义勇军代表会议，在南满建立了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当选为总指挥。参加这一抗日联合军的武装力量共五千余人，约占当时南满一带抗日部队的一半以上。从此，独立师在江南站稳了脚跟，事实上成为南满反日武装力量的骨干与核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南满抗日部队的领导。此后，第一军独立师四处袭击敌军，屡获胜利。同年十一月，为加强党的领导召开了南满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中共南满临时特委组织，由李东光任特委书记。同时，正式组成了第一军，下辖二个师。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一九三五年九月，第一军与东满第二军一部会师濛江县那尔轰，南满与东满游击区取得了联系。这时，第一军兵力已达二千余人，另有地方武装二千人。抗日游击区由原来吉林省磐石等八个县境，扩展至辽宁省以金川、柳河、通化为中心的二十余县范围，西及宽甸、本溪，威胁沈阳，南至辑安、临江，直达中朝边境。游击根据地内建有农民协会、反日会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和自卫武装，中心区建立了基层抗日政权，还开展了一些经济工作。南满抗日游击区已经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重心之一。

一九三四年春，东满各地游击队统一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鉴于原有游击区多被敌人攻占，且

筑起大量“集团部落”，部队活动业已十分困难，便决定分兵转移。同年六月，该师一部与绥宁抗日同盟军等联合围攻汪清大甸子（今罗子沟）达七昼夜，然后北去宁安；另一部进军安图县境，联合附近抗日武装接连攻下车厂子（今新合）、大甸子（今万宝）、大沙河和安图县城，歼灭了大量敌军。第二军独立师在战斗中成长，兵力已达一千余名，遂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正式成立了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由中共东满特委书记魏拯民兼任。此后，第二军即以长白山为游击根据地，活跃在长图铁路东段沿线两侧，多次颠覆敌人军运列车或直达朝鲜的“国际列车”。同年五月二日，第二军一部在哈尔巴岭颠覆敌人从朝鲜开来的列车一列，击毙日伪军警三十余名，俘虏日伪军政官员十三人，震撼日伪中枢。敌伪报刊称谓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

第二军的另一部，在宁安与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并肩战斗。一九三五年秋季与冬季，第二军与第五军各一部联合组成西路军，活跃在额穆、敦化一带，与活跃在长图路南的第二军主力南北遥相呼应。

东满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战斗历程艰苦曲折，部队被隔离为东西两部分，原有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大部已经被迫放弃，转至新区活动。但是，第二军的主力依然保存，数量还有所发展，这是东满人民抗日斗争的有力支柱。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之初，各部分别积极活动，收缴伪警察和反动大排武装，打击敌伪势力，取得许多胜利。但反日同盟军是一种松散的武装抗日同盟，内部成分复杂，

部队还不巩固。一九三四年五月以后，相继发生了边区军离队回家；宁安游击队突遭敌军围攻；隐藏在工农义务队中的两个土匪头目发动叛乱等事件。结果，使反日同盟军遭受到重大损失。但是，由于中共宁安县委和周保中的坚定领导，挽救了这支部队。尔后，部队进行了整顿教育，化整为零，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不仅取得岔沟伏击战、猴石屯战斗、东南山阻击战等许多胜利，而且在战斗中又重建了宁安游击队和工农义务队，反日同盟军的力量有所恢复。

一九三五年二月，为贯彻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国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的纲领，在东北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武装力量，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确定将党所领导的一切抗日部队，统一改编为抗日联合军性质的部队。经吉东特委与反日同盟军党委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全军约九百人。不久，第五军决定分兵行动：东路军向穆棱进军，拟与第四军取得联络；西路军渡镜泊湖向额穆、敦化出击，威胁长图铁路，与第二军西部队取联系。同年十一月，西路军在青沟子、老头沟口围歼日军“讨伐队”，攻占官地、黑石，重创敌军。从而分别开辟了穆棱和额穆两处新的游击区。第五军与东满第二军东部队在一起共同战斗，协同打击敌人。

第五军是从旧军队与工农武装结合转变为人民抗日部队的重要典型。

一九三四年秋季与冬季，活跃在哈尔滨以东各县的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经过英勇的作战，取得了攻克五

常堡、八家子、康家炉等胜利。赵尚志率队返回珠河道南游击区途中，在肖田地的突围战中一举杀伤日伪军一百二十余名。敌人惊呼：哈东支队“必有名将指挥”。

一九三五年初，珠河的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为粉碎敌军“围剿”，在军长赵尚志指挥下，该军一部自珠河南部根据地绕经双城、阿城、宾县、延寿县境，直趋方正，横扫沿途敌军。该军一部在延寿中和镇附近一战，杀伤敌伪军警数十名，敌军以马拖尸大败而逃。第三军威震哈东各县。在方正，第三军与土龙山农民起义的民众军谢文东残部、吉林自卫军余部李华堂支队、桦川县驼腰子金矿起义工人编成的“明山队”等联合，经协商共同组织“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推举赵尚志为总指挥。会后联合攻入方正县城和大罗勒密。

同年九月，第三军兵力已达七百人。但在敌人实行毁灭性“讨伐”的情况下，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经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决定，哈东第三军主力部队再行东移。不久，与第四军会合，开辟了方正、依兰、勃利边境新的游击区。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珠河南部抗日游击根据地远近闻名。根据地内，反日会、农民委员会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并代行了抗日民主政权的职能，组织群众，支援战争。一九三五年秋，建立了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农民自卫队在一九三四年末即达五千人，有力地保卫了根据地群众的利益。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农民生活得到改善。故敌人称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共产党“哈东乐园”，抗日民众则称它是：“红地盘”。珠河抗日游击

根据地是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基地之一。一九三五年秋，第三军主力部队转移后，这一根据地遭受了敌人毁灭性的破坏。道北区委书记赵一曼，就是在道北根据地坚持反“讨伐”战争中身负重伤被俘，经受酷刑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的。

一九三三年秋，东北抗日救国游击军在李延禄率领下到达吉林省东部密山南部不久，便联合附近各种抗日武装成立了“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公推李延禄为该军负责人。各队独立活动，战时协同作战。但由于这支部队由旧军队转为反日革命军时间较短，部队中党员数量较少，党组织还不能完全掌握部队；又兼部队初到僻地，耳目不灵，屡遭敌军突袭，损失很大。一九三四年五月，中共密山县委在哈达河一带举行群众反日大暴动，组织伪军哗变。不久，反日革命军与密山游击队取得联系，共同在穆棱河两岸打击敌军。

同年十月，反日革命军与密山游击队联合其他抗日武装成立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第四军建立后不久，在军长李延禄指挥下攻入密山县城。尔后，主力部队向勃利、方正转移，开辟新区。一九三五年七月，在方正境内与第三军等部会合，联合攻克勃利县属刁翎，奔袭林口。九月，该军经过整顿，扩大了部队，同时将饶河游击队改编为该军第四团。全军兵力共达一千六百余人。同年冬，第四军与第三军各一部北跨松花江挺进汤原，与汤原游击队会师。

一九三四年青纱帐起之后，汤原反日游击队在汤原中

部太平川开辟了抗日游击区，宣传、发动各阶层群众，广泛开展瓦解敌军工作和统战工作，争取当地较有影响的太平川伪自卫团团团长张传福反正起义，动员前汤原县教育局局长刘铁石参加游击队。一九三五年夏，游击队又相继拔除了太平川游击区内的太平川警察署、耿家小铺和乔玉柱等几个敌伪据点。这时，原由格节河金矿矿警队反正组成的抗日义勇军——“文武队”，主动要求加入汤原游击队。汤原反日游击队壮大了。

一九三六年初，汤原游击总队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和第四军的协助下，迫使守备亮子河金矿的一连伪军放下武器，并用伪军交出的百余支枪进一步装备了部队。同年一月三十日，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全军兵力七百。三月，在代理政治部主任张寿箴^①指挥下，第六军一部奔赴小兴安岭，巧取敌人据点老钱柜，解除伪山林警察队全部武装，建立了后方根据地。

同年二月，经珠河中心县委同意，将经常与第三军联合对敌作战的汪雅臣部义勇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汪雅臣。该部活动在五常山区一带。

东北人民革命军在对敌斗争中成长壮大，至一九三五年末已有七千余指战员，成为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主力与核心，严重地威胁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① 张寿箴即李兆麟同志。

三、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与 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之后，东北党的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抗日部队便完全与中央断绝了联系，而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导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东北人民革命同盟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东北党组织和人民革命军立即响应，积极筹组建立东北抗日政府和东北抗日联军，以之促进全国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早日建立。一九三六年二月，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党在东北领导的所有抗日部队一律改称东北抗日联军，并吸收其他抗日武装参加这一联合军队，以扩大抗日统一战线。自一九三六年初至一九三七年秋，东北抗日联军陆续编成了十一个军。但由于党的满洲省委已被撤销，各军被敌人分割各地，联络不便，一直未能建立起统一的抗日政府和军队指挥机构，各地党组织与各军仍然分散独立作战。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东北特委书记魏拯民回国，在前往东满途经宁安地区时，在北湖头向宁安县委和第五军党委传达了有关编组东北抗日联军等决定。东北抗联第五军于二月中旬建立。此时，

正值日伪军对游击区实行不间断地“讨伐”，部队损失较大。为摆脱困境，第五军留少量部队同第二军第二师坚持宁安地区的斗争，主力部队自同年春开始分批越过中东铁路向勃利、依兰进军。一九三七年一月，在牡丹江下游大、小盘道伏击作战中，大量歼敌。三月二十日，在军长周保中统一指挥下，集结于依兰附近的抗联第三、四、五、八、九军各一部共七百余人，联合围攻依兰县城。首先炮击城东日军兵营，使日军龟缩营内不敢出援，攻城部队顺利攻入城内，击毙该县伪军日本指导官并俘虏伪军一部。从此，第五军即活跃在牡丹江与松花江下游各县的广大区域，兵力发展至三千人。其间，为加强党对于这一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于同年三月建立了中共吉东省委组织。

一九三六年三月，魏拯民在安图县向东满特委、第二军领导机关传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将部队改称东北抗联第二军，由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下辖三个师，兵力二千。尔后，二军一部转至敦化境内，以围城打援战术佯攻大蒲柴河，设伏寒葱沟，诱歼从敦化县城出援的一批敌人；另一部进入抚松与临江县境，在汤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第二军二师由陈翰章率领仍在绥宁地区与第五军共同战斗。

同年六月，为传达有关指示，魏拯民到南满金川县河里地区（今柳河、浑江边境）与杨靖宇会见。时值召开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进一步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会上宣布南满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称东北抗联第一军。尔后，由杨靖宇、魏拯民主持召开南满、

东满特委及第一、二军主要干部联席会议(即河里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一)将抗联第一、第二军合组为抗联第一路军，由杨靖宇、王德泰分任正副总司令，魏拯民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二)建立南满省委组织，统一领导南满与东满党的工作，选举魏拯民为书记。此后两支部队更为密切地展开了联合抗击日伪军的战斗。

此时，因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使日本殖民当局深感不安，日本关东军遂即制定了自一九三六年四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为期三年的“治安肃正计划”，确定以伪三江、滨江、吉林、间岛四省和安东、奉天两省部分地区为重点，调集重兵实行军事“讨伐”，强制实施集家并屯隔离抗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妄图达到一举消灭共产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的目的。为了粉碎日伪军大规模的军事“讨伐”，并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南满省委与抗联第一路军领导机关决定：第一军主力部队立即西征。

实际上，同年六月中旬，第一军第一师自桓仁西行，同月下旬正式西征，七月初即已分别越过安沈路，沿辽阳、岫岩边界向西突进。但由于敌人很快发现第一师行动意图，立即调集兵力实行跟追堵截，使西征部队前进受阻，且有陷入敌军重围的危险。西征部队领导机关当机立断，回师东返。七月十五日，在摩天岭伏击尾追之敌，歼灭今田大尉率领的日军守备队一个中队的一部。

河里会议后，杨靖宇率部西行，当得知第一师西征受阻后，又令第三师改为骑兵，于十一月趁冬季封冻迅速冲

过辽河。不巧，是年冬河水尚未封冻，渡船亦遍寻不到，只好又折回清原。第一军两次西征均未达到目的，部队损失很大，实行休整。

第一、第二军在抚松、临江、长白一带坚持广泛开展游击战，策应西征部队的行动，鼓舞了中朝人民抗日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此间，第二军军长王德泰于抚松小汤河战斗中壮烈牺牲。同年冬，第一军部队在回头沟，终于将死对头——伪东边道“讨伐”司令少将邵本良击成重伤，不久死去。

一九三六年一月下旬，齐集汤原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四军和汤原游击总队以及谢文东、李华堂部队举行联席会议，合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赵尚志被选为总司令，张寿箴任总政治部主任。之后，第三军一部在赵尚志带领下向西发展，在通河、巴彦开辟新区，与松花江南岸坚持宾、珠、延老区的部队相呼应。同年八月一日，正式改称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部队扩大成十个师，六千兵力，活跃在松花江两岸的二十余县境内。九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冯仲云任书记，加强了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领导。不久，为粉碎日伪军对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五县“大讨伐”，赵尚志军长指挥第三军一部再次西征铁骊、海伦、龙门等地。冰趟子战斗一举消灭日军三百余名。留在汤原的部队为策应主力西征，实行东进，于同年十二月攻下佛山县城（今嘉荫）。结果敌军东西无法兼顾，于汤原地区聚歼北满抗联部队的计划即行落空。

同年六月东北抗联第六军组成。六军与三军协同作战，

跨江开辟松花江南岸游击区，年末部队达二千余人。军长夏云杰在汤原西部遭敌伏击身负重伤后牺牲，军长一职改由戴鸿滨担任。一九三七年四月，六军一部西征海伦。五月，另一部攻入汤原县城，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下江人民的斗志。

一九三六年三月，中共吉东特派李延平接替李延禄职务代理军长，并将部队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四军。李延禄此后即被调至国外再转关内，专事东北抗日战争的宣传与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第四军一部去宝清、富锦开辟新区，一部随同第三军远征海伦。部队兵力达一千八百余人。

活动在饶河的第四军第四团随同改编为抗联第四军第二师，向同江、虎林扩展游击战争，取得头道林子、黑咀子等战斗的胜利。同年十一月，该师改编为抗联第七军。一九三七年一月初，军长陈荣久率部队陷入敌军重围，在突围战斗中牺牲。尔后，由崔石泉代理军长，继续在饶、虎、同、富等县与敌人战斗，部队达八百余人。

曾与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联合抗日的谢文东部民众军、李华堂支队，在抗联第三、四、五军的帮助下，表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相继于一九三六年九月和翌年一月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八军与第九军。这两支部队成分复杂，吉东省委与北满临时省委曾派去不少政治工作人员协助教育与改造，并派刘曙华、李熙山分任两军的政治部主任。李华堂部队改编前曾在一九三六年四月乘虚攻入依兰县城。一九三七年五月，抗联第八军配合第三军等部，袭击伪汤原县公署，并多次破袭牡佳铁路，断敌交通。第八、九军亦曾

分别发展至一千人与八百人不等。

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八军于一九三六年冬改编为东北抗联第十军，在军长汪雅臣率领下继续活动在五常、舒兰山区，成为抗联部队楔入拉滨路侧的一根钉子。

此时，早已参加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被编为游击团的祁明山部队，也改编为抗联独立师。著名的抗联七星砬子兵工厂，就是由独立师的修械所发展起来的。该师运用游击战术，频繁袭击敌伪小据点，收缴敌伪小股武装，取得多次战斗的胜利。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已经由小到大，号称“十大联军”，兵力达二万余人，成为中国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日武装力量。日本帝国主义称东北抗日联军是伪满洲国的“治安之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与上海相继发动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坚决还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从此，东北抗日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东北抗日联军的战略任务发生了变化，即由东北局部抗日战争变成了全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由单独作战改变为牵制日军，配合关内抗战。同时，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一些主要成员回国，并通知不再过问东北的工作，从此东北各地党的组织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因此，东北抗联部队在执行新的战略任务时，是在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发表《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揭露日本帝国主

义鲸吞中国的野心，号召东北人民在全国总动员之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满洲国”。第一军在辽宁各地积极主动出击。十月末，杨靖宇率部队在宽甸小佛爷沟门设下伏兵，而以一部佯攻四平街，结果诱歼一支日军守备队。十二月，部队返回桓仁，围攻雅河口，缴获大量军粮，补充了部队的储备。同时，第一军又以一部靠近沈阳、抚顺附近进行袭扰，使敌人寝食不安。

同年十月，由吉东方面派回来的第二军独立旅，经半年时间长途跋涉终于到达南满。魏拯民立即率领这支部队和原有部队，乘辉南县城敌军空虚之机，夜袭该城，歼敌一部，缴获大量过冬物资，扩大了政治影响。

此时，东北抗联各军大部分正集结于松花江下游一带，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消息传来，群众振奋。汤原县格节河区抗日军民响应党的北满临时省委的号召，于九月十八日举行抗日反满大暴动，声势浩大，吓得驻守在附近的日军立即逃走。伪军警的动摇情绪普遍滋长。七月十二日，二道河子森林警察大队一百五十余人宣布起义，参加抗联第五军；八月二十一日，驻依兰伪军三十八团一部一百一十八人起义，参加抗联第六军；九月十日，伪军二十九团六百余人反正，参加抗联第八军。

在这一高涨的抗日局面下，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吉东省委举行会议，适时指出：目前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任务，除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东北外，还要牵制日本侵略军入关，支援全国抗战。会议决定东北抗联第四、五、七、八、十各军合组第二路军。十月十日发表成立通告，由周保中

任总指挥。在此前后，各军已经实行了联合作战。同年八月，即有第四、五、八军各一部联合攻击勃利县三道通日军守敌的战斗；第五、八军与独立师联合在五道岗诱歼三百名伪军的战斗；第四、五、六军一部在宝清县凉水泉子围城打援，歼敌一百余名等战斗。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抓住全国抗战爆发的有利时机，领导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抗联第六军西征海伦部队与坚持该地活动的第三军一部曾连续进攻敌人据点叶家窝堡、侯家大屯和通北县宋家站；第三军一部远出密山、虎林边境，与饶河之第七军相呼应；第六军分别在绥滨、同江、富锦、宝清开辟新游击区。同年十月，抗联独立师正式改编为第十一军。

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日新高潮中继续壮大，兵力达三万余人，给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以莫大的威胁。

四、东北抗联各部远征，坚持艰苦的游击战争

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事变以后，为确保侵华战争基地的稳固，采取各种措施以加强它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面对东北军民抗日斗争日趋高涨的情势，日伪统治者进一步整顿和加强了军、警、宪、特机构，极力推行法西斯恐怖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向东北增兵。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在东北约有二十万军队，一九三八年竟猛增至四十万人。此时期，伪军也大量募兵，充实兵力，

伪警、宪、特机构遍设各地。据一九三八年统计，敌伪在东北城乡设立的警察署已达一千二百余个、分驻所达三千六百余个、派出所共一千六百余个。各城市和边境城镇还设立了宪兵队和特务保安局分支机构。并且，为弥补军警宪统治的不足，一九三七年末又实行反动的“市街村自卫法”，厉行保甲连坐和普遍组织伪自卫团，随时监视人民的活动，干涉人民的自由。在日伪的残暴统治下，东北到处都是一幅白色恐怖的景象。许多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及抗日反满团体遭受摧残，无数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爱国志士被敌人监禁或杀害。在一九三七年的“四一五”事件中，敌人破坏了地下的中共哈尔滨特委、哈东特委以及大连市委、海伦县委等组织；磐石、海龙、柳河等地党的组织也遭到破坏，七百四十五人被捕。一九三八年“三·一五”大破坏，在汤原、依兰、桦川、富锦和佳木斯市共有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三百八十七人被捕入狱。这两次事件，使北满和南满党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部被破坏，使党的事业和抗日力量遭受极大的摧残。

同时，敌人继东满、南满之后，又在吉东和北满抗日武装活动区域，加紧修筑“集团部落”。据敌人记载，一九三五年已修筑的“集团部落”为一千一百七十二个，一九三八年便增至一万二千五百六十五个。敌伪归屯并户是在杀人放火的极其残酷的法西斯暴行中推行的。为强迫农民离开世代耕种的土地与久居的家园，迁往指定的“集团部落”，竟将原有的村庄一律焚毁，把拒绝搬迁的农民尽行杀害。在“集团部落”内实行连坐法，组织自卫团或设置警察机构，

限制群众一切活动的自由。在“集团部落”之间，强迫农民修筑警备道路、架设通讯线路，便于相互联络。此外，还配合严密的经济封锁。敌人采取的这一措施，其目的是使抗日部队与群众彻底隔离，断绝部队对群众的武装保护和群众对部队的各种支援，陷抗日部队于孤立无援、饥寒交迫以至最后自行绝灭的境地。敌人的这种毒辣措施，对各地的抗日部队确实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从一九三七年冬开始，日本帝国主义按照“三年治安肃正计划”，将军事“讨伐”的重点转移到伪“三江省”地区。日伪统治者共调动日军三个师团、伪靖安军四个团和伪兴安军支队等约五万余兵力，分别围攻集聚在松花江、牡丹江下游地带的东北抗联各军，妄图“聚而歼之”。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委早已预料到敌人这一图谋，故原则上决定东北抗联各军除留部分部队坚持下江地区斗争外，主力部队分别脱离险区，转到外线作战，以破坏敌人的聚歼计划。

一九三八年春，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为打破敌军“聚歼”计划，保存力量，另辟新区，根据吉东省委决定，确定了“西征”计划。即以所属第四、第五军一部为主力，向五常、舒兰一带抗联第十军游击区突进，实行“旧区新活动”，以便牵制敌军对下江的“讨伐”；并打通与南满抗联第一路军和热河方面的联络。抗联第二路军西征部队近七百人，从一九三八年七月初自勃利县刁翎地区出发，经过荒无人烟的三百余里高山密林地带，翻越老爷岭，突然袭取山边小镇楼山，俘虏伪森警中队四十余人，缴获大量枪支

弹药。部队召集群众进行了抗日救国宣传。尔后分兵，一部返回刁翎；一部经横道河子西进；一部经向五常突击。这一地区虽是抗联第三军的旧游击区，但早已被敌人破坏，遍地修筑“集团部落”，统治严密。西征部队所到之处为解决给养，只有强攻硬打，很难得到群众的支援。敌人又调集三千日伪军实行追击和堵截，使前来接应西征军的抗联第十军不能靠拢。因此，形成孤军奋战，出现了严重的伤亡和减员现象。七月末，还发生了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叛逃投敌事件，影响极坏。

第二路军西征军经过苇河小五站、沙河子、九里地等地战斗后，进入五常境内冲河一带山区。但因敌军的严密封锁和分割包围，仍无法与抗联第十军会合，并且由于部队处在荒山野岭之中，给养发生了极大困难，时常数日不得饭吃，仅以山菜野果充饥，部队继续减员。至同年十一月下旬，抗联第四军正、副军长李延平、王光宇相继牺牲，部队损失净尽。抗联第五军所部向舒兰前进途中亦损失严重，相互失去联系，其中二十余人折向东去宁安；另一部百余人返回刁翎。“八女投江”的英雄事迹，就是在这支部队返抵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渡口与敌军激战之后发生的。抗联第五军妇女团冷云等八名女战士，在子弹打光、撤退无路的关头，宁死不屈，毅然跳进激流，壮烈殉国。

此次西征，第二路军主力部队虽然跳出了敌人设在松花江下游的包围圈，却又陷入敌军的另一重围，使抗联第四、第五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留在下江的第二路军部队，与众多围攻之敌周旋苦斗

之后，于一九三九年春分两路突围。在此期间，部队因损失严重，便以小部队分别活动在乌苏里江左岸和穆棱、东宁等地，坚持战斗。

一九三七年末至一九三八年初，在祁致中、赵尚志、戴鸿滨等相继进入苏联境内联系工作之后，经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部队主力向黑嫩平原远征。参加远征部队七百余人，自一九三八年六月开始分三批远征。他们披荆斩棘，忍饥挨饿，冲破敌军阻击，终于相继翻越小兴安岭，在同年秋冬先后抵达海伦境内，与活动在当地的第三军一部胜利会师。

北满抗联部队的远征，粉碎了敌人“聚歼”抗联部队于松花江下游的图谋，保存了主力，为开辟黑嫩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参加远征的各军到达海伦后，为加强统一领导与指挥，决定成立黑龙江省西北临时指挥部，由张寿箴、许享植分任政治与军事负责人。一九三九年初，西北临时指挥部又将各军部队统一改编为第一至第四等四个支队和第一、第二两个独立师。第一、二支队为龙北部队，主要活动在嫩江、讷河、德都、通北、克山等地。第三、四支队和两个独立师为龙南部队，活动在海伦、绥棱、庆城、铁力一带。一九三九年初，第二支队先后在德都县田家船口和谷家窑两次战斗中获得胜利，极大地振奋了部队士气，鼓舞了群众斗争的信心。同时，第三支队在袭击绥棱三道河子附近日本移民团采木场和一棵松日本森林采伐作业区等战斗中，缴获大量给养，用缴获的马匹使部队改装为骑兵。

留守在松花江下游的北满抗联各军部队不断地与日伪军发生激烈的战斗，但因敌强我弱，又被分割各地，部队损失很大。结果，其中一部继续西征至海伦，余一小部在党的北满临时省委派去的省委代表冯仲云的率领下，继续坚持战斗。

在敌军疯狂“讨伐”的情况下，抗联第八军谢文东所部与第九军李华堂率领的一部，畏惧艰苦，看不到抗日的前途，经日伪诱降日趋动摇，终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和七月先后叛变投敌。

一九三八年初，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一军除留第一师在本溪、宽甸、桓仁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外，军部和第三师在杨靖宇带领下向辑安老岭森林地带转移。此时，第二师和第二军一部正在老岭不断袭击敌通辑铁路工程。杨靖宇率部到达后立即投入战斗，于三月十三日向老岭隧道西口进行奇袭。同年五月，魏拯民率第二军一部也到达老岭地区与杨靖宇部队会合，并在此地密营召集第一路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根据全国和东满、南满地区的敌我斗争形势，决定了在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条件下保存实力，并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的方针，还提出第一军再次西征，打通与关内八路军的联络的设想。会议补选魏拯民兼任抗联第一路军副总司令。

会后，六月七日凌晨，魏拯民带第二军一部攻下通辑公路上的蚊子沟据点，以诱敌出援。杨靖宇与魏拯民分别率部在蚊子沟南北设伏待机歼敌。十二日，伪军索旅三十二团一部二百余人向辑安开进时，被杨靖宇指挥的伏兵一

举歼灭。尔后，抗联第一路军自六月十五日至十月中旬，对修筑中的通辑铁路和老岭隧道工程连续进行十八次频繁破袭，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工程陷于停顿状态。

在此期间，第一军一师师长程斌在桓仁境内率部叛变。为此，抗联第一路军总部于七月中旬在老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取消第一军继续西征计划，并统一改变部队编制，重新调整军事部署；取消抗联第一、二军番号，统一成立一个警卫旅和第一、第二、第三三个方面军，实行分区作战。八月二日，杨靖宇率警卫旅和第一方面军在通辑公路长岗，伏击了正欲寻找抗联部队进行报复的伪军索旅四十二团和三十二团余部，大获全胜。经前次蚊子沟战斗和此次长岗战斗，将骄横一时声称“包打杨靖宇”的伪军索旅给以全部歼灭。此后，杨靖宇率总司令部、警卫旅和第二方面军一部自辑安向金川河里地区转移。行军途中，于十月十八日在临江县八道江岔沟，不意被早已准备好的一千五百余名敌军层层包围。敌东南地区“讨伐”司令三木乘飞机在上空视察和指挥，认为杨靖宇此次将插翅难逃了。经整天战斗，因敌我力量相差悬殊，未能突围。杨靖宇冷静沉着，在察知包围军的薄弱环节后，便果断地组织冲锋队带头乘夜冲出了重围。敌人兴师动众策划许久的围歼杨靖宇部队的图谋，再次破产了。杨靖宇带领警卫旅转战柳、金、濛等县，取得许多胜利。

第一方面军几度进出辑安县境，转战通化、濛江、金川等广大地区，袭击了许多警察分所、“集团部落”。

第二方面军在临江分兵活动，一部转战长白、和龙中

朝边境，还曾到朝鲜境内进行游击活动。此外，尚未参加改编的第二军第四师转战蛟河、敦化、安图、延吉等地，频繁袭击敌伪警察部队，有所俘获。第二军第五师与抗联第二路军一部在宁安、东宁一带配合行动。一九三八年七月，曾袭击敌伪镜泊湖北湖头水电站工程，使该工程遭到严重破坏。

一九三九年秋，松花江下游的东北抗联各军主力部队转移之后，日伪统治者即将军事“讨伐”的重点移至南满，妄图彻底消灭抗联第一路军。从此，抗联第一路军的斗争进入了极为艰苦的时期。

同年九月，日本关东军针对东满与南满的抗联第一路军，制定了自一九三九年十月至一九四一年三月的“东边道治安肃正计划”，由野副昌德少将任“讨伐”司令，调集七万五千名兵力，在伪通化、间岛、吉林三省地区，开展大规模“讨伐”。此次敌军一改过去集中庞大兵力围歼抗联部队的作战方略，而采取了用重兵驻守一切战略要地，对抗联游击区施以长期封锁围困，同时组织名目繁多的“讨伐队”（如“出击队”、“挺进队”、“游击队”、“特搜班”、“工作班”等），对抗联各部实行分割包围、搜索、追击的战略战术，即所谓“踩踏战法”、“狗蝇子战术”。发现目标便盯住不放，穷追到底。此外，辅以欺骗宣传、诱降，派遣特务混入抗联部队策动叛变、实行瓦解等。

抗联第一路军广大指战员虽面临如此险恶形势，却十分坚定，再接再厉坚持苦斗。一九三九年七月末，第二军四师与五师在敦化县汉窑沟会合，由魏拯民主持合编为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尔后该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率领主

力部队于八月二十四日晨一举攻下大沙河，同时由魏拯民等各率一部分分别在南北之小沙河、大酱缸等地接连伏击了前来增援之敌，歼灭日军“宫本讨伐队”等大量日伪军。随后，九月二十四日，在敦化县寒葱岭附近又伏击开往大蒲柴河进行秋季“讨伐”的敌“松岛部队”一百余人，击毁汽车十一辆。

同年冬，敌人疯狂地跟踪追击抗联部队，战争达到空前残酷的阶段。在东北的寒冬，抗联战士冬装缺乏，常常身着单衣，足登单鞋在冰天雪地里行军。经常忍饥挨饿坚持战斗。指战员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行军中偶一不慎，一旦倒下就可能再也爬不起来，或被风雪掩埋掉。此时，抗联第一路军活动区大为缩小，被迫进入通化和东满密林山区，战斗异常频繁，部队陷入极端困境。据敌伪统计：仅一九三九年九月至十二月的四个月时间，第一路军各部便袭击敌人八十次、交战七十九次。在激烈的战斗中，抗联部队虽然取得许多胜利，但也受到极大的损伤。面对这一极其严重的形势，杨靖宇、魏拯民于一九三九年冬在桦甸头道溜河召集东、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会议决定，为保存实力，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将部队编成小部队，分散活动，以冲破敌人的“围剿”。

会后，杨靖宇率部至濛江县境活动。不久，因叛徒供出杨靖宇和总司令部的行动计划，日伪统治者即调集众多的部队于濛江县境进行严密搜索。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杨靖宇指挥所部与日军小滨部队和伪警程斌挺进队相继发生恶战之后，便将警卫旅主力派往桦甸，自己率一支小部队

在濛江境内与敌人周旋五十余天，战斗近四十次，但仍未脱出重围。二月十五日，在与追敌激战之后，杨靖宇身边已仅有六名战士。当晚，他命警卫员黄生发带三名负伤战士迅速摆脱敌人，他自己携同二名战士续行战斗。不久，随身战士亦全部牺牲。二月二十三日，杨靖宇只身一人在保安村三道崴子终于陷入敌军重围，经激战之后，不幸壮烈牺牲。杨靖宇的遗体被敌人解剖，发现在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尽是树皮、草根和棉絮！他的牺牲是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倒下了。但是，他的民族英雄形象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

一九四〇年三月十五日，魏拯民在桦甸县头道溜河主持召开南满省委扩大会议，决定从部队抽调干部到地方工作，密切部队与群众的联系。此后，第一方面军仅在同年三月，就连续袭击了临江珍珠门、大阳岔、三岔子和濛江县湾沟等地的许多支伪森林警察队和罪行昭著的敌长岛工作班。但是，这支部队在与敌军长期残酷的搏斗中，也损失净尽。

第二方面军，一直转战长白山麓抚松、安图、和龙等地。一九三九年年末袭击敦化县六棵松林场时，有一百余名伐木工人参加部队。翌年三月，这支部队继摧毁安图马鹿沟敌据点后，又进行了红旗河战斗。部队深夜袭入伐木场，俘虏全部伪军守敌，缴获大量武器和大批粮食。然后，又在大马鹿沟附近伏击歼灭追击之日军“前田讨伐队”。这是抗联第一路军在艰苦斗争时期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第三方面军一部在一九四〇年春，袭击了敦化县黄泥

河子车站，后与抗联第二路军第五军一部坚持在敦化、额穆一带战斗。

这一时期，抗联第一路军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损失很大，已由南满逐步向东满各县转移。

一九三九年春，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部直属部队和第五军一部自刁翎一带分别向宝清和穆林、宁安突围之后，于同年夏秋两季，在桦南、富锦与宝清边界的第五军第三师根据吉东省委执行部指示，将部队分编为小部队，实行分散游击。七月，该师一部伏击驼腰子采金船，八月，又袭击宝清县柳毛河日本采金公司采金点，皆获胜利。十月，另一部连续攻打宝清县凉水河子、王福岗等伪警察分所。十一月，第五军与第七军联合部队在大砬子东山和七星河地区与大批日伪军发生激战，消灭许多敌军。

同年春，活动在虎饶地区的抗联第七军，分头开展游击斗争，并耕种一些土地，以便坚持长期战斗。同年八月，该军一部袭击虎林县黑咀子敌秘密军火库工程，解放大批劳工，有一百余工人参加部队。同时，另一部至抚远攻入抓吉镇。同年冬，敌人调集四千兵力进攻第七军，部队缺衣少食，伤亡很大。

一九四〇年初，敌人又以重兵向桦、富、宝以及虎、饶抗联活动区进攻，使第二路军部队陷于困境。抗联第七军实行缩编，崔石泉调任第二路军参谋长，由王效明任第七军参谋长。同年三月，第五军第三师已仅余二十余人，被编入总指挥部警卫部队。

一九三九年冬，已经突围至穆棱、宁安的第五军一部

在穆棱北部一次与敌激战中，部队被击溃。此时，从西征五常返回的第五军一部，辗转至敦化与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会合，共同坚持战斗。

同年春季，在黑嫩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刚刚兴起之际，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集执委会议，决定：（一）改变北满临时省委为北满省委，选举金策为书记。（二）重新整顿抗联第三军、第六军，许亨植、张寿箴分任军长。（三）将第三、六、九、十一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并成立总指挥部。五月三十日，抗联第三路军宣布正式成立，张寿箴任总指挥、许亨植任总参谋长。

这一时期，龙北部队非常活跃，频繁袭击各地伪警察署、所，攻车站，陷村镇，获得许多胜利。据不完全统计：自一九三九年春至一九四〇年春，龙北部队与敌人进行大的战斗有四十余次，击毙二百五十余名日伪军，俘虏伪军五百余名，缴获大量武器弹药，部队有明显发展。部队在战斗中，还十分注意开展地方工作，协助建立了党的讷河县委，发展了救国会组织，成立了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同年九月十八日夜，冯治纲率第二支队从驻地哈拉巴岐山出发，在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的配合下，一举攻进讷河县城，砸烂伪县署等统治机构，攻进伪警备队驻地，缴长短枪二百三十余支，子弹三万发。翌日晨，部队召集群众大会，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群众深受鼓舞，当即有数十名群众参加了抗联部队。尔后，这支部队一部乘胜连续攻缴了孔国村、龙和镇等警察分所。入冬，该部又相继攻袭了克山县西城镇、嫩江县鹤山车站、讷河县讷南镇、通北县石

泉镇等。一九四〇年初，这支部队横跨嫩江深入内蒙阿荣旗一带，与蒙古、达斡尔等少数民族团结战斗，打击敌人。

龙南部队亦乘青纱帐起，在青岗、明水、拜泉、克东、克山等山区积极活动。独立师袭击关门咀子警察所，第三支队攻击海伦屯克镇，打击伪军警和自卫团。一九四〇年四月十八日夜，该支队袭击了绥棱县日本瑞穗村开拓团。

一九四〇年前四个月里，第三路军与敌军共作战四十五次，歼敌三百名、俘敌七十。一年来，北满抗日游击战争虽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粉碎了敌人“黑(河)、北(安)、龙(江)三省汇攻计划”，使日本侵略者吹嘘的“五大连池会师”彻底破产，开辟了新的抗日游击区。但是，抗联第三路军也有二百余名指战员在战斗中牺牲，各部仅余五百来人了。

自一九三九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日趋艰苦，部队人员锐减。但是，东北抗联指战员并没有为凶恶的敌人攻势和险恶的境域所吓倒，而是信心坚定，誓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讨伐”，并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总抗战。

在此不久之前，张寿箴和他的战友写下的著名诗篇——《露营之歌》，是对于这一时期东北抗日联军战斗生活的真实描绘：

铁岭绝岩，林木丛生，
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
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

同志们，锐志哪怕松江晚浪生。

起来呀，果敢冲锋！

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

光华万丈涌。

浓荫蔽天，野花弥漫，

湿云低暗，足溃汗滴气喘难。

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

战士们，热忱踏破兴安万重山！

奋斗哟，重任在肩！

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

黑暗一扫光。

荒田遍野，白露横天，

野火晶莹，敌垒频惊马不前。

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

弟兄们，镜泊瀑泉唤醒午梦酣！

携手吧，共赴国难！

握长缨，缚强奴，山河变，

片刻息烽烟。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

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

伟志兮，何能消灭！

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
夺回我河山。

长时期以来，不断有东北抗联部队因作战失利被迫进入苏联境内，在苏联党和军队的援助下得以休整，再返回东北战场。中国东北抗联部队也以抗击日军侵略的战斗行动，从实际上保卫了苏联边境的安全。这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体现。一九四〇年春，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东北党组织急欲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与得到必要的国际援助。同时，自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法西斯发动侵略欧洲战争以后，苏联也十分关心远东边境的安全。为此，中共北满与吉东党组织和抗联部队代表与苏联远东当局在伯力开会，达成协议：在保持中共东北党组织及抗联部队独立自主的条件下，由苏联协助转请共产国际帮助恢复东北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东北抗联接受苏联的某些必要的援助。同时，吉东与北满党组织和部队代表之间就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相互交流情况；根据东北的斗争环境和抗联各军的实际状况，商议东北抗联各部队改编为若干支队。会后，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周保中、冯仲云于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四日写信向中共中央报告，并请苏联方面设法代为转递。

吉东与北满代表分别返回东北后，向各地党和抗联部队领导机关传达了会议的决议。冯仲云在同年春，先后到海伦和绥棱向北满省委和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的金策、张寿篈进行了传达，决定将龙北部队编为第三、第九支队，将

龙南部队编为第六、第十二支队，决定由冯仲云任第三路军总政治委员。之后，第三路军按照北满省委决定，开展了“红五月”活动：第三支队连续袭击了嫩江四站和沐河伪警察武装；第六支队攻占铁力县圣浪车站。同年六、七月，各支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的游击战术，给敌人以重大的打击。第九支队在克山县杜保董村与伪军警发生激战之后，又袭击通北一个日本移民团；第三支队袭击了嫩江县科洛村伪警察署；第六支队夜袭铁力东北一日本守备队，之后又在望奎县高贤村击溃伪海伦警察大队；第十二大队攻入木兰县三合店敌兵站，焚毁敌一座兵营。抗联第三路军的胜利激怒了敌人，七月二十日，日伪军警骑兵奔袭朝阳山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该总指挥部虽然迅速转移，但付出了牺牲教导队十名干部学员的代价。此后，各支队在北满十八个县展开了军事的与政治的攻势。八月，三支队又相继攻击了讷河县的讷南镇、通宽镇、拉哈站。抗联部队每到一地便深入地向群众进行抗日宣传，颇受爱国群众的拥护。日伪统治者惊呼：“抗联第三路军的‘赤化’工作值得注意”。

同年九月，龙北部队在进山休整前，由冯仲云、王明贵等率领第三、第九支队，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九月二十五日晚突然攻入克山县城，占领伪县署、银行和伪军十九团团部，打开武器库，缴得炮四门、枪支一百五十余支，共击毙日军三十人，俘伪军八十人，释放了监狱中被关押的二百余群众。这次战斗的胜利，再一次鼓舞了北满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三支队北上后，十月十三日，又攻入了嫩江

县霍龙门车站，然后横渡嫩江，活跃在莫力达瓦旗、阿荣旗、甘南、泰来等地。后来，重返朝阳山后休整。

同年八月，第十二支队在许亨植指挥下奔赴肇东、肇州、肇源三县广阔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北满省委早已派人在这里开展地下工作，建立了党的肇州县委和救国会组织。这支部队在九月十一日夜袭肇州丰乐镇，占领伪警察署、银行，没收大量伪币，部队也得到扩大。十一月八日夜，部队又联合当地义勇军一部，乘肇源县城敌伪召集“剿匪祝捷大会”之机，攻入肇源，歼灭和俘虏了抵抗之敌，缴枪二百二十余支。翌晨，部队召开群众大会，宣讲抗日救国道理，分发粮食，群众大批参军。部队立即由缴获敌军警的鞍马改装成骑兵。缴获的枪支、物资用两辆汽车和十余辆马车运走。部队又连续攻破头台镇、三站、托古村、古龙站等，迅速开展三肇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在三肇地区取得的胜利，影响深远，震动了哈尔滨敌伪当局，极大地鼓舞了各界爱国群众的抗日热情。不久，哈尔滨王岗伪航空学校三百余名学生举行抗日反满起义，就是在它的影响下发生的。

一九四〇年三月末，参加伯力会议的周保中和新任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返回宝清，向崔石泉、王效明等传达会议精神。四月一日召开第七军党代会，决定将第七军改为抗联第二支队。由王汝起任支队长，王效明为政委。该支队于五月一日袭击宝清南小色别拉河日军屯垦小队，七月三十日在七星河上游截击来追之敌，八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又在勃利南方堆东车站附近等地连续炸毁图佳路上的桥

梁和列车。这支部队在九月十三日还接应了驻宝清七星河镇伪军三十团一部百余人的起义，并占领该镇，起义士兵一部参加了抗联。

一九四〇年夏秋间，几经挫折，第五军军长柴世荣和政委季青在汪清片底子集合余部与第一路军一部共同开展斗争，十一月四日袭击东宁县杨木桥子伪森林警察队。

远隔在五常山区的抗联第十军，在敌军长期“搜剿”之下，孤军奋战。一九四一年初，在一次突围战斗中，军长汪雅臣负重伤后牺牲，部队散失。

一九四〇年下半年，抗联第一路军第二方面军活动在安图、敦化、延吉一带，与警卫旅会合，共同对敌斗争。攻袭敦化哈尔巴岭车站和黄泥河子伪警察队。同年末去东宁活动。

同年五月，第三方面军与第二路军五军二师一部，在陈翰章、陶净非指挥下远征舒兰、五常，活动在拉林河上游一带。六月二日，攻袭舒兰县日本林业伐木场。六月五日，又袭击五常县拉林河森林警察香水河子分队获胜。七月，又攻入五常县冲河镇。八月，这两支部队返回额穆时被敌冲散，第三方面军再去五常县境游击。十月，返抵镜泊湖地区又与五军二师会合共同活动。后遭敌军追击，部队损失很大。十二月八日，第三方面军一部被敌军围攻，战斗中陈翰章壮烈牺牲。

一九四一年三月八日，长期患病无法行走、留在桦甸县夹皮沟东部牡丹岭密营休养的魏拯民，不幸病饿而逝。这是东北抗日事业中的又一重大损失。

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军侵占巴黎之后，西欧几乎全部处在德、意法西斯铁蹄之下。九月，德、意、日三国订立同盟条约，德军在十月即行转攻罗马尼亚，战火即将危及苏联。此时，苏联不但须防备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同时也十分关注远东日本帝国主义的动向。苏联当局援用同年春与中国吉东、北满代表的协议，于年底邀请东北抗联部队各方代表赴伯力集会，并声称有中共中央代表与会解决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各项问题。这时，久盼与党中央重建联系的东北各地党组织和抗联部队，便派出周保中、崔石泉、张寿箴、金策、冯仲云等前往参加会议。同时，东、南满和吉东方面抗联部队因环境极端困难，便各留置若干小部队坚持斗争，其余部队均行陆续过界，集结在中苏边境休整待命。

会议开始后，苏方通知：中共中央代表不能参加会议。因此，会议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此期间，东北各地代表决定抗联各部经休整后迅速返回东北战场，继续战斗。同时，决定将抗联第一路军余部统一编为抗联第一支队，将第二路军第五军余部编为第五支队。

一九四一年春，当东北抗联各部行将返回东北战场时，苏联为争取时间准备反侵略战争，于同年四月十三日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因苏联从对日关系的考虑，东北抗联部队虽已整装待发，也只好暂停过界回国。抗联各部在滞留中苏边境期间便设立野营集结训练，以待时机。在此期间，抗联部队主要活动是进行军事训练、政治和文化学习，建设营房，准备返归东北战场。

同年六月，希特勒向苏联发动大规模突然袭击，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十二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一九四二年秋，经共产国际同意，将集结在中苏边境的东北抗联部队整编为教导旅（亦称国际旅），由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篈任副旅长兼政治委员。不久，教导旅成立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即中共东北党委员会），由崔石泉任书记。此时，东北抗联部队共约一千人。

东北抗日联军部队，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期间，除时刻准备返回东北战场外，还不断地派遣许多小部队回东北活动。他们分布在北满、吉东、东满、辽吉边界、中朝边境，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军事、交通设施，侦察敌情，准备反攻。

一九四一年，抗联第三路军主力部队仍在北满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第三支队在王明贵、王钧、陈雷等领导下，于同年春转战北黑铁路以西、嫩江以东的朝阳山一带，曾袭击北安县龙门村辰清屯警察分所等。夏秋间青纱帐起，又于六月二十二日攻克汗达气，八月二十五日攻克阿荣旗振威庄敌据点，三十日攻克毓丰堡。同时，第九支队在郭铁坚等率领下，袭击了拜泉县勤俭村警察分所。九月，第三支队又攻入宝山镇，连续进行骆驼山、石场沟等战斗。十二月，袭破大扬奇营，攻克乌苏门宝吉等三个金矿。同年末，日本帝国主义在北满修筑军事工程，驻以重兵，遍设军事哨所，组织大量部队追击抗联武装，黑嫩地区斗争环境极度恶化。因此，为保存实力，北满抗联主力部队在张寿篈率领下越境至野营休整训练。一九四二年，金策、许

亨植仍率领第六支队和十二支队一部，在铁力、庆城、东兴、巴彦、木兰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同年八月，在庆安县青峰岭的一次突围战中，许亨植壮烈殉国。九月十一日夜，北满抗联一部袭击木兰县城西大贵屯警察分所。

一九四一年秋，前抗联第三军军长赵尚志携带一支小部队返回东北战场。翌年二月，赵尚志率所部袭击梧桐河伪警备队时，被混入队内的敌人派遣特务自背后枪击重伤后牺牲。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三年冬，一直坚持在饶河爆马顶子一带的抗联第二支队刘雁来小部队，一面从事农业生产，一面侦察敌情，及时向野营通报。在东北抗联坚持抗日斗争行动的影响和帮助下，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凌晨，驻饶河东安镇伪靖安军第二团一连人起义，其中七十一名士兵携大批枪支弹药进入苏联境内，投奔抗联野营。

从一九四一年开始，东北抗联野营总指挥部不断地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战场坚持游击活动。同年四月，野营派出一个三十余人组成的小部队，到延吉、和龙、汪清、琿春、安图、敦化、桦甸、蛟河等地开展游击和侦察活动，还帮助恢复了一些党的地方组织和群众团体。同年六月，派出金光侠小部队曾炸毁林口至佳木斯铁路线上的一段铁路和桥梁。八月中旬，由季青率领的一支五十人的小部队返回中东路道南地区。九月，派李中彦等小部队炸毁图们至牡丹江间的一段铁路和桥梁。王效明、隋长青等小部队曾多次破袭图佳铁路，使敌人运输时常停顿。一九四二年春，派出陶净非小部队深入五常、舒兰，并与原第五军二

师和第一路军警卫旅的余部相会合。季青小部队与柴世荣小部队分别在道南和穆棱、林口一带活动。总之，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派到东北的小部队共达三百人次以上。

东北抗日联军处于最严重的困难时期，始终没有放弃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他们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英勇、顽强地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战斗。

五、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 和八路军、新四军解放东北

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德国投降后，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孤立。这时，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虽然力图垂死挣扎，但已无法拔出泥腿和挽回败局。尤其在华北、山东、苏北、苏中战场，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围困下，只有蹙缩在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等狭小地区。在东北，八路军业已进入热河作战。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军队也已逼近日本本土。苏联根据同年二月雅尔塔协定，即将实行对日作战。东北抗日联军部队为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进行了积极的准备。

同年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九日凌晨苏联红军即行突破日军防线进入东北。翌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发表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

早在七月下旬，抗联开始抽调出数百名指战员组织小部队，空降到指定的地方，进行战前侦察和配合苏军作战。同时，原在东北各地坚持游击战争的抗联小部队，也接到了抗联野营方面的指示，立即配合作战。隐蔽地下的朴更芝小部队，在数日间便扩大为千余人，在苏军尚未到达前就已威震延边，攻取许多村镇。

由于战局急转直下，日本帝国主义迅速战败投降。东北抗日联军部队和中共东北党委员会至同年八月中旬返回东北，利用与苏军协同作战的有利条件，迅速占领了十个地区五十七个战略据点，并且抓紧时机放手发动群众，建立人民军队、革命政权和积极建立与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不久，成立了党的松江、黑龙江、佳木斯、牡丹江、吉林、延吉、长春、沈阳等地党组织以及所属的各个市、县委等。在建立各地党组织的过程中，自一九四三年由中共中央委托党的晋察冀分局领导的东北工作委员会派到东北来的地下党员和干部，以及关内各解放区不同时期派到东北来的地下党员和干部，都前来与东北党委员会接头，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抗联部队所到之处，十分重视建军工作。鉴于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要来抢夺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因而军队今后的任务将是反对国民党挑动内战，保卫抗战胜利成果。遂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以东北抗日联军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自卫军，由周保中任总司令。同时，在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吉林、延吉等地分设自卫军总指挥部。不久，部队迅速发展，十月

已达七万余人。

这对于保卫东北的抗日战争胜利成果，迎接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八路军、新四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准备了初步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的组成部分，东北抗联斗争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光荣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北抗日联军为东北的解放、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中国人民心中。

“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

张一波 袁鲁毅

东北抗日联军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德国法西斯全线崩溃之际，于一九四五年春、夏期间，积极进行反攻东北的战略准备，并与苏联红军一起实行了战略反攻，为光复祖国东北大好河山和贯彻执行我党关于争取东北实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为返回祖国配合苏军作战 做好一切准备

一九四五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捷报频传，东北抗联迎来了极其有利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形势。在西方战线，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苏联红军开始进攻柏林，五月二日苏军攻占柏林。五月八日在柏林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在东方战线，经过一九四五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二十一日，盟军对日军八十二天的激战，占领冲绳岛，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圣战”一败涂地。在中国战场上，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敌后战场从一九四四年开始，进入

局部战略反攻；一九四五年春、夏，华南、华中、华北各解放区战场，也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参加了会议。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并发布了会议公报。《雅尔塔协定》规定：在德国投降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四月五日，《苏日中立条约》被废除。这意味着苏军即将对日作战。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以美、英、中三国名义发布了《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

此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极大地鼓舞了东北抗日联军。

在配合苏军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的战斗准备中，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定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工作方针

（1）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二日，经共产国际批准由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部发布命令，将东北抗日联军在苏境内部队编成步兵第八十八特别教导旅时，明确抗联的方针为：培养训练中国东北的民族革命的军事干部。一旦满洲形势发生变化，抗联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苏联红军与中

国八路军的连锁，使东北人民早日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故要求八十八旅的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领会战略、战术思想和游击运动的原则、经验，精通和掌握现代化各种兵器的性能和技术。

(2)为适应现代战争和反攻的需要，培养无线电通讯技术干部和政治干部。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反攻形势即将到来前夕，抗日联军制定了五条方针：①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参加东北的反攻作战；②扩大东北抗日联军六万至十万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③发展全民统一战线，恢复东北抗日救国总会；④恢复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对各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开展各地方的抗日斗争；⑤中共东北党委员会与中共中央迅速取得联系，并在东北开展抗日斗争。同时还确定了三项具体工作：一是补充政治干部，加强政治训练；二是补充人员，从游击队或非游击队员中补充；三是马上派小部队返回东北，建立和恢复抗联的工作基础，分五个地区（辽吉区、吉东区、哈东区、北黑区、汤源区）开展工作。

(二)制定进入东北的作战计划

苏军攻克柏林之后，苏军远东情报部长索尔金少将对周保中讲，依照总司令普尔卡耶夫大将和军事委员法捷夫的指示，东北抗日联军将随苏军进发东北，参加解放东北和内蒙的战斗。

为参加大规模的对日作战，东北党委员会和东北抗联决定开展敌后活动，做好敌后侦察和伞降敌后游击队的准

备工作。

苏军对日开战前，抗日联军先由南、北野营派出数十个先遣小分队，伞降东北敌后，以小规模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后方活动，侦察日寇调兵遣将动向，随时电报苏军。

东北抗联剩下的三百余人，组成小分队，直接参加苏联红军在三个战区作战。随同苏军向东北大、中、小城市迅速挺进，接收东北，抢占五十七个战略要点。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苏军总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军事委员希金中将，召见东北抗日联军负责人周保中，谈了两个问题：第一，要求抗联帮助苏军维持占领地区的革命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提高苏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促进中苏人民友好；第二，利用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在主要占领地区之外，建立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召见后，周保中向东北党委员会及抗联的负责干部传达了苏军元帅的谈话，并布置了任务：

第一，抗联反攻东北后，迅速抢占五十七个战略要点，即十二个大城市和四十五个中、小城市，接收东北。

第二，在各战略点的抗联主要负责人，都兼任苏军卫戍区司令部副司令；发给抗联战士苏军军官证书。为保密不暴露本人是东北抗联的身份，在军官证书上，都改换成假名。

第三，规定联络系统和联络工具，决定抗联人员调动及与苏军总指挥的联络办法，并规定了周保中部队与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的隶属关系和与其他两个方面军的

关系。

为实现上述任务，东北党委员会和东北抗日联军决定采取以下三种措施：

第一，提衔晋级一批抗联战士。

第二，发展一批共产党员。鉴于东北抗联战士，经过了长期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均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东北党委员会决定，不经过候补期将他们吸收为中共正式党员。

第三，任命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分别到辽、吉、黑三省几十个大、中、小城市，担任苏军卫戍区司令部副司令或红军的其他职务。

改组了中共东北党委员会，加强各项准备工作的领导。

这一决定作出之后，抗联战士分别乘飞机或火车前往赴任，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随同苏军抢占了五十七个战略点。同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决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争取全部控制东北或控制大部。抗日联军抢占东北五十七个战略点，为实现中共中央这一决定，创造了良好条件。

（三）加紧战斗训练

抗日联军自进入苏联以后，长期进行的是以防守为主的游击战争的原理、原则的训练。一九四五年以来，为迎接反攻东北的战斗，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的进攻战的战斗训练，其中包括多兵种联合作战的战术训练。经过紧张、艰苦的战斗训练，取得了良好效果。

（四）加强政治工作

1. 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抗联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树立终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决心。从一九四五年五月开始，组织抗联战士、政治工作人员、党员、团员、非党同志，共同学习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和文件。通过学习，提高了指战员对共产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并对非党同志的家庭历史情况进行了审查。这些非党同志在与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苦战的十四年当中，经受了千辛万苦和严峻的考验，都具备了共产党员的条件，所以在反攻前，党组织都先后把他们发展为中共党员。这就极大地提高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政治素质。

2.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侵华史，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大好河山，屠杀我国人民的国难史教育，进一步激发抗联战士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抗联战士对日寇的仇恨，更加坚定了抗联战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决心。

3. 进行阶级教育。发动抗联战士，控诉蒋介石、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实行不抵抗主义，丢掉东北三千万同胞和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又妄图调动百万大军反共打内战的罪行，从而使抗联战士下定决心，在打败日寇之后，收复东北，解放全中国。除此，还进行了形势教育。在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后，抗联战士欢欣鼓舞，立即举行会议，以全体抗联战士的名义，向斯大林发电报请战，要求随同苏军反攻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祖国。

二、配合苏军，消灭日伪残余势力， 抢占重要城镇

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九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国内投扔两颗原子弹。八月八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八月九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月十日至十一日，朱德连续发布七道命令：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均可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一切敌伪受降。还命令八路军进兵辽宁、热河、吉林，配合苏军作战，原东北军，向察哈尔、热河、辽宁进兵等等。

当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不断传到抗联时，抗联战士沸腾了，高歌，拥抱，激动得热泪不止。他们谈论着未来，等待着下达反攻东北的命令。

当时，抗联在四个方面配合苏军对日作战：

(一)抗联小部队直接参加苏军对日防御体系的侦察工作。这项工作早在一九四〇年就开始了，到一九四五年，抗日联军派出小分队潜入东北三十多个市县境内侦察（总计约二百七十多人次），绘制边境地带敌防御工事图；摸清了日寇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前的作战部署，即以较少的兵力凭借多年构筑的工事，在东北边境设防，主力部队则收缩在东北腹地，形成以长春为顶点，以图门、大连为底边的三角形战略体系，企图进行持久抵抗，俟机转入反攻。

东北抗日联军，在苏军进攻东北的三个方面军中，都分别派出伞降先遣小分队，配合苏军作战。六月二日就有一部分抗联战士伞降到东北。李明顺、姜德、赵奎武、刘继发、王立臣等伞降到牡丹江南部，傅奎忱、刘子臣伞降到林口，孙明山等潜入穆棱，边侦察边发报。八月十六日，苏军在李明顺等人的配合下攻占了牡丹江市。

(二)隐蔽下来的抗联小分队，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残敌。苏联出兵前，在东北境内隐蔽下来的，如王亚东小部队，在“八·一五”后发展为一百余人，有三挺机枪。在群众积极参加和支持下，他们在穆棱县泉眼河，打败了一支数百人的日军部队，夺得了武器。后与苏军西巴诺少校会师。这支队伍后来发展到二千多人，被编为牡丹江军分区独立第三团。朴更芝小分队，在“八·一五”后，于延边组织了数千人的部队，浩浩荡荡，威震延边，攻城夺镇，配合苏军消灭残敌。后来，这支部队编为独立二师五团，朴任团长；由延安挺进东北的原抗联老战士肖茂荣任副团长。

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小部队，也发展很快，积极投入了饶河、宝清、同江、富锦和汤原等地的战斗。

指导北满小部队活动的是于天放，他在北安一带，组织了人民自卫军，配合苏军打击日寇；并与王明贵、张瑞麟、王钧、陈雷等分遣队会合。

(三)派遣抗联小分队为苏军各路军做向导。苏联对日宣战后，周保中命令一批抗联战士分遣到苏军各方面军作向导。如王乃武与陈忠领等九位抗联战士，给苏军第二集团军做向导。在他们引导下苏军由富锦向佳木斯地区挺进，

一举解放了佳木斯、萝北县。王乃武被任命为佳木斯苏军卫戍区副司令，陈忠领被任命为萝北县苏军卫戍区副司令兼萝北县长。王庆云是苏军由饶河向宝清、勃利进攻的向导并参加了战斗。

(四)抗联抢占东北五十七个战略要点。根据斯大林和远东苏军总指挥部司令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示和东北党委员会的部署，经过一系列的紧张准备，东北抗日联军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初，分四批从伯力乘飞机，由苏军总指挥部派人护送到东北各地，抢占战略要点。

第一批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一百七十人飞往东北，李兆麟、王效明等赴哈尔滨、吉林、延吉地区。

第二批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由彭施鲁带部队从伯力大飞机场起飞，到佳木斯地区。

第三批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八日，由周保中亲自带领长春点、沈阳点各组人员，分乘四架飞机，飞抵指定地点。

第四批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由王明贵、范德林、董崇彬带领各组，飞赴齐齐哈尔点和大连点。

各个点的抗联同志迅速投入了接收工作，并建立了各种组织。如长春点的同志立即单独组织了长春警备司令部办事处，设公安、社会、工务、政治部、特务部；并把领导人员分派到长春各地。九月十日，抗日联军先后接收了长春康德新闻社、广播电台、邮电局、公安局等许多要害部门；清查了城市消防队人员（一百余名）；组织自愿警察三百余人，建立了警备司令部保卫组织；要求苏军指挥部发给适当数量的武器；命令各医院照常工作；及时与高丽

办事处、日本居民会取得联系和进行工作；对长春工业区的工作也作了全面的安排。

抗日联军在苏军支持下，利用广播电台和报纸，向全世界宣传东北抗日联军的英雄业绩，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八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十一月四日、十二月二十三日，国民党派中央通讯社东北特派员刘序东先后两次带人来长春接管电台，均遭到拒绝。抗联不仅接收了电台、报社，还抓了经济工作：没收了敌伪财产作为抗联扩充队伍的资源，没收了敌伪军用仓库，供八路军、新四军和挺进东北干部团冬季调用。此外，还接收了铁路、银行、矿山、工厂等经济要害部门，对装备我军起到了重大作用。

(五)抗联在五十七个战略点，积极开展建党、建军、建政的“三建”工作。抗日联军进到东北五十七个战略点之后，就开展了建党、建军、建政工作。首先协助苏军肃清日伪残余和反动武装，为建党打下组织基础，之后进行建党工作。先后建立了长春市委、吉林市委、延吉党委、延吉各县县委、牡丹江党委和宁安、穆棱、林口各地方党委、佳木斯党委、哈尔滨党委。同时，积极寻找原抗联隐蔽下来的同志和地下党，以及关内派来的地下党员，与他们结合起来，形成各个战略点的革命核心力量。

各个战略点，建军工作也抓得相当出色。为了对付国民党反动派，抗日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周保中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在各大点建立了各地区人民自卫军司令部，任命了地区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总指挥，并刻了

印鉴送往哈尔滨、齐齐哈尔、北安、佳木斯、牡丹江、吉林、延吉等地。如彭施鲁在佳木斯就收到了长春送去的关于委任他为佳木斯地区人民自卫军总指挥的任命书及印鉴。金光侠被任命为牡丹江人民自卫军的领导人。至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日之前，编队的人数已达四万余人，仅长春地区就发展了五个步兵团、二个骑兵连，约二万人。又过了一段时间，人民自卫军发展到七万人。在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齐齐哈尔、北安、海伦、绥化、沈阳、大连等地区，都建立了名称不同的武装部队。收缴的武器及苏军从日寇仓库交给抗联的武器弹药，各地没有详细统计，仅长春一地，截止十月十五日的统计就有：步枪六万支、轻机枪二千挺、重机枪八百挺、掷弹筒五百个以上、迫击炮二十余门、山野炮二十余门、弹药一千二百余万发以上。这些武器大部分是由长春王一知、范德林负责接管的。

抗日联军的建军工作，是在同日、伪满残渣余孽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先遣军、挺进军进行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如延吉地区，作战范围相当大，曾击溃了盘踞在汪清北部万余匪军，创建了延吉根据地，为人民自卫军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再如巴彦地区，日本投降后有警察大队约一百多人，苏军没有缴他们的械，命令他们维持地方治安。但是，他们与所谓的地下国民党互相勾结，妄图兴风作浪。在苏联红军的支持下，抗日联军解除了他们的武装，镇压了这股反动势力。又如苏军占领长春后，长春的维持会就成立了。其成员是伪满官吏和反动地主、反动会道门及特务等人。他们以不同的形式，反对苏军和抗日联军对

东北的接收，特别是有一股反动武装力量，活动十分猖獗。一些汉奸走狗、警察特务，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先遣军”，有的自任“总司令”、“参谋长”；有的挂起国民党的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的牌子。他们打黑枪，残害我党干部，造谣言，欺骗群众，扰乱社会治安。对这些反动势力，苏军和抗日联军及时给以打击并予以清除。随着抗日联军改为东北人民自卫军，各战略点的群众组织统一为东北民主大同盟。民主大同盟的主要成分是：反攻东北的抗日联军干部；失散的抗联战士或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人员；从关内派到东北的地下工作人员；当地的进步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等。民主大同盟的活动：主要是搞建军，领导和发展武装力量；处理民事纠纷；与各战略点的地方维持会相对立，并与其进行斗争。

三、接上关系，在东北局领导下 积极工作

东北抗日联军反攻东北后，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急于要同中共中央接上关系。特别是在苏军支持下抢占了东北五十七个战略点之后，更急需得到中央的具体指示。

一九四五年九月，以彭真为首的东北局到达沈阳后，周保中、崔石泉前往沈阳，代表东北党委员会向东北局汇报工作，冯仲云、刘铁石也参加了。这次汇报进行了两天两夜。主要汇报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十四年来，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和艰苦斗争的情

况。大体分为五个阶段：“九·一八”事变后，各地自卫军、救国军等名目繁多的抗日义勇军纷纷兴起，人数最多时达三十万人，后来相继失败，这是最初阶段；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的发展壮大阶段；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创立和发展阶段；东北抗日联军实行统一建制，共编十一个大联军，号称十万大军阶段；日本投降后，抗日联军改编为东北人民自卫军阶段。

第二，东北地下党的斗争情况。一九三五年满洲省委撤销后，组成四个省委。一九四〇年又形成“三人团”的统一领导，一九四二年八月，建立了东北党委员会。后来又分成东北党委员会和朝鲜工作团两部分。自从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就与中央失掉了联系。之后，东北党组织曾多次努力，设法与中央联系，均未成功。汇报中提交了东北党员名单、档案。

第三，抗联小部队的斗争情况。抗联战略转移到苏联境内后，与苏联红军、边防军取得联系，建立了地区军事合作，建立了南、北两个野营。一九四二年又成立了步兵第“八十八”特别教导旅，在野营的五年间，化整为零，分成十五个小部队，长期在东北边境活动。苏军对日开战后，小部队又积极配合苏军作战。

第四，抗联为返回东北所做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派出数十个伞降小分队，配合苏军侦察日寇在东北的全部设防地区的防御工程，为苏军进兵东北提供了条件。

第五，抗联反攻东北后，抢占东北三省五十七个战略点的情况及其重要意义，提交了各个点的人员名单。

东北局听完汇报之后，彭真对东北党委员会的工作和东北抗日联军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四、日本投降后，争夺东北的斗争

经过十四年苦斗的东北抗日联军，随同苏联红军最早返回东北，占领了五十七座大、中、小城市，人民武装发展为七万人，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但是，在抗战期间躲在峨嵋山上的国民党蒋介石，为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于一九四五年八月三十一日发布命令：在东北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为东北最高军事机关。行营设政治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分别主持东北的政治、经济工作。十月九日，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由重庆飞达长春，与苏联远东军总部联系国民党“行政接收”东北问题。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精神，苏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同意国民党将“东北行营”设在长春。十月十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率四十多人，由重庆乘机飞抵长春。蒋经国向苏军总部提出交涉，要求苏军协助国民党人员进行“行政接收”。苏军总部指出：东北各地抗日武装、抗日联军、人民自卫军、八路军和民主政权，纯系东北人民自己建立的，与苏军无关；至于“行政接收”，那是中国的内政，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不许干涉内政的原则，苏军不便于协助和参与。尔后，蒋经国又向苏军总部提出派莫德惠到吉林，金镇去沈阳，张潜华去哈尔滨视察的要求，希望苏军予以协助。十月二十一日，苏军总部特备一列专车送莫

德惠到吉林；但苏军同时声明：对去沈阳、哈尔滨的人则不负安全责任。

熊式辉、蒋经国的接收一再碰壁。四十多名接收大员，进行了十多天工作，毫无成果。在此期间，苏军总部提出：“凡在苏军占领区内，由日军使用的一切物件，均系合法战利品”。熊式辉、蒋经国不知如何应付。于是熊式辉在十月二十一日匆匆飞离长春，返回重庆，向蒋介石请示对策。

蒋介石决定：由外交部把苏军在战利品名义下运走东北工业设备，以及掩护共产党扩充武力、建立政权、阻挠国民党政府“接收”等情况，用备忘录形式送到苏联政府；派往东北的接收人员，迅速飞往长春，做好“行政接收”的准备工作；抽调中央精锐“国军”，立刻由陆、海、空三路向东北运兵，做好“军事接收”的各种准备。

熊式辉得到旨意，于十月二十五日飞回长春。十月二十九日国民党将四百多名接收大员运抵长春。在此之前，蒋经国曾再度向苏军总部提出对“行政接收”给予便利和协助的要求，杜聿明亦提出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登陆的问题，均未取得苏方同意。

面对这种情况，以熊式辉为首的国民党“接收”人员只好整日龟缩在长春市内的“满炭大楼”里，不敢走出一步。熊式辉束手无策，于十一月十日，又匆匆飞回重庆请示蒋介石。

十一月十七日，东北行营代主任张嘉璈在“满炭大楼”饭厅，对四百名接收大员讲话：奉蒋介石命令“一个多月以

来，几经交涉，不但‘接收’问题横生枝节，一再受阻，而且长春市内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他宣布从当天下午起‘接收’人员总撤退。除留董彦平及少数人员在长春继续与苏军交涉外，所有人员一律撤到北平待命。

一九四六年一月，国民党“接收大员”又回到长春，有的也曾进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可是，面对苏军，面对日益壮大的东北人民武装，还是无计可施，国民党全部“接收大员”于三月二十五日，不得不又坐飞机逃回北平。至此，国民党妄图利用“接收大员”和平抢占东北人民胜利果实的妄想全部破灭。于是，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便依靠美国援助运兵东北，实行“武力接收”。一场内战、一场争夺东北的战争，又降临在东北人民头上。为粉碎敌人进攻，保卫人民的胜利果实，东北抗日联军改名为东北人民自卫军，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五日，与八路军、新四军统一建制，改名为东北民主联军，周保中同志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在党中央、东北局的领导下，这支人民武装力量，在东北展开了对国民党的殊死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的 创建、巩固和发展

丁 晓 春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是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全方位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解放战争一开始，我十万大军和两万党政干部挺进东北，和随苏联红军返回东北的原抗联力量一起，为开辟东北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不仅建立和巩固了这块根据地，并且使其成了全国解放最早的地区之一，并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本文仅从所搜集的资料，对东北根据地创建和巩固作些介绍，与同志们共同研究探讨。

一、“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中的向北发展，主要是向东北发展；向南防御则是收缩南方战线，将江南部队撤至长江以北，加强北方的防线。这个战略方针的提出与制订是有一个转变、认识与实践的过程的。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战略转变

日本侵略者投降以前，党中央的战略不是向北发展，

而是向南发展。从一九四四年我解放区抗日民主力量对日寇局部反攻开始，党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也就是向南发展，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为了执行这一方针，党中央除指示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向上述地区派出部队和干部以外，还特地将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护送干部，挺进华南，准备与东江纵队会合，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三五九旅主力四千余人在王震、王首道领导下，由延安出发南征，经河南、湖北，直插湘中，创立了湘鄂赣根据地。党的七大提出了力争东北的问题，然而七大的战略方针仍然是向南发展。党中央将刘转连、晏福生领导的三五九旅在陕甘宁的留守部和文年生部，共五千余人，组成南下第二梯队，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告别延安，开始南征。南下第二梯队的任务是与王震率领的第一梯队会合，开辟新根据地，为迎接大反攻、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准备。这种向南发展的方针，一直执行到日本投降之前，就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党中央给王震、王首道的电报还指示：苏军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的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党中央向南发展的战略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日本法西斯即将总崩溃，如日军退向我沿海地区时，华南根据地就可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反攻，收复失地；二是蒋介石在日本投降后，如果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华南各根据地就可形成一翼，牵制蒋军力量，配合各解放区进行自卫战争。因此，党中央向南发展的战

略是完全正确的。

抗日战争的迅速胜利，急剧地改变了国内外形势。蒋介石集团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从峨嵋山上下来，采取各种阴谋手段，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第一，不惜与日伪合流，抢夺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蒋介石命令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固守所占地区，阻止人民军队受降，将伪军一、二、三、四、五、六方面军改编为国民党部队，使五十万伪军一下子就成了国民党正规军。蒋介石很快在华南、华东以至华中夺得了一大批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

第二，与美国加紧勾结，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为全面内战作准备。在抗日战争后期，美国就确定了扶蒋反共政策。从一九四二年到抗战结束，美国给蒋介石的军事援助就达十五亿美元，帮国民党训练的军队有三十个师团。抗战一结束，于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六日，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决议，以价值八亿美元的二百七十一艘舰艇，赠送给国民党。八月三十一日，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将原值八亿三千七百万美元的西太平洋战争剩余物资竟以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又帮助国民党训练、装备了五十七个美式机械化师团；还直接派遣九万多美军陆续在塘沽、青岛、上海、秦皇岛等地登陆；用军舰运送国民党部队，抢夺华东、华北、东北等沿海港口。

第三，利用和谈，争取时间，赶运国民党军抢占地盘。抗战胜利后，和平是全国人民的希望和要求。但是，蒋介石在美国的策划下，开始玩弄起和谈花招，从八月十四日

起三次急电毛泽东主席去重庆谈判。为挽救和平，避免战争，教育人民，我党派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代表团，于八月二十八日赴重庆谈判。蒋介石的“和平”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共产党交出解放区政权和人民武装。国共两党长期的对立和斗争，彼此都清楚这种条件是不能接受的。为了表示和平诚意，我党作了某些让步。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寸步不让。就在毛泽东主席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就印发了十年内战期间的《剿匪手册》。在谈判期间，蒋介石除抢占了大批大中城镇和地区外，还从后方调遣了国民党第十、十一、十二战区和胡宗南的部队，向华北即我八路军、新四军驻地和解放区中心地带，积极进攻。因而，一场全面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形势下，在华南、华东、甚至中原地区，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军队遭到国民党军的进攻和堵截。南征第一梯队，虽历尽千辛万苦，一次又一次突破敌人重围，也无法实现原计划。八月二十九日，王震和王首道联名电请中央：“我入湘、粤、赣以来，连续跋山、涉水、战斗、露营、受饿，忍受种种痛苦一致为达到与我粤军会师”。敌为实现“剿共目的，所有村、镇、乡电话网和特务组织十分严密，使我们行动极为困难。日本投降后，形势根本变化，我在广东五岭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故我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不久，中央军委命王震部挥师北上。八月底南征第二梯队，也奉命停止南征。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向南发展的战略已不能适应新形

势的变化，迫切需要制订出新的战略方针。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就是党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而做出的英明战略决策。

（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制定

东北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第一，它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工业发达（重工业占当时全国的百分之九十）；第二，它北靠苏联，西接蒙古，东与朝鲜毗邻，南与华北解放区接壤，并与山东半岛解放区隔海相望。蒋介石深知东北在战略上的重要，因而拼命与我党争夺。如果蒋介石控制了东北，就可切断我与苏联的联系，对解放区形成南北夹击的包围局面，使我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如果我党控制了东北，不但可以摆脱根据地长期受敌人包围的困境，而且可以把东北建成我党我军的重要战略基地。因此，东北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与蒋介石国民党激烈争夺的一个重要焦点。向北发展，主要是我党力争控制东北。

七大的战略方针，虽然是向南发展，但是七大提出了争取东北的问题，并充分阐明了东北地区对全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八月九日，苏联出兵东北，我党力争控制东北的时机随之到来。八月十一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发布第二号命令：“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收日满敌伪军投降，令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

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现驻河北、辽宁边境之李运昌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由于党中央对东北情况不甚了解，为了谨慎起见，在这道命令发出的同时，又发了一个内部指示，指出：“这个命令为对外宣传抢先取得国内外公开地位而发。除李运昌部外，并非要吕（正操）、张（学思）、万（毅）等部马上开往四省”，暂时到边界待命。所以，当时开往东北的只有李运昌部五千余人。它的任务一方面是配合苏军作战，另一方面主要任务是进行战略侦察，为党中央制订东北战略作准备。

八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定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公布。它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大连港为国际自由港，中长铁路由中苏两国政府共管，旅顺军港租予苏联；苏联政府尊重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证不干涉中国内政。这些内容是根据雅尔塔协定而确定的。事前，党中央对条约内容和谈判过程毫无所知。条约公布后，党中央经研究认为：“它有利于两国人民与世界和平，尤其是远东和平”，肯定了条约的精神。根据条约的规定，中央认为：“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但是派干部去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当即决定派张秀山领导八百多名干部离开延安，到晋西北与林枫领导的干部团会合，组成一千五百余人的东北支队，开赴东北。八月二十九日，中央发出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明确指出：根据中苏条约规定，“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

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进入东北。负责护送干部的延安两个团、冀鲁一个团和山东万毅部的四千余人，奉命向东北挺进。中央还指示晋察冀和山东分局派得力干部带电台，进到苏军后方，随时报告情况，为中央作出派大批部队和干部开赴东北的决策提供依据。

山东中央分局根据中央的多次指示，首先派出了由胶东区党委城工部长陈云涛为首的六人，到大连进行侦察。接着决定派出吕其恩、邹大鹏率领六百余人，由海路取捷径进入东北，了解情况，用电台直接向中央汇报。吕、邹部原定八月二十五日出发，因大雨，延至二十六日出发。出发前，派出了以吕易为首的一个侦察排。该排在海上漂泊到大连登陆，大部队于八月二十九日清晨在庄河海岸登陆，八月三十日攻占庄河县城。当时，苏军只占领了少数大中城市，绝大多数中小城镇特别是广大乡村空虚。大多数敌伪政权，等待接收投降，只有少数敌伪负隅顽抗。九月初，吕、邹部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

九月十一日，中央根据吕、邹的报告，给山东分局发出了关于调四个师的部队去东北开辟工作的指示：“据胶东区党委派人在大连侦察报告，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估计短时间内不能到达）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中央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

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上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还指出：进入东北后，“首先进驻乡村、小城市及红军尚未占领的中等城市和交通线，发动群众，壮大力量，建立地方政权，改编伪军，组织地方武装，协助苏军建立民主秩序”。至此，党中央向北发展的基本思想初步形成。

当时，挺进东北的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曾克林部于九月六日进驻沈阳，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欢迎，并在苏联红军的同意和支持下，成立了以曾克林为司令的卫戍司令部，接收政权，维持社会治安。我军进沈后，苏联红军为了解决执行中苏条约中的问题，奉苏共中央的命令，决定派苏军上校卫斯别夫赴延安与我党中央接洽，曾克林陪同前往。

九月十四日上午，曾克林和苏军代表飞抵延安。中央根据曾克林关于东北情况的汇报，于当日晚至次日（即九月十五日）凌晨，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的东北中央局，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彭真、陈云等同志立即起程，于九月十八日到达沈阳）。同时，党中央给各中央分局发出关于配备一百个团的干部进入东北的指示，指出：目前我党在东北的任务是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山东、晋察冀、冀鲁豫及太行准备开入东北的部队，应迅速继续前进。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陆续起身前去。从班、排、连、营、团长和事务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备。各部队自寻路线，迅速进入

东北。九月十七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提议为实现我党力争东北、完全控制热察两省的计划，将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留下一部分力量坚持和发展华东根据地，执行“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收到电报后，立即回电表示完全赞同。

九月十九日，党中央终于最后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刘少奇代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指示对全国战略部署作了调整：山东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向冀东及东北运动；华东新四军（除五师外）调八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浙东我军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即撤返江北。指示最后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中央还决定派高岗、张闻天、李富春、林彪、罗荣桓等去东北工作。

（三）在全国各解放区的密切配合下， 我军在东北的行动迅速展开

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发布后，罗

荣桓率山东主力一、二、三、七师和五、六师大部，从海、陆两路，向东北进发。九月二十三日，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三师接到党中央开赴东北的命令，九月二十八日，从淮阴出发，向东北挺进。九月下旬，原南征的第二梯队刘转连部和文年生部奉命挥师北上，向东北开进。各解放区还选出一批优秀干部，在武装力量的护送下亦向东北开进。至此，在全党全军形成了一个向东北进军的热潮。

正当大批主力部队和地方党政干部进军东北之际，蒋介石国民党也调集一些地方官员和部队，利用中苏条约，企图从海、陆、空强占东北。八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发表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并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划分东北三省为九省。九月五日又发表任命东北九省二市主席、市长的命令。十月十二日，熊式辉带领一批国民党官员以“接收主权”的名义到达长春，并空运了伪满冀东讨伐队姜鹏飞部改编的第十四军一千多人到长春和哈尔滨。原计划继续空运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各大城市，由于东北各主要城市为苏军军事要地，蒋军飞机在苏军撤退前无法着陆，空运被迫停止。熊式辉又派出代表，要求苏军协助，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大连和营口登陆。由于大连是商港，苏联据国际条约予以拒绝。十月十八日，蒋介石发表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十月二十八日，杜聿明飞抵长春，再次要求苏军在营口、葫芦岛掩护国民党军队登陆。苏方则以苏军已从上述地区撤出为理由，表示无法予以协助。于是，蒋介石依靠已调集在华北的大批国民党军队，企图打通陆地交通，向东北进犯。

十月中旬，国民党傅作义部集中全部主力约五万人，抢占绥东地区，进攻我张家口和承德，妄图占领热、察两省。十月十四日，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主力约四万五千人，从新乡沿平汉路北犯，企图打通平汉路，进抵石家庄，尔后会同胡宗南部继续北进，隔断华北解放区与东北地区的联系。十月下旬，国民党十七个军约四十万人，在日伪军的接应下，分批向华东解放区推进，企图打通津浦路，进军华北、东北。针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党中央及时指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我军，从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中旬，先后组织了察绥战役、邯郸战役和津浦路战役，共歼敌七万二千余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就大大迟滞了蒋军的北进，确保了我军大批主力部队和党政干部进军东北的安全，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先机展开争取了时间。

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在全国各解放区的全力支援和掩护下，我大批主力部队和大批干部，陆续到达东北。

八月下旬，邹大鹏、吕其恩率胶东、蓬莱独立营六百余人到达大连庄河地区。

九月初，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的曾克林、唐凯部等两个团两个支队，约四千余人，到达锦州、沈阳、本溪、南满各地；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三个团一个营约五千人，到达山海关、锦州、沈阳一带。

十月上旬，肖华率山东军区司、政、供、卫等部，约一千余人，到达安东（现在丹东）；沙克率冀中三十一团，约一千五百人，到达锦州地区。

十月中旬，山东万毅所率滨海支队，约三千五百人，到达磐石、海龙、东丰、西丰一带；吕正操率晋西的一个小团，约六百人，到达沈阳。

十月下旬，吴克华、彭嘉庆率胶东军区第六师和第五师两个团，约八千余人，全部到达营口地区；渤海的第七师杨国夫率六千余人，到达山海关地区，刘其人率六千余人到古北口，于一九四六年二月到达东北；三五九旅刘转连、晏福生部，约三千余人到达本溪、抚顺地区；邓克明率冀鲁豫一个团，约一千余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文年生率陕甘警一旅，约三千余人，到达锦州地区。

十一月上旬，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率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和警卫部队及几个独立营，约四千余人，分别到达安东及沈阳地区；山东二师罗华生部，约七千五百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

十一月中旬，山东一师梁兴初部，约七千五百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山东田松支队，约一千人，到达牡丹江地区。

十一月中、下旬至十二月初，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部（包括七旅、八旅、十旅、独立旅及三个特务团）共三万二千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罗舜初率山东三师及鲁中警备第三旅，约九千多人，到达辽阳、鞍山地区。

此外，还有延安教二旅三千余人，抗大一千人，炮校一千余人，先后到达南满地区。

至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初，总计前后到达东北的部队为十万零七千多人。十月三十日，中央决定成立了以林彪为

总司令，彭真为政治委员的东北人民自治军，一九四六年一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

与此同时，由全国各解放区抽调的党、政、军各级干部及各种技术人员也先后到达东北。其中：随李运昌部进入东北的干部约二千五百多人；从延安调入的五千三百七十二人；从晋绥调入的五百一十七人；从晋冀鲁豫调入的一千八百四十四人；从晋察冀调入的一千六百零四人；从冀热辽调入的三百一十八人；从山东调入的一千五百一十一人；从华中调入的一千三百零七人；从华东调入的一百六十三人；从中原调入的一百零三人。此外，加上陆续调入东北的干部，总计约二万人。这里包括二十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其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

这些部队和干部，很多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具有较丰富的斗争经验，又经过了整风教育，是一支战斗力相当强的队伍。由于有了这支队伍，又有与苏联红军一起，已经占领了不少大中城市的抗日联军，这就为我党我军在东北的发展、开辟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开辟东北根据地

我主力部队和党政干部在东北迅速展开工作后，怎样实现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即将东北建成巩固的根据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新课题。当时的形势错综复杂、瞬息万变，

因而，对待这样一个新课题是有一个认识与实践过程的。

（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和我党 在东北的自卫战争

当我军迅速进军东北之际，国民党蒋介石以海、陆、空三路加紧向东北运兵，与我争夺东北。美国对我东北，一直是虎视眈眈的。对于这一点，苏联早有警惕，在中苏条约谈判时，斯大林向国民党代表提出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美国不得在东北驻一兵一卒”。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即苏联出兵东北的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海军司令抢占我旅顺军港，由于苏联航降部队先期到达，美国阴谋才未能得逞。于是便又迅速抢占我华北各重要港口。九月三十日，美海军陆战队一万八千余人在塘沽登陆。十月一日，美军三千人侵入天津。十月二日，美军一千四百余人侵入秦皇岛，并陆续侵入北平、唐山地区。十月十日，美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蒋介石就利用美国抢占的这些港口加紧向东北运兵。十月十五日，美机空运国民党九十四军一部到天津地区。十月下旬，美舰帮助国民党将十三军、五十二军由缅甸、昆明经南宁、广州海运北上，陆续在秦皇岛登陆。十月二十五日，国民党军在美国的掩护下，开始向我山海关守军发起小规模进攻。

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开始党中央曾考虑采取控制东北，独占东北方针。十月十九日，中央提出“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十月二十三日，又提出过“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

量”，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对我山海关的进攻。

山海关是我军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于八月三十日从日本侵略者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山海关是通向东北的咽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这里驻有冀热辽军区李运昌部三个团、山东七师杨国夫率领的三个团，共计一万二千余人，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坚决进行了自卫还击，多次将敌人击退。十一月八日，杜聿明亲自指挥国民党原驻九龙的全美械机械化部队十三军和驻越南的半机械化的五十二军共五个师七万余人，向我山海关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次敌人除正面进攻我山海关外，还进攻我山海关西南的沙河桥阵地。我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十一月十六日，在敌众我寡和敌人三面包围的不利形势下，我军主动撤出山海关，向绥中方面撤退。敌占山海关后，又于十九日占领绥中，后进占兴城、锦西和葫芦岛，直接威胁锦州，形势甚为严重。

山海关失守前，中央曾一度设想执行内线作战方针，令杨国夫、李运昌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以逸待劳，补充枪弹，创造战场。俟敌进至绥中或兴城地区，疲劳和消耗至相当程度时，我再集中最大兵力，于最有利之时间、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实行反攻，在正面主力决战同时，从侧面切断敌军后路，分作几次战斗，最后全歼敌军，从战略上解决问题。根据中央的决定，林彪于十一月十九日去辽西前线指挥作战。

山海关失守后，形势急剧变化。此时，国民党军队除已到达山海关前线的十三军、五十二军等部以外，蒋介石又命新六军廖耀湘部、新一军孙立人部、七十一军陈明仁部、六十军曾泽生部、九十三军卢濬泉部五个军的兵力，由美舰陆续运到秦皇岛登陆开赴东北作战。敌十三军、五十二军凭借其精良装备、炮空优势和初战锐气，长驱直入，向锦州急进。此时我山东一师梁兴初部和新四军三师黄克诚部已到达锦州以西地区。然而，我军远路新到，立足未稳，部队疲劳，械弹不足，又无根据地，正如当时黄克诚所说：部队目前遇到的是“七无”：无地方党组织，无群众组织，无政权，无后方，无粮食，无鞋袜、衣服等，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因此，进行决战，歼灭进犯的强敌，是难以完成任务的。这时苏联由于外交上的困难，决意执行中苏条约，把东北各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移交给国民党政府，坚决要求我党我军退出这些地区。

山海关失守后，控制东北独占东北已不可能。党中央于十一月二十日向东北局发出指示，要东北我军让出大城市，“迅速在东满、北满和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作持久打算。二十二日，中央在给重庆代表团的电报中，把上述部署明确地概括为八个大字：“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同日，林彪在前线致电中央和东北局：“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惶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经东北局研究，认为符合实际。我军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主动撤出锦州。

此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部署开始了从“独占东北”到“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重要转变。

（二）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 和作战方针的提出

在东北工作方针和作战部署新的转变过程中，东北局和东北各分局的许多领导干部向中央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我军主动撤出锦州前一天开始，分局主要领导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连续召开了三天会议，最后由陈云主持起草了关于《对满洲工作几点意见》，以陈、高、洛三人名义致电东北局转中央。电报分析了苏联在东北所采取的基本政策，总结了我军进入东北后三个月来的斗争经验，阐明了东北的实际状况，提出了我党在东北工作应采取的基本方针。这个基本方针是：“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为此，电报特别强调，

北满是处于南满的后方，北满根据地的建设极为重要。并提出：“我们的兵力、干部、资材，必须主动地向那些地区转移，以造成我们前进和后退的阵地。”电报还针对当时党内部分干部思想上缺乏战争准备的情况，强调指出：只有教育干部正确地认识优势与劣势的关系，准备经过长期战争和艰苦的根据地建设，以达到包围和歼灭大城市之敌，最后取得全局的优势，夺取全东北的胜利。

这个电报是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分两次发往中央的。中央在第一天收到电报全文的一半时，立即回电说：看了你们未完的电报，中央完全同意。与此同时，黄克诚、李富春和罗荣桓等，也分别给中央发了与陈、高、洛意见相似的电报。然而，这些正确意见并没有形成为东北党的统一意见。于是，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以批评性的语气指出：“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我提议你们把屁股坐在东满、北满、西满等可靠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不使全局陷入被动。”

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对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军事部署作了更加明确而具体的决定。他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要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还指出：要反复教育干部和部队

懂得，只要将群众发动起来“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我们就能在东北和热河立住脚跟，并取得确定胜利。”

对于当时我军在东北的部署，也明确地指出，要“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和后来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三）四平保卫战，北满、西满、东满和南满根据地的初步建立

党中央和毛泽东不仅为我党制定了正确的全国战略，而且为东北我党我军制定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然而，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这些方针经过半年多才得到贯彻和落实。

当时，东北的形势极其复杂。国民党军队占领锦州后，修整一个月。这时，运抵东北的国民党军队除五十二军是半美械装备以外，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和十三军，全是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国民党军依仗其优势，分南、中、北三路向东北我军，发动疯狂进攻：中路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侵占新民，十四日占彰武；南路于二月十日侵占盘山、台安，十四日占辽中；北路于二月十日侵占公主屯、鹞欢池，十一日一个加强团侵占秀水河子。为了打

击敌人的疯狂气焰，东北我军集中两个主力师七个团的优势兵力，对孤军深入秀水河子的敌一个团，发起攻击，全歼四个营，取得了我军在东北战场第一次歼敌一个整团的胜利。与此同时，苏联由于外交上的原因，执意让我党我军撤出，将沈、长、哈三市及中长路，交给国民党政府。东北局根据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的指示，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末撤出沈阳，又相继撤出了长春、哈尔滨等市。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苏军开始由沈阳沿中长路北撤回国。十三日，国民党军进占沈阳。接着，蒋介石又玩弄起假和平真内战的手段，一方面与我党和谈，并于三月二十七日签订东北停战协定（六月七日才生效）；另一方面又以沈阳为基地向周围扩张，先后占领了鞍山、海城、营口、抚顺、铁岭、法库等地。四月上旬，敌军又继续向南、向北进犯，妄图一举消灭我军，独霸东北。

四月上旬，敌军开始南攻本溪，北犯四平。为了打击蒋军的猖狂进攻，配合停战谈判，并迟滞敌人向北满、东满解放区进攻，以争取时间创建根据地，四月六日，中央发出了保卫四平、本溪的指示。东北我军根据中央指示，发起了保卫四平和保卫本溪战役。四平保卫战从四月十八日正式展开，历时一个月，我参战部队英勇地抗击了敌军五个师兵力的进攻，毙伤俘敌万余人，我军亦伤亡八千余人。五月中旬，敌进攻兵力增至十个师，在敌军优势兵力进攻下，应采取怎样的作战方针？当时多数同志认为：为了打击敌军的嚣张气焰和争取时间，在四平打一仗是必要的，但不应死守太久，在不利条件时应主动撤出，将主力

转移到广大乡村去，认真落实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五月中旬，林彪请示中央，并经中央同意，于五月十九日，迅速撤出四平、长春、吉林等地，保存了主力，摆脱了被动和不利地位。六月七日，东满我军发起新站、拉法战斗，歼敌一个团另一个营。南满我军继五月二日主动撤出本溪后，于二十二日发起了鞍（山）海（城）战役，歼敌一八四师一个团，该师师长潘朔端率两个团三千多人起义。这些战役，对停止敌人的进攻，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山东我军在胶济、津浦线发起进攻，使蒋军不能继续增兵东北，无力在东北继续组织进攻，被迫于六月六日与我达成东北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实际停战四个月。至此，敌军分散占领了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我军大部主力撤至松花江北岸休整，与先期进入各地的我党我军力量结合，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分别在北满、西满、东满以及南满创建根据地。

北满地区的根据地创建最早，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就在嫩江、龙江、合江、松江、牡丹江五省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下旬，北满分局成立后，立即改造旧政权，组织兵力进行剿匪，逐步稳定了局面。一九四六年春，我军从四平撤到北满地区后，与地方部队配合，彻底清剿土匪，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开展清算运动，分土地等。在斗争中创造了“经济——武装——经济”等一整套发动群众的经验，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西满地区的根据地创建也较早，它包括辽西、辽北和

东蒙等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了西满分局。我军进入东北，就创建了辽西根据地。后来，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进犯，我军主力北撤过江，辽西的干部和部队便与原在吉江地区活动的干部和部队一起，于辽吉地区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辽北根据地，是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初派去的干部和部队为基础，在梨树、白城子和洮南等地创建起来。一九四六年四月，我军收复齐齐哈尔后，辽北根据地便进一步在嫩南地区扩大。内蒙东三盟在西满分局领导下，一九四五年冬便成立了东蒙自治政府。一九四六年四月，中央决定统一内蒙古自治运动，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迅速建立起东蒙根据地。

东满地区的根据地，主要包括辽吉和延吉地区。由于这些地区多在中长路以东，俗称东满。在初期，该地区曾一度因受战争破坏和扩编部队叛变的影响，根据地创建工作迟于北满、西满。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军撤出长春、吉林，主力部队相继到达东满，迅速剿匪，发动群众，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南满地区的根据地，在我军进入东北初期，就开始了创建工作，主要包括辽东、辽宁地区。后来，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特别是一九四六年十月以后，蒋介石推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方针，我南满大部地区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根据地缩小到只包括长白、临江、蒙江、抚松四县的狭小地带。直到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后，南满根据地才又得到了恢复、发展和扩大。

三、东北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东北根据地从开辟到巩固，经历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东北党组织根据中央的指示统一了党内军内思想，制定了各项方针政策，动员一万二千名干部下乡，深入发动农民群众，清剿土匪、实行土改、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壮大了我军实力，为取得全东北的解放，并为全国解放战争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一）东北局七月扩大会议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把东北尽快地建成中国革命巩固的战略基地，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再次重申要实行中央去年十二月对东北工作指示；并于六月十六日，根据东北局关于内部分工的报告，决定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四人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七月上旬，改组后的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东北工作的指示精神，分析了国内外和东北的形势，总结了近一年来创建根据地和阻击国民党军队进攻的经验教训，从东北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全面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及各项具体政策。七月七日，会议通过了委托陈云同志起草的《东北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

决议正确地估计了东北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了建立东北根据地有利的国际、国内条件，分析了东北我党工作中的弱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各项任务。这个决议，统一了东北我党我军的思想，使东北党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沿着中央指示的道路走上了正轨。

会议还决定干部下乡发动群众，开展农村工作。各地干部纷纷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下乡热潮。各省、县派出了工作团、工作队。东北局仅向合江、牡丹江地区就派去了由一千多名新老干部组成的七个工作团。据统计，仅七、八月间，东、西、北满各地下乡干部达一万二千多人，为全面展开根据地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全面开展根据地的建设

全面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关键是实行土地改革，把广大农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但当时东北的匪患严重，阻碍着土改工作和其他工作的开展。针对这一情况，东北局指示下乡工作团，从清剿土匪入手，进行了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1）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相结合，彻底肃清土匪。东北土匪，绝大多数是受国民党委任，以伪军、宪特、地主和惯匪为骨干的政治土匪，数量多，危害大。国民党加委的有中统、军统等十六个系统。北满地区的土匪，号称十万，全东北有土匪近二十万。我军挺进东北后，在根据地开创初期，就进行了剿匪斗争，并初步取得了胜利。然而，在我军主动撤出四平、长春等地之后，这些土匪又重

新抬头，蜂拥而起，攻占县城，破坏交通，杀害干部，无恶不做。当我主力执行“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撤到北、西、东满之后，根据东北局六月十二日发布的《剿匪指示》，迅速分散，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开展了彻底肃清匪患的斗争。经过我军近一年的反复搜剿，穷追猛打，一九四六年末，谢文东、李华堂等顽匪终于就擒。至一九四七年五月上旬，东北境内的土匪，除九万余人被国民党收编为正规军外，其余七万九千多人全部被歼，取得了剿匪斗争的基本胜利。剿匪斗争的胜利，为发动农民提供了有利条件。

（2）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把农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是在开展反奸清算，对日伪斗争的基础上，从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开始的。老区土改一般经历了清算分地、“煮夹生饭”、“砍挖”平分土地三个阶段。在老区土改进入第三阶段时，新区土改也开始进行。因此，东北的土地改革运动按时间也就可以划为三段。

清算分地阶段，从一九四六年五月贯彻《五四指示》开始，到十一月底为止，主要在老解放区进行。我军进入东北创建根据地的初期，即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六年初，各地开展了反奸清算分配敌伪土地（即开拓地、满拓地和一切日伪霸占的土地）的斗争，彻底消灭日伪残余势力。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央发布《五四指示》，这一斗争即由对日伪的斗争逐步发展为对地主阶级的清算分地斗争，转向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开始了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但是，当时由于战争的影响，清算分地斗争开展的不普遍、不深入，只是在部分地区进行。东北局七月会议后，根据《七

七决议》的精神，继续贯彻中央《五四指示》，一万二千名干部组织土改工作团下乡，土地改革运动才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煮夹生饭”阶段，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底东北局发布“煮夹生饭”开始，到一九四七年五月初老区初步分配土地为止。当时由于在清算分地阶段战争处于拉锯形势，地主土匪武装十分猖獗，群众对国民党还有盲目的正统观念和怕变天的思想顾虑，不敢起来同地主斗；又由于工作团缺乏经验，急于求成，加上方法上也有问题，有的地方还没有来得及派工作团，就一轰而起。结果，使土改运动发展不平衡，不少地区出现假分地、假斗争，或明分暗不分的情况，农民的基本政治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封建势力没有打垮。陈云同志把这种情况称做为“夹生饭”。十一月底，东北局发出解决土改运动中“夹生饭”的指示后，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形成高潮。通过解决“煮夹生饭”问题，到一九四七年五月，基本上完成了老区的土地分配任务。据当时统计，全东北各根据地除南满外，共分配土地三千一百六十万亩，其中：西满一千八百万亩，松江六百七十万亩，合江三百二十万亩，牡丹江六十万亩，东满三百一十万亩。分得土地的农民共约四百万人，人均分得土地八亩左右。土改后，农村普遍建立了区、村政权和农民武装，不少村屯有了党的组织，普遍建立了党的区委和县委。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翻了身，真正成了农村的主人。

新收复区的土地改革与老区的“砍挖”运动阶段，从一九四七年六月开始全面贯彻，到一九四八年三月土地改革

运动结束。随着一九四七年夏、秋、冬三大攻势的胜利，根据地迅猛扩大。为了迅速发动新区农民群众，东北局于一九四七年六月发出了《关于新收复区工作的指示》，要求东北全党要象去年七月动员干部下乡一样，抽调有经验的干部组成工作团到新收复区去，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六、七月间，新区土改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十月，全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土改运动形成了高潮。与此同时，北满各地开展了“砍挖”运动，即砍倒大树，挖浮财，挖坏根。在《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北满各地在“砍挖”运动基础上又进行了土地再分配（实际上是调剂土地）。在这阶段中，新、老解放区曾一度出现破坏工商业政策，侵犯中农利益，打人、乱捕、乱杀等“左”的错误。东北局及时纠正了这些错误，从而保证了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截至一九四八年三月，东北地区除占百分之五左右的边沿区和几个孤立城市的周围以外，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

土地制度改革的完成，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生产、支前、参军参战的积极性。从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初，为了扩充主力部队，在翻身农民中先后组建了二批二线兵团一百八十九个，合计四十二万二千多人，连同在这之前的参军农民，总计在百万以上。此外，从我军进入东北到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各地农民参加各战役的支前民工达二百六十三万人次，担架十五万二千余副，大车十余万辆。一九四六年冬到一九四七年末，各地农民交纳的公粮达三十亿斤，仅在辽沈战役中运送到前线的军粮就达七

千万斤，肥猪三十八万五千多头。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使东北解放战争真正成了人民战争。

(3)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我党我军挺进东北，开辟根据地后，就注意了党的建设。在一九四七年年尾以前，党的基层组织和新党员的发展工作，因处于不公开状态，数量还不多。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党的组织得到了发展和壮大。一九四六年东北局提出对新党员的训练和教育工作，许多省、地、县办了党员训练班，吸收第一批入党的新党员受训。十月三十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积极发展党员与建党的指示》，要求在“工人、雇农、贫农及革命知识分子”中，“吸收真正有阶级觉悟的、勇敢积极的、为人正派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积极分子入党”。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的深入发展，涌现出大量的积极分子，又及时地发展了一大批新党员。在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随之出现了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东北局决定与土地改革运动相结合，从一九四七年冬至一九四八年春，在东北全区普遍开展一次整党、建党运动。整党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党内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的成份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提高党的思想水平。整党以老干部和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为重点。审查干部成份不要搞成清洗运动，首先是为了弄清思想，注意防止产生排斥知识分子的倾向。东北局的决定与指示，保证了这次整党运动顺利和健康的发展。党组织在整党的基础上，开始大量吸收新党员，进行公开建党工作。到辽沈战役结束为止，东北已发展到拥有五十三万党员，其中地方

党员三十一万三千余人，军队党员二十一万六千余人，这支党员队伍成了东北地区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与此同时，还抓了工会、青年团和妇女等群众组织的建设工作。

在开展建党工作的同时，就注意了政权的建设。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七日，成立了辽宁省民主政府。十一月十四日，成立了嫩江省民主政府。十二月三日，成立了安东省民主政府。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成立了松江省民主政府。后来相继在吉林、龙江、辽北、热河、合江、兴安、绥宁等省也成立了省民主政府。各省、市还分别设立了参议会，县设立了参政会。这些机构，由于当时群众还未充分发动，虽然缺乏一定的政治基础，但是，它在扩大党的影响，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方面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九四六年八月，正式成立了东北统一的最高政权机关——东北行政委员会。一九四七年，农村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普遍地建立和健全了区、乡人民政权和农民武装。八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这次会议，明确规定东北解放区政权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从此，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了调整与整顿，为全东北解放后系统建政奠定了基础。

(4)加强财经工作的领导，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军工生产。在我党我军进入东北的初期，东北财经状况一片混乱：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通货膨胀，物价波动；物资奇缺，供应不足，严重地影响了军需和人民生活。针对这一情况，东北局根据中央指示，及时地采

取了措施：一九四六年八月成立了以陈云为主任的财政委员会（一九四七年四月改为财经办事处，由王首道任主任），并成立了各省、市、县敌伪资财清理委员会，收集和清理敌伪储存和遗散的武器、弹药、粮食、布匹、运输工具和器材等各种物资；建立东北银行，发行东北地方流通券代替其他货币；稳定物价，整顿金融；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等。一九四七年，随着农村土改的基本完成和广大新区城市的相继解放，东北解放区迅速进入了一个以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各项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为了整顿和统一财政管理工作，十月，东北局作出了关于加强财经工作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财经工作的领导。年底，撤销财经办事处，设立了以王首道为主任的经济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七月，为了进一步统一和加强财经工作的领导，成立了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由陈云任主任，李富春、张闻天、叶季壮任副主任。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基本上做到了统一预算，统一管理，保证了军需民用，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由于东北局加强了财经工作的领导，各项经济建设特别是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农业生产方面，一九四八年的粮食总产量达一千一百八十七万多吨，比一九四七年增产百分之十二；平均亩产一千九百二十斤，比一九四七年提高百分之二十八。在工业生产方面，尽管沈阳、鞍山、本溪、抚顺等重要工业城市解放较晚，但由于我军自进入东北后即着手没收敌伪企业为国家所有，逐

步建立起新型的国营经济，并一直重视依靠工人阶级和技术人员管理企业，因而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两年间，东北的工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尤其是煤炭生产和铁路交通的恢复更为迅速。以鹤岗、鸡西两煤矿为例，一九四六年两矿共产煤五十九万吨，到一九四八年达到六百六十七点一万吨，增长了十倍。铁路交通也一样，一九四六年六月，解放区通车线路只有四千六百九十四公里，机车只有一百二十九台；到一九四八年沈阳解放前夕，通车线路达到九千八百一十八公里，机车修复了八百八十五台，有力地支援了工农业生产和全东北的解放。

在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中，军工生产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东北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军工生产的条件比全国其他地区优越。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东北局于一九四七年十月召开了东北军工会议，检查了军工生产情况，决定进一步加强对军工生产的领导。十一月初，东北局又根据毛泽东关于“用全力加强军事工业之建设，以支援全国作战为目标”的指示，作出了《关于军工生产的决定》。根据中央指示和东北局决定，东北各地尤其是哈尔滨、大连两市的军工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到一九四八年夏，东北解放区已有大小军事工厂五十五个，除修理各种武器外，可年产六〇炮二千门，迫击炮弹五十万发，山炮野炮弹二十万发，手榴弹一百五十万枚，各种子弹一千七百万发，复装山炮、野炮弹二十五万发等。军需品可日产单军衣一万九千套，胶鞋、布鞋各一万双等。这些军工、军需产品，不仅供应了东北前线，而且大量地支援了关内解放战争。

(5)加强城市管理和经济建设，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开始逐步向城市转移。一九四八年春，我军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地区除沈阳、长春、锦州等十二个城市尚被敌人占领外，其余一百四十多个城市均先后获得解放。因而，城市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东北局及时地提出了东北我党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逐步向城市转移，指出：我们的任务从前是创建根据地，站住脚，现在则是怎样解放全东北。为适应这种变化，党的工作重心也要逐渐转变，要抽调大批干部做城市工作，首先掌握工业，加强工业的组织领导力量。东北局还决定将东北局与各省、市、县的民运部一律改为城市工作部，以加强城市工作。东北局从老区根据地调出一批干部连同东北局一级抽调的干部，共计四千余人，于一九四八年九月间集中，由陈云同志率领准备接收沈阳及其周围的各工业城市。

一九四八年八月下旬，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研究东北的经济结构和我党应采取的政策。这次会议为东北我党的城市管理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在这次会议前后，陈云还为东北局起草了《正确处理新接企业中的职员问题》的决定和他给中央的《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报告等。在这些文件中，陈云反复强调了财政经济工作在夺取全东北和全国胜利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加强工业的计划性；管理工作实行企业化和民主化；要重视和培养技术干部、管理干部；要特别注意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为城市管理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做了更明确、更具体的规定。

东北局有关城市工作和经济工作的一系列决定，标志着东北全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为最后解放全东北和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准备了条件。

(三)东北全境解放及其重大意义

一九四六年七月东北局扩大会议后，由于实行了正确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创建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放手发动群众为中心开展根据地的全面建设，这就有力地保证了各个战役的顺利发展，并取得完全的胜利。在坚持南满的斗争中，以南、北满根据地为依托，在正确作战方针指导下，进行了“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这一战役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历时四个月，我军共歼敌四万三千余人，收复城市十一座，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迫使敌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我军掌握了战局的主动权，开始转入了战略反攻。接着，东北我军在东、西、南、北满各根据地的全力支援下，从一九四七年五月起，发动了夏、秋、冬三季攻势，南北对打，全线出击，迫使敌人处处防守，节节败退。我军夏、秋、冬三季连续攻势，到一九四八年三月结束，历时十个月，共歼敌三十万五千余人，收复城市七十四座。这次战役后，东、西、南、北满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敌军被我军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联系的狭小地区。到一九四八年八月，由于东北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参军参战，我军兵力猛增到拥有十二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纵队和十七个独立师，加上地

方部队，总兵力达一百零五万人。敌人虽然经过整编，仍然拥有十四个军四十四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约五十五万人。但力量对比，我军无论从政治素质或从数量上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尤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军有巩固而强大的根据地做依托，兵源、粮源、支前民力充足。这就为全歼东北敌军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

最后，我军于九月十二日发起一场震惊中外的辽沈决战，十月十五日攻克锦州，十九日长春宣布解放，十一月二日攻占沈阳，同时解放营口，至此，历时五十二天，歼敌四十七万，取得了解放全东北的伟大胜利。辽沈决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改变了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我人民解放军从此在质量上、数量上都占居了优势；东北全境解放，我东北百万大军、数万干部和十万支前民工入关，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提供了条件；辽沈战役的胜利，不仅使我军有了一支强大的战略预备队，而且获得了进行大规模歼敌的经验；东北物产丰富，工业基础雄厚，不仅为全国解放战争建立了可靠的后方，而且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军工生产基地，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辽沈战役的胜利是党中央英明战略决策的胜利，也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太岳革命根据地 领导机构和行政区划的沿革

阎文彬 宋荐戈 卢海明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依托山西省中、南部和河南省北部的太岳山脉、中条山脉，于一九三七年冬季开始创建太岳和晋豫两个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二年冬季，根据北方局的决定，太岳、晋豫两区合并为太岳区。一九四九年八月太岳区撤销。历时十二年。

早期的太岳和晋豫地处同蒲铁路以东，白(圭)晋(城)公路以西和黄河以北之间的三角区。并以曲(沃)高(平)公路为界，北称太岳区，南称晋豫区。“十二月事变”后，太岳区退回到临(汾)屯(留)公路以北，岳南和晋豫区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后，太岳部队南下，开辟了岳南区，重建了晋豫区。

太岳、晋豫两区合并后，辖区不断扩大。一九四七年，陈赓兵团过黄河后，豫西新解放的一些县曾一度归属太岳区。这时，太岳区所辖范围发展到同蒲铁路及汾河以东以南，白晋路以西及豫西之洛宁以北的广大地区。辖区曾达四十七县。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行政区划几经调整。

最后，只剩下了十七个县。

太岳区领导机构和行政区划变动频繁，尤其在创建初期更是多变，根据档案资料以及老同志的回忆，经过初步核实，概述如下：

一、党的领导机构和主要负责人

1. 太岳区初创时期党的领导机构

中共太岳工委：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共北方局派安子文到沁县建立，对外称“八路军联络处”。安子文任书记。

中共太岳特委：一九三八年九月，根据中共北方局和中共晋冀豫区党委的决定，中共太岳工委改为太岳特委。
主要负责人：

特委书记	安子文
副书记	王一新
秘书长	石平(宋洁涵)
组织部长	傅贯一
宣传部长	魏晓云
军事部长	钟洲
民运部长	王旭(王新三)

中共太岳地委：一九三九年一月，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特委一律改称地委。中共太岳特委改为太岳地委。
地委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安子文
副书记	王一新

组织部长	傅贯一
宣传部长	魏晓云
民运部长	王旭(王新三)
秘书长	郝可铭

中共太岳区党委：山西“十二月事变”后，一九四〇年一月，根据中共北方局的决定，太岳地委改为太岳区党委。主要负责人：

区党委书记	安子文
组织部长	王一新
宣传部长	顾大川
青委书记	张刚
青委副书记	史怀璧
妇委书记	杨啸宇

2. 晋豫区创建时期党的领导机构

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一九三七年九月在河南焦作成立。主要负责人：

工委书记	张萃中
组织部长	聂真
宣传部长	王卓如
青妇部长	薛迅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经中共北方局代表朱瑞决定，由王卓如接替张萃中任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书记。

中共豫北特委：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所辖特委之一。特委书记聂真(兼)。

中共河东工委：一九三七年九月，根据中共山西省工委的决定建立。主要负责人：

工委书记	阎子祥
组织部长	李绍伯(李友杜)
宣传部长	李哲人

中共河东特委：一九三八年一月，根据中共北方局的决定，河东工委改为河东特委。主要负责人：

特委书记	阎子祥
组织部长	温建平
宣传部长	李绍伯(李友杜)
特委委员	关中亭 薛涛

中共曲沃特委：一九三八年一月，根据中共北方局的决定建立。

特委书记	李哲人
组织部长	李擷伯
宣传部长	武光

中共晋豫特委：一九三八年二月底，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在阳城县横河镇召开扩大会议，朱瑞代表中共北方局决定撤销晋冀鲁豫省工委、曲沃特委、河东特委及豫北特委，成立中共晋豫特委。主要负责人：

特委书记	聂真
组织部长	薛迅
宣传部长	李哲人
军事部长	教纪民(高锦明)
特委委员	贾寄尘(嘉康杰)

温建平 方升普

阎子祥

唐天际以中共冀豫晋省委代表身份参加特委。

中共晋豫地委：一九三九年一月，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共晋豫特委改为晋豫地委。“十二月事变”后，中共晋豫地委改为晋豫区党委。

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事变”后，晋豫边抗日根据地遭到蒋阎军队严重摧残，中共晋豫区党委迁驻太南区平顺县境内。一九四〇年春，晋豫区党委与太南区党委合并为中共晋豫太南区党委，属中共北方局领导。主要负责人：

区党委书记 聂真

组织部长 王孝慈

宣传部长 张晔(后李哲人)

中共晋豫区党委：一九四一年七月初，晋豫太南区党委将所辖太行南端，白晋路以东，平汉路以西地区党的工作移交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并将晋豫太南区党委改为晋豫区党委，以聂真为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哲人为宣传部长。七月中旬，中共晋豫区党委机关到达沁源县阎寨村（太岳军区驻地），旋即组成太岳支队，以周希汉为司令员，聂真为政委，越过临屯公路去岳南开辟工作。一九四二年初，太岳支队又在王新亭和聂真率领下分两路重返原晋豫区。

3. 两区合并后太岳区党的领导机构

中共太岳区党委：一九四二年冬太岳区党委和晋豫区

党委合并，仍称太岳区党委，属新成立的中共太行分局领导。主要负责人：

区党委书记	薄一波
副 书 记	聂 真
组 织 部 长	薛 迅
副部长	郭钦安
宣 传 部 长	顾大川
副部长	赵守攻
武 装 部 长	王新亭(后曹普)
秘 书 长	王利宾

一九四三年秋，薄一波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和整风，聂真代理区党委书记，组织部副部长郭钦安和宣传部副部长赵守攻分别主持部务。十月以后，区党委改属中共北方局领导。

一九四四年四月王鹤峰由延安归来，担任太岳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则由聂真兼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真担任了区党委书记，一九四六年春调离。太岳区党的领导机构又作了新的调整，区党委属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主要负责人：

区党委书记	王鹤峰
副 书 记	裴孟飞
组 织 部 长	郭钦安
宣 传 部 长	李哲人
社 会 部 长	裴孟飞(兼)
副部长	阎定础

民运部长	顾大川
经济部长	裴丽生
武装部长	曹普
秘书长	卫恒

一九四八年五月，华北局成立后，太岳区党委属华北局领导，主要负责人调整为：

区党委书记	王鹤峰
副书记	顾大川
组织部长	郭钦安
宣传部长	卫恒
社会部长	程谷梁
副部长	阎定础
秘书长	王炯

七月，王鹤峰、程谷梁调走，顾大川为区党委书记，阎定础为社会部长。

二、政权系统领导机构和主要负责人

1. 太岳区初创时期政权的领导机构

一九三七年九月，阎锡山将山西全省划分为七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设一政治主任公署，代行省政府的职权。次年二月，又增设为九个行政区，并把各行政区政治主任公署改称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治主任改称行政督察专员。

三专署专员	薄一波
书主任	刘季荪

五专署专员 戎伍胜(戎子和)

 秘书长 杨献珍

六专署专员 张文昂

 秘书长 张衡宇

三专署驻沁县，五专署驻长治，六专署驻临汾。太岳区最初是在合并三、五、六专署所属的一些县份的基础上建立的。

六专署河东办事处：日军打通同蒲路后，一九三八年三月，六专署在汾西县暖泉头村设立河东办事处，不久迁驻赵城县苑川村，七月又移驻赵城县石门峪，辖灵石、霍县、洪洞、赵城、临汾等县。主要负责人：

 主 任 裴丽生

 政务科长 杨振亚

 民政科长 张明道

 建设科长 王志舜

 武装科长 张志强

三专署路西办事处：“十二月事变”后，六专署河东办事处移驻沁源。为了统一领导，以六专署河东办事处与牺盟上党中心区路西办事处的干部为基础，在沁源县孔家坡成立三专署路西办事处，领导太岳各县的政权工作，仍以裴丽生为办事处主任。

太岳专署：一九四一年二月，在沁源县赵寨重建三专署，亦称太岳专署。属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领导。主要负责人：

 专 员 薄一波

副 专 员	裴丽生
秘 书 长	时逸之
副秘书长	刘季荪
民政科长	张天乙
财政科长	李向甫
教育科长	杨振亚
武装科长	张 烈
司法科长	刘元章
粮食科长	侯文泉
建设科长	王志舜

太岳行署：一九四一年九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决定撤销太岳专署，成立太岳行署。主要负责人：

行署主任	牛佩琮
副 主 任	裴丽生
秘书处 长	周义中
民政处 长	张天乙(后张明道)
财政处 长	裴丽生(兼)
教育处 长	崔斗辰
建设处 长	程谷梁

2. 晋豫行政办事处

抗日战争初期，晋豫区各县政权分属于山西第五、六、七行政区和河南省所辖一部。当时的晋豫区只有党的领导机构，没有全区统一的政权机构。“十二月事变”后，这个

地区全部沦为国民党的统治区。中条山战役后，太岳部队南下晋豫区，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在阳城横河镇成立了晋豫区行政联合办事处。主要负责人：

主任	郭清文
副主任	刘裕民 刘北斗
秘书长	王唐文
行政处长	席松涛
财粮处长	刘孝民
司法处长	段松林
教育处长	区鉴三

3. 两区合并后太岳区政权的领导机构

太岳行署：一九四二年冬，太岳区和晋豫区合并，政权领导机构是太岳行署。

行署主任	牛佩琮
副主任	裴丽生
民政处长	周义中
财政处长	纪锦章
教育处长	崔斗辰
公安局长	宋烈

一九四三年精兵简政后，太岳行署的主要负责人：

行署主任	牛佩琮
副主任	裴丽生
秘书处	邢宇衡
民政处长	时逸之

财政处长 纪锦章

公安局长 宋 烈

邮政交通局长 梁鸿斋

一九四五年初，成立经济局，以赵守攻为局长，程谷梁为副局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太岳行署的主要负责人：

行署主任 牛佩琮

副主任 裴丽生

秘书长 卫逢祺

民政处长 时逸之

财政处长 纪锦章

文教处长 崔斗辰(原刘北斗)

司法处副处长 刘 来

公安局长 宋 烈

副局长 张德含

一九四八年六月，晋冀鲁豫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合并前后，太岳行署的主要负责人：

行署主任 牛佩琮

副主任 裴丽生

秘书长 卫逢祺

建设处长 张天乙

教育处长 崔斗辰

财政处长 纪锦章

工商处长 马 健

公安局长 程谷梁(后阎定础)

副局长 阎定础

一九四八年九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行署的主要负责人:

行署主任	牛佩琮
秘书长	卫逢祺
建设处长	张天乙
财政处长	纪锦章
工商处长	马 健(后陆季珊)
教育处长	崔斗辰

太岳行政公署: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根据华北人民政府的决定,太岳行署改为太岳行政公署。仍属华北人民政府领导。主要负责人:

行政公署主任	牛佩琮
副主任	刘裕民(未到任)
秘书长	卫逢祺
民政处长	时逸之
财政处长	纪锦章
教育处长	崔斗辰
工商处长	严亦峻
公安处长	阎定础
交通处长	梁鸿斋(原张文琦)
农业处秘书	王志舜

三、军事领导机构和主要负责人

1. 太岳区初创时期军事系统概况

决死一总队: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山西青年抗敌决

死队第一总队（简称决死一总队）在太原成立，这是创建山西新军的肇始。主要负责人：

总队长 杜春沂

政委 薄一波

副总队长 徐积璋

政治主任 牛佩琮

决死一纵队：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决死一总队进驻沁县。不久，扩建为决死一纵队。主要负责人：

纵队长 鲁应麟

政委 薄一波

参谋长 梁述哉

政治主任 牛佩琮

同年十一月，薄一波在沁县正式就任山西省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并兼任三区保安司令，李一清为保安副司令。不久，八路军总部派毕占云到决死一纵队充任联络官。

当时，太岳区尚无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一二九师派遣宋任穷率领八路军工作团到达沁县，在第三行政区范围内进行扩军筹款，宣传抗日救国。到一九三八年七月，决死一纵队已扩展为六个团（或总队）的兵力。当时，决死一纵队的主要负责人：

纵队长 梁述哉

政委 薄一波

政治主任 牛佩琮

下属各总队（或团）的负责人是：

一总队长	台耀奎
政治主任	周仲英
二总队长	贾毓芝
政治主任	梁膺庸
三总队长	张寿华
政治主任	王鹤峰
保安五团团长	黎锡福
政治主任	郭寿征
游击一团团长	白书棋
政治主任	阎定础
游击二团团长	郑 军
政治主任	宋匡澜(后高德西)

此外，决死一纵队中一度成立游击三团，卫逢祺负责政治工作。不久，并入游击一团。

一九四〇年一月，决死一纵队和进入太岳区的二一三旅等新军部队在沁源合编。合编后仍称决死一纵队。

纵队长兼政委	薄一波
副纵队长	牛佩琮
参 谋 长	颜天明
政 治 主 任	王鹤峰(后周仲英)
参 谋 主 任	李成芳

决死一纵队辖五个团，各团负责人：

二十五团由游击一团与决死三总队合编。

团 长	苏 鲁
政 委	凌则之

三十八团由游击二团与决死一总队合编。

团 长 蔡爱卿

政 委 刘有光

五十七团由保安五团和二一三旅五十七团合编。

团 长 黎锡福

政 委 周义中

五十九团由二一三旅五十八团、五十九团与决死二总队、洪源游击支队合编(二月并入)。

团 长 胡兆祺

政 委 高德西(原傅雨田)

四十二团由决死二纵队两个营及其直属队一部组成。

团 长 刘 丰

政 委 南静之

另外,决死三纵队的游击十团也暂属决死一纵队指挥。

团 长 雷 震

二一二旅:一九四〇年二月,新军二一二旅进入太岳区,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决定,保留其番号。

旅 长 孙定国

政 委 王成林

参谋长 张 耀

政治部主任 朱佩瑄

二一二旅辖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三个团。

另有解学恭领导的洪赵支队,也在太岳区范围内活动。

三八六旅:为了加强太岳区的军事力量,巩固和保卫

太岳革命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于一九四〇年一月开进太岳区，并由该旅旅部统一指挥太岳区各部队。当时，三八六旅的主要负责人：

旅长	陈赓
政委	王新亭
参谋长	周希汉
政治部主任	苏精诚

进入太岳区后，三八六旅辖七七二、十六、十七、十八四个团。

太岳军区：一九四〇年六月三八六旅奉命兼任太岳军区。主要负责人：

司令员	陈赓
政委	王新亭
参谋长	周希汉
政治部主任	苏精诚

太岳纵队：一九四一年八月，奉八路军总部命令成立，直属总部指挥。主要负责人：

司令员	陈赓
政委	薄一波
参谋长	毕占云
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

太岳纵队辖决一旅（决死一纵队改编）、三八六旅和二一二旅。

决一旅旅长	李聚奎
政委	周仲英

三八六旅旅长	陈 赓(兼)
政 委	王新亭(后聂真兼)
副旅长	王近山
二一二旅旅长	孙定国
政 委	马 英(马佩勋)

此后，太岳军区由太岳纵队兼任。

太岳区武委总会：一九四二年七月成立太岳区武委总会筹委会，以张明为主任，张刚为副主任，不久正式成立武委总会。主要负责人：

主 任 王新亭(兼)

一九四二年六月，实行精兵简政后，根据一二九师的规定，太岳军区辖两个旅，四个军分区，七个团。三八六旅辖七七二、十六两个团；决一旅辖二十五、三十八两个团。五十九团为一分区基干团，原四十二团缩编为二分区基干营，五十四团（二一二旅缩编）为四分区基干团，洪赵支队为三分区基干团。

2. 晋豫区军事领导机构

决死三纵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进入曲沃地区的决死三总队，经过整编，正式命名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三纵队”（简称决死三纵队）。主要负责人：

纵 队 长	陈光斗
政 委	戎伍胜(戎子和)
参 谋 长	颜天明
政治主任	董天知

八路军驻一战区联络处：一九三七年十月在河南新乡成立，十二月，联络处从豫北迁至阳城。主要负责人：

主任 朱瑞

副主任 唐天际

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三四四旅进入高平、阳城一带，参加了创建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主要负责人：

旅长 徐海东

政委 黄克诚

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纵队：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济源县邵源镇成立。九月，纵队改称支队。主要负责人：

司令员 唐天际

参谋长 方升普

政治部主任 敖纪民(高锦明)

纵队辖三个支队(也称大队)。主要负责人：

一支队长 冯精华

二支队长 杨柏笙

三支队长 杨风堂

山西“十二月事变”后，一九四〇年三月决死三纵队重新组建。主要负责人：

司令员 戎伍胜(戎子和)

政委 董天知

副司令员 李光汉

参谋长 高体乾

政治部主任 车敏樵

一九四〇年二月，晋豫边抗日游击支队奉命同八路军三四四旅的六八八团在晋城合编为新一旅。主要负责人：

旅 长 韦 杰

政 委 唐天际

太岳支队：一九四二年一月，太岳区组成太岳支队重返晋豫区。当时，太岳支队辖十七团、十八团、五十七团。太岳支队的主要负责人：

司令员 王新亭

政 委 聂 真

晋豫联防区：一九四二年四月成立，主要负责人：

司令员 刘 忠

政 委 聂 真

联防区辖三个军分区，分别由十七、十八、五十七三个团兼任军分区。

3. 两区合并后太岳区军事领导机构

太岳军区 太岳区和晋豫区合并后，军区的主要负责人：

司 令 员 陈 赓

政 委 薄一波

参 谋 长 毕占云

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

供 给 部 长 余绶云

卫 生 部 长 彭之久

太岳军区辖四个军分区（晋豫联防区改称第四军分

区)。一九四三年十月，又以在条西坚持武装斗争的地方部队为主力，成立第五军分区。

一九四三年陈赓、薄一波赴延安准备参加党的“七大”，于是太岳军区的主要负责干部又有以下变动：

司 令 员	陈 赓
政 委	薄一波
副 司 令 员	谢富治
副 政 委	王新亭
参 谋 长	毕占云
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兼）
供给部长	余绶云
卫生部长	彭之久
武委总会主任	王新亭（兼）

豫西抗日游击二支队：一九四四年十月，太岳军区组建了豫西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参加开辟豫西解放区的斗争，支队长兼政委为刘聚奎。辖十八团和五十九团。

晋冀鲁豫军区四纵队：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十月，根据晋冀鲁豫军区的决定，将太岳军区的大部分主力部队，组建为四纵队。主要负责人：

司 令 员	陈 赓
政 委	王鹤峰（后谢富治）
副 司 令 员	谢富治（后韩钧）
副 政 委	杨奇清
参 谋 长	毕占云（后刘忠）

政治部主任	杨奇清（兼）（后刘有光）
副主任	刘有光（后吴杰）
供给部长	赵炳润

四纵队下辖三个旅的主要负责人：

十旅旅长	周希汉
政委	刘 忠（后廖冠贤）
副旅长	楚大明
十一旅旅长	李成芳
政委	刘有光（兼）
副旅长	刘 丰
十三旅旅长	陈 康
政委	雷荣天
副旅长	黎锡福

四纵队成为野战部队后，太岳军区的领导干部作了新的调整。调整后的负责人：

司 令 员	王新亭
政 委	聂 真（后王鹤峰）
副司令员	孙定国
副 政 委	裴孟飞
参 谋 长	邓士俊
政治部主任	桂绍彬
副主任	高德西
供给部长	冯丕成
副参谋长	余绶云
武委总会主任	曹 普

军区辖十八至二十一军分区和二十四旅。二十四旅的负责人：

旅 长 刘金轩

政 委 李 耀

同年十一月，中央军委为加强东北军事力量，实现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的战略计划，令四纵队之十旅、十三旅以及地方部队组织的一个新旅，由陈赓率领待命开赴东北。同时，以十一旅为主组建八纵队，谢富治为司令员，王鹤峰为政委，率部在太岳区坚持斗争。十二月，中央军委又电示四纵队仍留在太岳区，不调东北，于是八纵队仍并入四纵队。

一九四六年四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四纵队下辖五个旅。纵队的主要负责人：

司 令 员 陈 赓

政 委 谢富治

副 司 令 员 韩 钧

副 政 委 杨奇清

参 谋 长 刘 忠

政治部主任 刘有光

副主任 吴 杰

供 给 部 长 赵炳润

各旅主要负责人：

十 旅 旅 长 周希汉

政 委 廖冠贤

副 旅 长 楚大明

政治部主任	雷起云
十一旅旅长	李成芳
政 委	刘有光 (兼)
副旅长	蔡爱卿
政治部主任	胡荣贵
十二旅旅长	黄定基
政 委	车敏樵
参谋长	张振华
政治部主任	孙灏正
十三旅旅长	陈 康
政 委	雷荣天
副旅长	黎锡福
二十四旅旅长	刘金轩
政 委	李 耀
副 旅 长	查玉升
政治部主任	朱佩瑄

全面内战爆发前夕，太岳军区的主要负责人：

司 令 员	王新亭
政 委	王鹤峰
副司令员	孙定国
参 谋 长	邓士俊
政治部主任	桂绍彬
副参谋长	余缙云
供给部长	冯丕成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党即将把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进攻时，四纵队辖三个旅，纵队
主要负责人：

司 令 员	陈 赓
政 委	谢富治
副 司 令 员	韩 钧
参 谋 长	刘 忠
政治部主任	刘有光
副主任	高德西
供 给 部 长	赵炳润
供给部政委	杨辉图

各旅主要负责人：

十 旅 旅 长	周希汉
政 委	廖冠贤
参谋长	胡绵弟
政治部主任	雷起云
十一旅旅长	李成芳
政 委	胡荣贵
副旅长	蔡爱卿
参谋长	王砚泉
政治部主任	侯良辅
十三旅旅长	陈 康
政 委	雷荣天
副旅长	黎锡福

当时，太岳军区的主要负责人：

司 令 员	王新亭
-------	-----

政 委	王鹤峰
副司令员	孙定国
副政委	裴孟飞
参谋长	邓士俊
政治部主任	桂绍彬
副主任	高德西
副参谋长	余缙云
供给部长	冯丕成
供给部政委	金世柏

军区辖四个军分区三个旅，各旅主要负责人：

二十二旅旅长	查玉升
政 委	朱佩瑄
十二旅（后为二十三旅）旅长	黄定基
政 委	车敏樵
二十四旅旅长	刘金轩
政 委	李 耀

晋冀鲁豫军区八纵队：一九四七年八月，根据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的决定，将太岳区另一部分主力部队组成八纵队。主要负责人：

司令员	王新亭
政 委	王新亭（兼）
副政委	周仲英
参谋长	张祖谅（后任副司令员）
政治部主任	桂绍彬

八纵队下辖三个旅，各旅的主要负责人：

二十二旅旅长	胡正平
政 委	王焕如
副 旅 长	温先星
参 谋 长	胡汉标
二十三旅旅长	黄定基
政 委	肖新春
参 谋 长	吴士宏
政治部主任	郑其贵
二十四旅旅长	王 墉 (后邓士俊)
政 委	王观潮
副 旅 长	常仲连
参 谋 长	余 凯
政治部主任	曾 柯

八纵队于一九四八年五月拨归华北军区建制。

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兵团 (陈赓兵团):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太岳四纵队、太行九纵队、三十八军组成太岳兵团,总兵力为八万余人。兵团前委书记为陈赓,执行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建立鄂豫陕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于八月渡河,九月开辟豫西。兵团的主要负责人:

司令员	陈 赓
政 委	谢富治

四纵队的主要负责人:

司令员	陈 赓 (兼)
政 委	谢富治 (兼)

副司令员	韩 钧
参 谋 长	王启明
政治部主任	刘有光

四纵队所辖各旅的主要负责人：

十 旅 旅 长	周希汉
政 委	廖冠贤
参谋长	胡绵弟
政治部主任	雷起云
十一旅旅长	李成芳
政 委	胡荣贵
参谋长	王砚泉
政治部主任	侯良辅
十二旅旅长	刘金轩
政 委	李 耀
副旅长	刘 丰
副政委	刘 佩
参谋长	薛克忠
政治部主任	刘 佩 (兼)
十三旅旅长	陈 康
政 委	雷荣天
副旅长	黎锡福
	李茂玉
参谋长	王长友
政治部主任	南静之
二十二旅旅长	查玉升

政 委 朱佩瑄

参 谋 长 王传训

政治部主任 南静之

九纵队的主要负责人：

司 令 员 秦基伟

政 委 黄 镇

副司令员 黄新友

参 谋 长 何正文

政治部主任 谷景生

九纵队所辖各旅的主要负责人：

二十五旅旅长 蔡爱卿

政 委 崔建功

二十六旅旅长 向守芝

政 委 余洪远

二十七旅旅长 崔建功

副 政 委 李万明

王银山

三十八军的主要负责人：

军 长 孔从周

政 委 汪 锋

副军长 刘威诚

陈先瑞

三十八军所辖各师、旅主要负责人：

十七师师长 张复振

副师长 梁历生

五十五师师长	杨 建
政 委	薛 涛
副 师 长	雷展如
独立旅旅长	张才千
政 委	张才千 (兼)
副 旅 长	罗厚福
副 政 委	李人林
参 谋 长	吴昌炽
政治部主任	李人林 (兼)

一九四七年十月，太岳兵团开辟豫西后，太岳军区的主要负责人：

司令员	刘 忠
政 委	王鹤峰
参谋长	邓仕俊
政治部副主任	高德西

军区辖五个军分区。新开辟的豫西地区为第五军分区。

华北野战军十五纵队：一九四八年八月，根据中共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的决定，将太岳区的全部正规部队升编为十五纵队。主要负责人：

司 令 员	刘 忠
政 委	袁子钦
副司令员	方升普
参 谋 长	熊 奎
政治部主任	高德西

十五纵队下辖三个旅，各旅的主要负责人：

四十三旅旅长	刘聚奎
政 委	梁文英
四十四旅旅长	涂则生
政 委	李培信（后孔俊彪）
四十五旅旅长	蒲大义
政 委	车敏樵

十五纵队成立后，太岳军区一度取消，成立警备司令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太岳警备司令部又改称太岳军区，主要负责人：

司 令 员	曹 普
政 委	顾大川
副 司 令 员	吕尧卿
参 谋 长	吕尧卿（兼）
政治部主任	杨玉山

由于太岳区已无正规部队，故将军分区全部撤销。

四、太岳区下辖行政区划的沿革 和党、政、军主要负责人

1. 太岳区初创时期的概况

太岳区创建初期有沁县、沁源、安泽、屯留、长子、平遥、介休、灵石、霍县、洪洞、赵城、临汾、浮山等十三县。十二月事变后，太岳区所辖地域缩小到岳北（即临屯公路以北）。一九四〇年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成立后，

在太岳区的范围内分设三个地委和三个军分区。一九四一年五月，太岳专署也相应地在岳北设立三个办事处，九月太岳行署成立，将三个办事处按照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统一序列改称七、八、九三个专署。上述三个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是：

一地委（七专署、一分区）包括沁县、长子、屯留、襄南、漳西五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任志远（后高扬文）

专 员 史怀璧

司 令 员 刘绍棠（后苏鲁）

二地委（八专署、二分区）包括安泽、岳阳、洪洞、赵城、漳源五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史 健

专 员 杨少桥（后纪锦章）

司 令 员 张汉丞（后李明如）

三地委（九专署、三分区）包括绵上、平遥、介休、灵石、霍县五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王 旭（王新三）

专 员 杨振亚

司 令 员 王清川

另有沁源为直属县。县委书记刘开基，副书记侯振亚，县长张学纯，游击大队长朱秀芝。

一九四一年中条山战役后，太岳部队奉命南下，开辟了岳南区。在这个地区设立了四地委（二十三专署，四分区），包括冀氏、浮山、翼城、沁水、端氏（后改称士敏县）、

高平六县。(长子县开辟后就划归七专署管辖，临汾、襄陵、曲沃的局面尚未打开。)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韩 柏 (焦善民)

专 员 时逸之

司令员 马 英 (马佩勋)

其后曾一度将岳南沁河以东之士敏、高平等县析出另设五地委 (二十四专署，五分区)。

2. 晋豫区的概况

晋豫区创立初期，特委下设四个中心县委，一个直属县。

晋城中心县委辖晋城、沁水二县，中心县委书记赖若愚。

翼城中心县委辖翼城、曲沃、绛县三县，中心县委书记吴云甫。

夏县中心县委辖夏县、闻喜、平陆、垣曲、安邑、解县、芮城七县。(永济、虞乡、临晋后来也建立了关系。)中心县委书记温建平。

沁阳中心县委辖沁阳、孟县、济源三县。中心县委书记王新波 (后刘刚)、副书记王毅之。

另以阳城为直属县，县委书记胡晓琴。

“十二月事变”后，晋豫区与太南区合并为晋豫太南区党委。下辖七个地委：太南地委 (一地委) 辖平北、平南、林北、长治 (东部)、潞城五县，二地委辖林南、安阳、辉县、获嘉四县，三地委辖修武、陵川、晋城三县，四地委

辖济源、孟县、沁阳、阳南四县，五地委辖翼城、垣曲、曲沃、绛县四县，六地委辖夏县、平陆、闻喜、芮城四县，七地委辖晋城、高平、沁水、阳北四县，共计二十八个县委。其中，一地委所辖各县为根据地，其余各地县的党组织完全转入地下，实行“精干隐蔽，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策略，当时这些地委和县委的领导成员，均以社会职业（如经商、教学等）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

中条山战役后，晋豫区党委下辖三个地委（晋豫联防区亦相应设立了三个军分区）和一个秘密地委。即：

一地委（一分区）辖沁阳、济源、孟县、晋沁四县。

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王毅之
副书记	席国光
专 员	席松涛
司令员	闵学圣
政 委	金世柏

二地委（二分区）辖翼城、垣曲、绛县、曲沃四县。

主要负责人是：

地委书记	杨蔚屏
专 员	刘北斗
司令员	黎锡福
政 委	曹 普

三地委（三分区）辖沁（水）南、阳（城）南、阳（城）北、王屋四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李 超
------	-----

专 员 刘裕民

司 令 员 陈 康

政 委 高德西

四地委（即条西地委）辖夏县、闻喜、平陆、芮城等县。这里的党组织只能进行秘密活动，党领导的部队，最初也不能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

地委书记 柴泽民

3. 两区合并后太岳区所属地区概况

一九四二年冬，太岳区与晋豫区合并为太岳区后，于一九四三年春，重新划分了各地区的属县，主要负责干部的人事亦有变动。当时共分为四个地区，各地区的属县和主要负责人：

一地委（一专署、一分区）包括沁源、绵上、沁县、屯留、襄漳、平遥、介休、灵石、霍县、安泽、赵城十一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顾大川

副 书 记 刘植岩

专 员 周义中

副 专 员 高芸生

司 令 员 李聚奎

副司令员 李成芳

政 委 顾大川（兼）

二地委（二专署、二分区）包括长子、高平、士敏、晋城四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薛 迅
专 员	魏 健
司令员	王近山 (后刘忠)
副司令员	周希汉
政 委	薛 迅 (兼)

三地委 (三专署、三分区) 包括冀氏、浮山、临汾、洪洞、青城、襄曲六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刘聚奎 (后刘尚之)
副 书 记	王 旭
专 员	时逸之
司令员	孙定国 (后刘金轩)
政 委	刘聚奎 (兼)
副司令员	刘金轩
参 谋 长	高体乾

四地委 (四专署、四分区) 包括阳城、翼城、沁南、垣曲、绛县、王屋、济源、孟县、沁阳九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李哲人
副 书 记	王毅之
专 员	郭清文
副 专 员	刘裕民
司令员	唐天际 (后陈康)
政 委	李哲人 (兼)

五地委, 前身为晋豫区条西地委, 只能秘密活动。一九四三年十月成立五分区, 司令员为康俊仁。一九四四年八月, 建立五专署包括夏县、闻喜、康杰、安邑、平

陆、稷麓、稷山、新绛八县。到一九四五年春时，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柴泽民
副书记	席荆山
专 员	金长庚
副专员	张呼晨
司令员	孙定国
副司令员	王 墉
政治部主任	王观潮

此时全区增至三十八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十月，太岳区的行政区划又作了新的调整，一、四专区中除沁阳划归太行外，基本未动，撤销了二专区，将所属各县分别划为一、四专区，三专区改为二专区，五专区改为三专区。由于合并和改划了几个县，故这时太岳区的总县数为三十四个。重新划分后的专区各属县和主要负责人：

一地委（一专署、十八军分区）包括沁源、安泽、屯留、沁县、平遥、介休、灵石、霍县、赵城、长子十县。

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刘植岩
副书记	刘开基
专 员	郭述尧
副专员	郭思敬（后严亦峻）
司令员	苏 鲁（后刘聚奎）
政 委	刘植岩（兼）

参 谋 长 张希英

二地委（二专署、十九军分区）包括冀氏、洪洞、浮山、绛县、临汾、襄曲、翼城、曲沃、沁南九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刘尚志
副 书 记	吴云南
专 员	史怀璧
司 令 员	张祖谅（后李成芳）
副司令员	景仙州
政 委	刘尚志（兼）
参 谋 长	王清川

三地委（三专署、二十军分区）包括安邑、夏县、平陆、闻喜、稷山、稷麓、新绛七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柴泽民（后刘植岩）
副 书 记	李志敏
专 员	金长庚
副 专 员	张呼晨（后姜时彦）
司 令 员	王 壖
副司令员	李明如
政 委	柴泽民
参 谋 长	樊执中

四地委（四专署、二十一军分区）包括晋城、高平、士敏、垣曲、济源、王屋、孟县、阳城八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薛 迅（后卫恒、王毅之）
副 书 记	王毅之（后马纪民）

专 员	郭清文（后刘裕民）
副专员	刘裕民
司令员	郭庆祥
政 委	薛 迅（兼）
参谋长	常仲连

一九四七年九月，太岳军区在豫西之新安、渑池地区成立了第五军分区，并相应地建立了五地委和五专署。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刘道安（后杨蔚屏）
专 员	贺崇升
司令员	刘兆先
政 委	刘道安（兼）
副政委	丁荣昌

前此，太岳部队在晋南先后解放了永虞、永乐、临晋、猗氏、万泉、荣河、绛南等七个县，又有一些县经过合并和撤销。到此时，太岳区管辖的县已达四十八县，处于极盛时期。全区分为五个专区。一专区辖沁源、沁县、安泽、屯留、长子、平遥、介休、灵石、霍县、赵城十县。二专区辖临汾、洪洞、浮山、绛县、襄陵、曲沃、翼城、沁水八县。三专区辖安邑、夏县、闻喜、平陆、稷山、新绛、永虞、永乐、临晋、猗氏、万泉、荣河、绛南，解县、芮城十五县。四专区辖阳城、晋城、高平、垣曲、济源、王屋、孟县七县。五专区辖新安、洛宁、洛北、宜北、陕县、孟津、渑池、偃师八县。

一九四八年六月豫西行署成立，太岳区即将五专区划

归豫西。同年八月，又将赵城、洪洞、临汾、襄陵、曲沃、闻喜、夏县、解县、安邑、平陆、芮城、永虞、永乐、临晋、猗氏、万泉、荣河、稷山、绛南等十九县划归晋绥边区，将平遥、介休划归晋中区。由于地域缩小，太岳区划为三个专区。

一地委（一专署）包括沁源、安泽、沁县、屯留、长子、霍县、灵石七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刘开基
专 员	郭述尧
副专员	严亦峻 梁选贤

二地委（二专署）包括沁水、翼城、浮山、绛县四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刘尚之
专 员	张天乙

三地委（三专署）包括阳城、晋城（一度析出晋城市）、高平、垣曲、济源、孟县六县。主要负责人：

地委书记	卫 恒（后王毅之）
地委副书记	王毅之
专 员	刘裕民

一九四九年八月，太岳区奉命撤销。大部县分划归山西省，豫北济源、孟县划归平原省。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十五辑

作者 =

页数 = 2 6 1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